炎黄春秋

1937年12月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
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康生残酷迫害杨献珍纪实

日军攻占香港的"C作战计划"

福建地下党冤案平反的一波三折

李默庵纵谈湖南起义

张闻天为何三让总书记

9
96
总第54期

李希贵，山东高密市的一位普普通通的乡村中学校长，数年致力于乡村教育模式的探索，改变了教育[illegible]落后的高密四[illegible]，使之成为[illegible]闻名的学校。[illegible]年8月他调任高密一中校长后，继续探索着乡村教育的模式。

本期出刊之际，[illegible]值教师节。我们特[illegible]反映高密一中学[illegible]的照片和对李希贵的采访文章，借以问广大教育工作者致意。

高密市委书记张建国(右四)和李希贵校长(右三)等走上校庆主席台

青年教师"三十而立"纪念仪式

同学们又拿到了一期由自己编辑的杂志

东京都大学文学博士藤井省三先生(左二)来校参观访问。

(采访文章见本期72页)

炎黄春秋

1996/9 （总第54期）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絜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洪　炉
执行主编：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

理 事 长：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地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飞无线电电讯发展公司
深圳市建设基础工程公司
理　　事：孙敏伟　宋晓洛
秘 书 长：徐　孔
副秘书长：段向群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编：100802　　电话：66170955
排版：北京维科电子技术研究所
印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M
出版日期：每月11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　　价：4.00元

目　　录

春秋笔

②**康生残酷迫害杨献珍纪实** …… 马仲扬
⑪**日军攻占香港的“C作战计划”** …… 马仲廉
⑱李默庵纵谈湖南起义 …… 高建中
㉖**张国焘血屠鄂豫皖** …… 朱秀海

求实篇

㉜**邓子恢被称为农村问题专家由来已久** …… 许人俊
㉟**福建地下党冤案平反的一波三折** …… 戴　煌

英杰谱

㊵**满门英烈的张太雷一家** …… 伊　里
㊽**张闻天为何三让中共中央总书记** …… 孙彦钊

长征颂

㊹**炸不垮打不散的红军长征队伍** …… 童小鹏

人海浪

㊻**周扬晚年的彻悟** …… 宋廷明
㊽从历次政治运动中走过来的翻译家——许渊冲 …… 龙　梅

赤子心

㊷**慕生忠：筑在世界屋脊上的丰碑** …… 邹　蓝
㊺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涂羽卿博士 …… 李宜华

文荟园

㊿谢稚柳和张大千的敦煌情 …… 倪怡中

时代风

(72)一个乡村中学校长的“教育价值论” …… 萧　徐

古镜台

(75)“关羽大意失荆州”吗？ …… 李书吉
(79)力主“匡正时弊”的李谔 …… 瞿林东

康生残酷迫害杨献珍纪实

● 马仲扬

编者按：康生对杨献珍的残酷迫害，是我国理论界的一大冤案，也是震撼人心的时代悲剧。这不仅是理论界关注的话题，而且也是在很多干部中，经常议论的一页历史。今年7月24日是杨献珍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为纪念这位“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的我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特请对康生、对杨献珍素有研究的原《红旗》副总编辑马仲扬同志撰写了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一、杨献珍敢于对“浮夸风”、“共产风”提出批评的胆识来源于他唯物主义的理论根基

1958年在“大跃进”的昏热下，出现了很多惊人的“轰动效应”，“浮夸风”吹进了各个领域，继之而来的“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也像瘟疫一样感染着中华大地。从主观意志出发，接着又来了个“吃大锅饭”、“穷过渡”，似乎很快就达到“共产主义”了。

杨献珍，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党校的校长，他是领导又是教师，除行政工作之外，常年坚持对学员进行课堂讲授，凡听过他讲授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人感到他把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讲得生动感人，把理论原则、生活实际、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讲得入情入理，易于接受。他这样讲，也这样做，给人留下了以身示范的深刻印象。从1952年秋到1955年秋，我曾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马列学院学习过三年，无论课堂还是课余，我作为学员之中的学习委员，同杨老有过不少接触，他那种平易近人，作风朴素，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使我难忘。和我同时学习的四五百学员，也有这样的亲身感受。

杨献珍对1958年的“浮夸风”、“共产风”，并不像有些人那样不是摇旗呐喊，就是默不作声。他从具体实际出发经过对“试验田”和“小高炉”的考察，在学员的提问下，于1958年11月19日，给新疆班和自然辩证法班讲了《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他讲道：“从现在的思想情况看来，我们一方面要读点书，不读书不懂得哲学的根本原理，不懂得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辩证法。仅仅是读书也不行，还要经常注意当前的现实生活，那里有很多哲学问题。”（《我的哲学“罪案”》第83页）他接着指

出了当时一些有待澄清的混乱思想：有的地方提出一个县或者几个县在两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首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因为他们把共产主义的标准降得很低。有的人要把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以全面供给制代替按劳分配；也有人主张消灭商品，废除货币。这是因为他们误把共产主义看作一切归公，个人的生活资料也要归公。他反复强调：我们要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要尊重唯物论，就要按照规律办事情；要尊重辩证法，就要按照对立统一规律看问题。尊重客观规律和敢想、敢说、敢做是统一的，不是绝对对立的，这就是辩证法，不是形而上学。我们的敢想、敢说、敢做如果离开了客观规律，那你什么也做不成，结果变成了神话。炼钢，我们可以学会，要学就能够学会，如果你炼钢不按炼钢的规律去炼，那就不行了。他反对"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也反对"无条件论"。他说，现在有些人"冲昏了头脑"！他说："没有一定的条件，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消极地等待条件是不对的，要积极地创造条件，争取更早一些办好这件事情。办任何事情不讲条件就是唯心主义。"（同上，第93页）

杨献珍的这些讲课内容，无愧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洞察力，也无愧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勇气概，在当时的那种形势下，这对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是难得的警世之言。可没有想到，这却成了康生给杨献珍所立"罪案"的记录。

二、康生1958年的浮夸狂，乃主观唯心主义的恶作剧

提起康生，会使了解中国共产党内情的人发憷，因为他有上谗得宠的权术，又有制造冤假错案的"特长"，谁同他相处，谁便成了他的迫害对象。且看他是怎样对待杨献珍的。

1958年，康生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到处鼓吹"教育大跃进"，要大办"共产主义大学"，反复讲"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理由是他划阶级的标准"是从思想角度看的"，他大讲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大发展"，不仅达到"顶峰"，而且是"最高最后标准"！1958年10月25日，他到河南省长葛县视察，听到一个小学的浮夸汇报："用15天学完一年的课程"，康生当即表扬说："这种精神好！"并指令长葛县委应予推广这一"经验"。他在郑州市召开的全国农业院校负责人会议上说："山西有个红领巾，把棉花接在凤仙花上，结出了红棉花"，"红领巾不是科学家，但他敢于做科学研究"。1958年10月30日，康生到了安徽，他在合肥工业大学说："搞反应堆、加速器、火箭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要被这些吓倒了，只要敢于动手，很快就能成功"。"你们要有一个气概，目空一切，旁若无人"，"什么一机部、二机部、哈工大、清华都不要管，就是胡搞就是了"，"你们要胆子大，胡搞就是科学研究。"同年11月，他到上海市，11月4日他参观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时说："明年国庆节时，上海的学校，如能放出三级火箭，放到300公里高空，就考三分，否则，就是二分一分……三级火箭加卫星，得五分。这容易得很，上海人过年都放高升炮，学校难道不会放？"他要上海人要像河南人那样有十分丰富的"想象力"。11月11日他到上海同济大学视察时说：河南省栾川县出了许多"小炼铁家"，"最小的八岁，用小竹竿穿孔，用嘴吹当鼓风机"，"每次出铁三五斤。"

杨献珍在党校讲课

这就是康生在1958年花了六个多月时间，跑了九个省市，分别发表了71份讲话和指示的某些辑录。把他的讲话精神集中起来，不过三句话：鼓吹全面“大跃进”，不顾一切实现“共产主义”，办法就是吹牛撒谎大比赛！

三、杨献珍因对康生提对立意见，惹下大“祸”

杨献珍说：“1959年是我闯祸的一年。”他把闯祸的始末，作了清晰的概述。

起自他对“浮夸风”的揭露和批评。1958年8月，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干部，下放到河南的几个县参加劳动和学习，当时这个省被称为“先进”省，据报道，全省平均亩产小麦一千斤，号称“千斤省”，居全国第一。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当然引得人们去参观去学习。1959年1月杨献珍怀着共产党人的赤诚，抱着忧国忧民的思绪，带了几个干部到河南省看望下放在那里的干部，省委将省代表大会的材料送来，他看了其中一位县委书记的发言（正是他要去的那个县），那县委书记竟然说：“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结论当然是，要搞大跃进，必须虚报。杨献珍第二天到了那个县，和下放了四个多月的干部座谈时，大家情绪不高，到深夜，省委干部不在时，大家才跟他说了真实情况。有的说，报上的宣传和实际情况是两回事，报亩产千斤的地方，刚刚秋后不久，社员就没有吃的了，叫老百姓把红薯藤晒干，磨成面，做糊糊喝。弄虚作假，令人吃惊。

杨献珍对耳闻目睹的上述现象，是苦痛的，对省代表大会的这些材料以为是不足取的。对省委第一书记说的他们不过是“浪漫主义多一点，现实主义少一点”，是难于忍受的。

到了1959年6月12日，杨献珍接见河南省委党校、抚顺市委党校参观组的谈话时，把他在河南省看到听到的弄虚作假的事实也谈了一些，“目的是想让大家以此为戒”。

杨献珍同志大体上谈了以下几条：

第一，弄虚作假问题。有的地方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这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作唯物主义吧！可是在去年，它几乎成了“流行病”。河南的西平县某公社胡吹“小麦亩产7320斤”，有个科学刊物还硬把这一虚构说成真的。这到底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列宁说过，离开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甚至是反动的。有些人把列宁的这些话忘记了。钢铁、粮食都是硬东西，靠说假话办不到。钢是一吨一吨炼出来的，粮食是一颗一颗长出来的。社会主义不是靠吹牛得来的，而是靠一点一点用劳动建设起来的。

党校现在的任务更重了，要培养实事求是的作风，要狠狠批评唯心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不把唯心主义批透，说不一定哪一天还会刮起这种风来。

第二，密植问题。有些人的数字观念，好像是越大越好，搞密植是越密越好，定指标是越高越好。有一个生产队种了一块麦田，指标亩产120万斤，其措施：一是密植；二是施特殊肥料——狗肉汤。他们打死了七十多条狗，煮成狗肉汤浇到地里。由于下种过多，出苗太密，长不成，就割掉四分之三，留下四分之一。照这个算法，留下四分之一还可以收30万斤。谁知没过几天，他们把那四分之一也割了。结果颗粒无收。

第三，“速成风”问题。速成风是浮夸风的另一种形式，去年也刮得很厉害。什么“三天扫除文盲”，“火箭师范学校”，“七天完成全部教学”，“十天学完三年课程，考试门门五分”，这一年真是“天才丰收年”！

第四，“共产风”事实上是反共产主义风问题。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共产风”，其本质是私有制的普遍化。这就是说，你有我也要有，人人都有一点。有的东西如果不能作到人人有份，就毁掉它，谁也不能占有，这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去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马克思的共产主

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要依据条件，可是去年则大批“条件论”，还有人大讲“破坏条件，创造规律”。还有人把浮夸风反说成“浪漫主义多一点”，我看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一的现实主义”！他激情地说，我劝那些搞唯心主义的人歇口气吧，已经“创造”出挨饿的“奇迹”啦，不能再这样作孽了！

第五，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现在有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就好像奴隶主对奴隶的关系，一声令下，群众的一切生产活动都要停下来，去服从他们的瞎指挥。谁要不服从，就把他送去“劳改”，简直是敌我不分。这种人根本不懂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可以有各种形式，但归根到底是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同志式的互助关系。我们党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干部要有群众观点，因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六，干部要讲真心话问题。要让干部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干部不敢讲真心话的风气不好。弄成这个样子有它的原因。现在谁要向领导人提意见，就有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危险。革命干部为革命提点意见，而背上反革命的罪名，死了也于心不甘，谁还愿意再向领导提意见？什么叫党性？列宁说：“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党性”。毛主席说：“主观主义就是没有党性”。我们党是靠唯物主义取得胜利的，什么时候搞唯心主义，什么时候就要碰钉子，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是用人民和干部的鲜血换来的教训。

杨献珍最后说：“讲这些话一定要得罪人，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又不能不讲话。”

没有想到在这些被接见的人中，回去以后有人把这个讲话整理打印出来，到处散发，杨自己还接到一份。他一接到这份打印稿，就感到要“惹祸”了。果然有几处得到此件后，都向康生告发了。这就是杨献珍的“祸源”。

四、康生上谕下诬，冤案迭起。他说杨献珍比彭德怀厉害百倍

康生得到了杨献珍的上述谈话记录，以幸灾乐祸的心态，达谋害忠良的目的，他既不核实材料，也不找杨献珍谈话，就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急急找来他的几个言听计从的心腹，口授如何“攻打”，如何“取胜”，并叮嘱再三，不得有误。康生已经习惯于内部“反奸”、“肃反”的那套“经验”了，凡是他所设想的，就一定按“敌人”对待，就一定成为“敌人”。他得意地认为这就是他的“神奇”的“作为”。在庐山怎样批判彭德怀，他在山下就怎样批判杨献珍，这才显示他跟得快、跟得紧。康生认为，杨献珍比彭德怀还厉害十倍百倍。康生说：“这不仅是向我康生开火，是向社会主义、向毛主席开火，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个漏网右派。”他又说：“杨献珍是一文，彭德怀是一武。指挥打仗，他不能同彭德怀相比；但舞文弄墨，彭德怀没法同他比，他们山上山下，互相配合，一起向党、向毛主席发起进攻。”“杨献珍的问题，十分严重，彭德怀的信，并未发表。而杨献珍的言论，到处传播，很有市场，不能等闲视之，必须认真对待”。这些都成了执行者的上峰指令。

从 1959 年 11 月到 1960 年 7 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由康生亲自领导，连续八九个月的时间，对杨献珍进行了不断的批判和斗争。尽管杨献珍反复作了检查，康生仍不松口，批来批去，给杨献珍定的总罪名是反对“三面红旗”（即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最后杨献珍被迫写了《向党低头认罪》的检讨书，康生方才批准停止批判，杨献珍立刻被解除了中央党校校长职务。

康生的“神奇”，在于整人，被整的人沉默了，但是他却挽回不了国家困难形势的发展，天大的谎话也掩盖不住人民群众的灾难！对杨献珍的迫害，只好暂时收场。

经过困难的挫折，又经过 1961 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启迪，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因此对于 1959 年被批判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同志，对于他们所经受的磨难和不公正的待遇，引起了很多同志的议论，普遍感到，这样搞法，实在危险，实在不得人心！

在群众的呼吁下，党中央对绝大多数受冤枉的同志作出了平反决定，杨献珍也得到了平反，恢复了职务，不过他由中央党校校长降为副校长。

杨献珍对国外读者广播演说

平反以后的杨献珍，并没有为此而消沉，他本着共产党人的良心，仍然兢兢业业地坚守着他的理论岗位。而摆着“理论权威”架势的康生，从来没有承认过失误，也从来没有向受害者表示过一丝歉意。康生自己说：“我这个人有个怪癖，就是害怕安静，一安静人就无所作为了；我就是喜欢天下大乱，越乱越好，乱了才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才华，才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这的确是他得意的自白。

康生怎样施展他的“作为”，怎样显示他的“才华”？就过去说，已经为不少人“领教”过了，谁人不知他在30年代的第三国际作为王明的副手而有所“作为”呢，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在苏联的“反奸肃托”中，被他迫害，或惨死或流放，有多少冤魂落在异国？谁又能忘记40年代在延安的“抢救”运动，所展示的他的“作为”和“才华”？把大批无辜青年诬陷为“特务”、“叛徒”，造成多少冤案？30年代他高呼：“王明万岁！”40年代他又大喊自己遭王明打击迫害！闹得国际国内都“惊天动地”。

新中国建立之后，他的确在“疗养院”、“医院”里，“安静”了若干年，人们没有看到他的“作为”和“才华”。实际上是他对中央对他的工作安排不满，称“病”闹情绪，要挟没有得呈，所以他不喜欢这种“安静”！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对经济形势的好转予以充分肯定，大家的心情刚刚稳定一点，可是康生却发明了“利用小说反党”的怪论，本来“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是他写给毛泽东的一个纸条，毛泽东在会上念了，于是康生就说成“最高指示”。通过小说《刘志丹》，制造了“反党集团”的大冤案，硬说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马文瑞等“为高岗翻案”，替彭德怀抱不平，伙同“反党”。于是康生出马上阵，组织“围剿”达16年之久，株连一万多人，逮捕十几人，死五六人。其实，这是康生应“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号召，以特有的“敏感”嗅出的“新动向”，抢先邀功的举措。也是他的又一“作为”，又是他能“惊天动地”之时。

康生历来凭借权术，捏造罪名，上下株连，进而肆意进行迫害，不知中国共产党有多少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死于他的毒手，这是无法清算的一笔历史血债。但是，康生是以观察“最高领导”脸色伺机行事的阴谋家，又与江青有着密切联系，不管天下大势如何，他都因“我行我素”而得逞。

五、康生穷追杨献珍的所谓罪过，抓住“合二而一”，在中央党校内外组织险恶围攻

1964年4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两位教员合写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短文，对辩证法作了通俗的宣传，在把辩证法通俗表达为“一分为二”的同时，又强调了辩证法的另一种通俗概括——“合二而一”，文章说：“没有一种事物不是‘合二而一’的。”这本是对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解释，看不出有什么奥妙，怎么也得不出反对“一分为二”的结论。最多不过是不同理解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就应按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心平气和的争论来解决。

可是，在康生看来，任何现象，都要放在阶级斗争的显微镜下去衡量，不然就是右倾保守，叛变投降！按照他的布置，应狠批狠斗，管他致残还是身亡！因为在他眼睛里，所有矛盾，全是对抗。

由康生亲自指挥的这场对杨献珍的围攻战，完全是他设下的圈套，是用阴谋设陷阱的手段进行的。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稿子投向《光明日报》，没有想到会落在康生手里，更没有想到会给杨献珍招来这一场大祸。康生将送来的文稿清样，交给由他直接指挥的“反修哲学写作小组”，密谋策划处理。同时，通知《光明日报》：“凡是这类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听候安排。康生一面要“反修哲学写作小组”赶写反击文章；一面指令中央党校，要背着杨献珍，查两位作者与杨献珍的关系，顺藤摸瓜，找出后台，探明谁最先讲“合二而一”的？肯定作者是“杨献珍的代言人”。

康生对这场斗争的领导和布置，都是跟1957年反右派斗争模拟的，一开始他就开宗明义地宣布：“合二而一”论是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辩证法的。因此，他对于每个步骤都是经过密谋策划而后行动的。

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文章；一个星期之后，即6月5日《光明日报》又刊登了《“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反驳文章。实际上是康生要“反修哲学写作小组”指定其成员参战的。

康生为了“钓鱼”，先放出“学术争论”的烟幕，以此为“诱饵”，“引发大家讲话，把观点都亮出来再说”。他把《光明日报》的版面，都作具体布置：“在安排版面上，也要讲究一下策略，可以轮流坐庄，今天把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排在重要版面上，明天再把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排在重要版面上，使人捉摸不透，这样才能把那些拥护‘合二而一’的文章放出来，等放个差不多了，再聚而歼之，那时候，拥护‘合二而一’的人想溜也溜不了啦，大功便可告成！”几句话就和盘托出了康生这个阴谋家的心机。明明是“诱敌深入”的狡诈，却披上了“学术讨论”的外衣。这一点，康生自己在1966年11月5日承认：“1964年‘合二而一’斗争……开始好像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识地搞一下（学术讨论），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善良的理论工作者，哪里晓得这背后的政治陷害呢！

果然，有很多热心的辩证法爱好者，被蒙骗而“上钩”了。因为康生在这一年的9月23日的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和报刊负责人会议上说：“合二而一”，不是“杨献珍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内外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而后他又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下达指令：在参加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讨论中，凡持“合二而一”论者，其姓名、地址和单位，一律登记入册，列为被批斗对象。要报送康生和“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以便“通过各省市的有关部门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

被康生视为“合二而一”之源的中央党校，斗争是怎样开展的呢？

被说成是杨献珍“代言人”的教员，作为突破口受到批判。可是，无论怎样逼迫，都追不出康生所需要的材料。因为文章是自愿合作的，杨献珍事前不知道，怎样成为“代言人”，又怎样成为“后台”呢？

康生急于扩大事态，似乎通过江青得到了什么“尚方宝剑”，于7月上旬就丢掉“学术讨论”的幌子，公开“揭盖子”了。他一方面指示中央党校发动全校职工对杨献珍进行揭发批判；另一方面，又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实际上中央文教小组，康生分管理论，并没有“中央理论组”的组织），令《人民日报》根据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赶紧草拟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文章，经康生亲自主持会议逐字逐句修改这篇文章，花了两天时间方才定稿，用什么人的名义发表，他用尽心机，几度易人，仍感不妥。最后由他决定硬以两位干部冒为“作者”，于7月17日公开见报。

接着《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之后，康生说“要逐渐往政治上发展，下步《红旗》要开展政治批判”。于是康生亲自指挥了这一升级措施，他要《红旗》杂志根据“‘合二而一’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的调子，写了一篇康生授意而又不署康生名字的文章。文章以什么名义发表也要来回折腾，用“本刊评论员”吧，康生摇头说“分量重了”。用

"本刊记者"吧，他又说"分量轻了"。最后由他设计出一个不轻不重的名义，叫"本刊报道员"！不管用什么名义，都得以康生的既定方针为准。他说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这是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而为他们提供的"理论武器"。他指出，所有文章，都应反复论证"合二而一"的危害性和开展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这样一来，批判"合二而一"，批判杨献珍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政治批判一开始，就上了敌我矛盾的纲，一片追逼吼叫声，被批判者只能低头认罪，被剥夺了他应有的辩护权利，对任何诬陷，一申辩就说"不老实"。这场"合二而一"的劫难，使杨献珍受到降职处分，并强令调离了中央党校。

六、康生在"文革"中，又给杨献珍戴上了"奸细"和"叛徒"的大帽子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当然又乘机邀功，案子结了又重提，本来就靠逼、供、信扩展开来，相继株连，这样到处都成了康生喜欢的"天下大乱"。杨献珍除了被扣上"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之外，又有两顶扣在他头上。一是"里通外国的奸细"，二是"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的叛徒。所谓"里通外国"是怎么回事？在建国初期，苏联学者曾秀夫来中国访问。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同曾秀夫是老相识，曹轶欧想招待这位外国学者，需要请位有声望的知名学者作陪，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为此她亲自拜访了杨献珍要求杨作陪参加宴会。虽经杨推辞，最后还是答应下来，只有几个人的便宴。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彼此客气地叙说一番，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奇怪的是，康生没有出席，而是饭后由曹轶欧亲自陪同去见康生。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过程。没有想到，这次陪客竟成了康生和曹轶欧把杨献珍打成"里通外国"的"罪证"！杨献珍被逼无奈地说："如果说我是奸细，那么康生和曹轶欧不就成了奸细的介绍人了？"

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是康生诬陷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位革命骨干的要案之一。抗日战争前，杨献珍等六十一位共产党员在当时的北平市草岚子监狱坐牢，他们坚贞不屈，在监狱里建立了党支部，领导共产党员同敌人坚决斗争。中共中央华北局感到党急需干部，柯庆施向刘少奇提出把监狱里这批干部办理出狱手续，出来承担革命重任。刘少奇同意经党中央批准，华北局派人执行的。六十一人奉党中央之命出狱，早有历史结论，杨献珍系中共"七大"代表，中共"八大"候补中委，继而成为正式中央委员。这些事实，康生都是清楚的。现在康生翻脸了。

康生早就扬言：杨献珍的问题不简单，他在党校的流毒，又深又广，他不是一个人，他的亲信很多，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团伙。"团伙"就是他要挖的又一"反党集团"。

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叫大嚷中，杨献珍成了挨批挨斗的"罪人"，没有半点安宁。虽然已过古稀之年，康生挥笔，将其逮捕入狱，公然开除了他的党籍。关押八年之后，还强令八十多岁的老人杨献珍离京流放到陕西潼关农村劳动。

上下株连，是康生历来办案的"操胜武器"。原中央党校副校长侯维煜，因同杨献珍一起工作，被诬为"反党集团"成员，"文革"中，也被逮捕入狱，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早在1963年就被调到陕西省委党校工作了，同"合二而一"论没有牵连，仅因同杨献珍"划不清界线"，也从西安被揪回中央党校，进行批斗，一直被逼含冤而死。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因看过《"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说过"合二而一"讲少了，1964年被开除党籍，送到农村劳改，"文革"中含恨而死。其他的"合二而一"论者，都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不是受处分，就是被流放。仅据中央党校1964年统计，中央党校因"合二而一"受株连被批判者有154名。其中受党籍和行政降级处分者有7名；受重点批判的有45名（学员13名，干部32名）；小组"帮助"的50名（学员42名，干部8名）；还有在本人档案中被塞上黑材料的50多名。

至于全国各地因"合二而一"而遭受迫害的究竟有多少？确实是个无法统计的"文字狱"大

案。

七、任何权奸，都逃不出历史的公判，康生也是这样。杨献珍97岁时则实现了“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的誓言

据杨尚昆回忆，毛泽东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康生在山西临县郝家坡搞土改，违反党的政策，乱打乱杀，毛又说康生“还是没有改掉这个毛病”。周恩来对康生把四川、河南、甘肃等地的共产党诬蔑为“红旗党（伪共产党）”进行迫害，愤而制止，周说“哪里有这回事”？康生在延安时搞的“抢救”运动，硬说特务遍布，多如牛毛，于是乱斗乱捕之后，任弼时、陈云、李富春、李维汉、陈毅、叶剑英、薄一波等，都分别制止和反对过。陈云曾说过，“康生是鬼不是人”。聂荣臻、李维汉、伍修权都在各自的回忆录中，提出了康生的危害问题。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再一次郑重地提出康生的严重问题，中共中央严肃地清理和审查了康生的罪恶，决定撤销他死时中共中央对他所作的“悼词”，并开除了他的中共党籍，还他“野心家”的本来面孔。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六十一人案”正式平反，杨献珍随之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罪人”生活，从农村回到北京。1979年1月起杨献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顾问。1980年11月，中央党校为杨献珍召开了平反大会，并在全国各大报上公布。对所有因杨献珍案被株连的受害者平了反，中央党校又为孙定国和黎明作了平反昭雪的决定。这样，终于为“合二而一”案在政治上彻底平反了。

杨献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无论在什么危难的处境下，他总是坚定信念，没有丝毫动摇，他不相信康生的恶霸行径会在中国共产党内长期横行，马列主义任他歪曲。他写道：“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千秋功罪，自有评说，谁是谁非，辩证法是会公正地作出判断的。历史将会证明，我是无辜的，我是一个革命者。”

他始终没有屈从于康生的邪恶，在监狱里，在流放期间，没有任何写作条件，可是他却不断地写“抗议书”、“申诉书”，没有纸张，用卫生手纸代替，以坚持真理。

杨献珍在他1973年的《申诉信》中，关于“合二而一”的问题，开头就是“首先要声明几点”：

（一）“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用中国语言来表达的思想方式，而从1964年对于“合二而一”进行全国性的讨伐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合二而一”是杨献珍发明的。我要声明，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种光辉成就，我决不敢掠古人之美以为已有，欺世盗名。

（二）关于“合二而一”，我自己仅仅是在课堂上讲课讲到“对立统一”时，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有了这种认识，当作举例，曾提到过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我自己没有写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原写文章的作者都还活着，可以作证。1964年《红旗》杂志第16期上发表的批判我的那篇文章是别有用心地夸大其词，与实际情况毫不相符。

（三）当提“合二而一”时，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要去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刚开始，就已定了性，说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说“是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放了一支毒箭”。这是有意陷害诬蔑，把水搅浑。因为我没有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对立起来过。我认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表达方法。

他列举道：宋朝哲学家朱熹曾说：“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周易本易》），又说：“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类语》六十七）明朝思想家方以智也说：“‘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气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东西均》，《三征篇》）

在这里，杨献珍不仅在理论上驳斥了康生的陷害，而且在政治上也驳斥了康生的诬陷。康

生只讲分，不能讲合，说到底他讲的是分裂哲学。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除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渊源之外，也讲了马列主义的根据。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生产同消费合二为一和消费同生产合二为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93页）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中说：“‘结合’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事物，还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就是要善于利用国家政权的措施，来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如果现在的情况不是要进行结合，而是已经结合成功，已经合而为一，那我们就可以召集代表大会来具体讨论实际的经验，而不是讨论原则‘分歧’或抽象的理论上的概念了。”他又说：“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三年半的革命期间，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起来。”（《列宁全集》第32卷，7—8、10页原版）

康生的伪装，一件一件的被剥光，赤条条的骗子就显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杨献珍是胸有成竹的胜利者，当他95岁高龄的时候，仍然关注着国家大事，喜悦地向拜寿者询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事物，特别是理论界的新发展。他97岁告辞人间。他实践了“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的诺言。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和清正廉洁的作风，会永远使人难忘！

（责任编辑　杜　晋）

欢迎订阅《老人天地》月刊

《老人天地》是民政部主办的全国性老年杂志。1983年创刊，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可读、可亲、可信，为老年人所喜爱。

《老人天地》宣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老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宣传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信息和经验。

《老年天地》竭诚为老年人服务，报道老年人关心的各种问题，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为发挥老年人的聪明才智牵线搭桥。是老年人的知心朋友，中青年人了解老年人的窗口。

辟有“天地论坛”、“领袖风范”、“人物专访”、“益寿之道”、“心理保健”、“晚晴异彩”、“医药咨询”、“敬老尊贤”、“婚姻家庭”、“政策问答”、“关心下代”、“当代名医”、“琴棋书画”、“花鸟虫鱼”、“老年工作”等栏目。

统一刊号 CN11—1147/C　**邮发代号** 2—290
出版日期：每月17日　**国外代号** M736
定价：每月2.50元　全年30元
地址：北京沙滩后街34号
邮编：100009　**电话**：010—64032528

中国档案报

统一刊号 CN11—0234
邮发代号 1—221　**国外代号** WT—1234

中国档案报由国家档案局主办，是国内外唯一的档案专业报。本报每周一、四出版。对开四版，国内外公开发行。本报集档案、文化、历史于一身，它将帮助读者了解党和国家有关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了解有关国内外档案界的大事以及有关我国中央级和省级档案馆的档案珍藏；了解有关国内外档案学新知识、档案管理新技术以及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取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了解广大档案工作者在改革开放中所展现的精神风采。本报全年104期，月价4.40元，半年订价26.40元，全年订价52.80元。如错过订报时间也可将钱款直接汇至《中国档案报》社。

地址：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21号
开户银行：北京工商银行西四分理处转宣内
账号：417—249002—83
联系人：李更法、王建英
电话：010—66173249
邮编：100032

广　告

日军攻占香港的“C作战计划”

● 马仲廉

香港本是中国的领土，但却被英国殖民统治达一个半世纪；而在半个世纪之前的40年代，又被日本军事占领四年；而后复归英国。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的庄严时刻，正在倒记时。此际，我们每个炎黄子孙，决不能忘记过去的耻辱！

一、突然袭击

1941年12月8日凌晨，天方黎明。香港同胞尚在熟睡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天崩地裂的爆炸声所惊醒。日军飞行队，正在港九上空投弹、俯冲扫射。停在九龙启德机场的英军作战飞机，顿时被全部炸毁。日军飞机同时攻击了停在港湾的英国海军舰只，部分炸弹落入了市区。接着日军地面部队越过深圳中英边界，对港英守军发起攻击。日军攻占香港的作战由此展开。

日军袭击香港几乎是与袭击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展开的。而袭击香港则是日军整个南方作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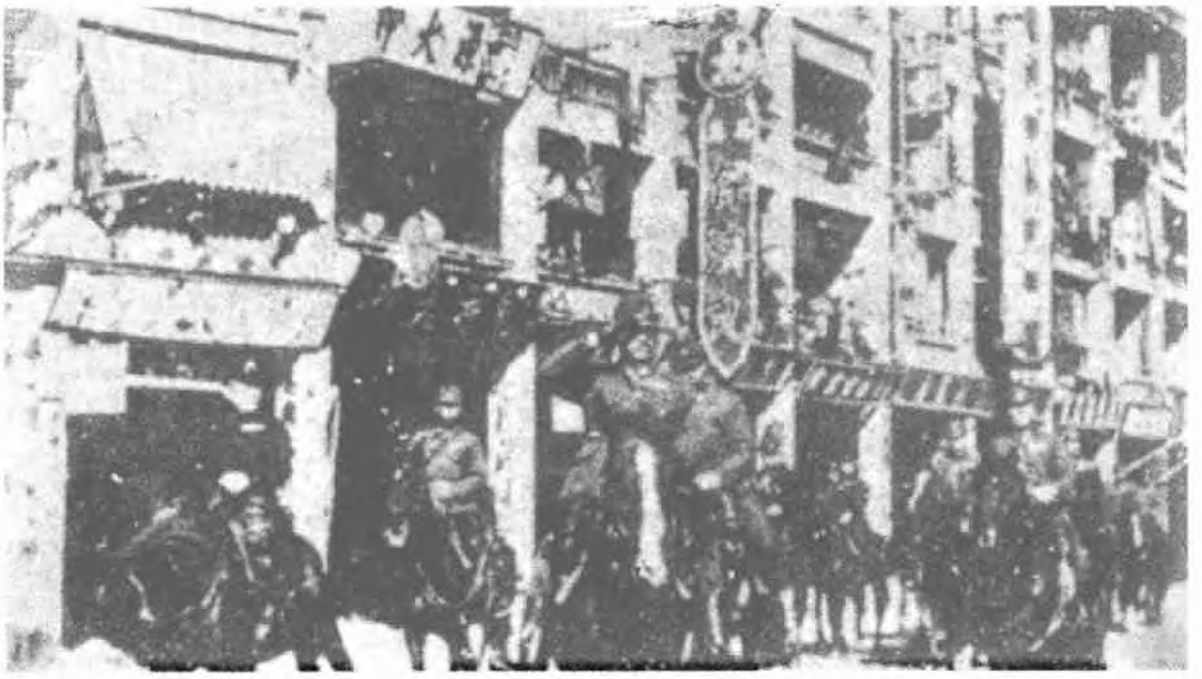
日军在太平洋地区发动突然袭击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其严格的保密与巧妙的伪装，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当时美、英政府及其首脑们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估计不足。例如，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1年8月29日在给其海军部的一封信中说：“我觉得日本绝不会在已经陷在中国的同时对抗美国、英国和俄国现在形成的反对它的联合力量。很可能的是，它将同美国进行谈判，至少在三个月内不作出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动或积极参加轴心国。”直到10月底，他在致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联邦的总理的信中还说：“我仍然倾向于认为日本不致突然对美、英、中、荷四国进行战争，除非是(或者要等到)俄国确实已经崩溃。”他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美国国务院和我一样，相信日本可能终于在美国压倒一切的力量面前退缩。”正因为出自这种判断，英国首脑们把日本对南太平洋的侵略，认为是“意外的事件”，而这种意外的事件“是既遥远而又未必成为事实的”。因此，英国在1941年的战略安排先后次序是：第一、保卫英国本土；第二、在中东和地中海的战争；第三、在6月以后给苏联运送战略物资；最后才是抵抗日本的进攻。

这样的战略布置，使港英当局忽视了日军突然攻击香港的可能性。1940年6月间，日军华南方面军发动了广九作战，占领深圳，完全封锁了中、英边境。这一行动虽给港英当局以很大震动，总督曾命令将部分妇女、儿童及保卫香港无关的人员撤离香港。但总督对这件事发表谈话说：“不仅现在不存在什么危险，预想将来也不会发生危险。”

当时在香港的新闻界人士也认为日本不会与美、英等国开战。正在香港的著名时事评论家乔冠华，对世界战局一向以评论翔实、准确、及时而著称。他在日军发动突然袭击的前一天作时事报告，在答复提问时还说：“日美矛盾虽然很重，但公开打起来还不到时候，日美谈判还不会马上破裂。”而第二天清晨，当日军飞机掠过香港上空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判断的错误。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

“我和夏衍同志住在一个地方。早上袁西星来的时候，爱泼斯坦(现在在北京工作的老朋友)也打电话给我：日、美已经开战了。

“我说：啊？”



日军侵占香港后，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走在香港街头

"他说：'你听，这是日本飞机'。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二、巧妙伪装

1941 年 11 月 5 日，日本天皇批准了对美、英、荷战争的作战计划后，日军参谋总长于 6 日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下达了攻占香港的作战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作战，以第二十三军司令官指挥的第三十八师团为基干部队，进行攻占香港的准备。"

在太平洋上实施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并且以突然袭击作为战争初期取得胜利的手段，战前的保密是最重要的一环。

因此，日军从大本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到担负这次作战任务的第二十三军，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香港作战是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中首批攻击的目标之一。按照大本营作战的准备命令，香港作战的代号为"C 作战"，并规定对香港发动攻击的时间顺序是在日军对马来西亚攻击之后，即南方军在马来西亚方面登陆或首次空袭后立即开始。通报的办法是，当日军对马来西亚发动空袭或登陆时，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和二十三军发出"花开，花开"的讯号，随后再发出，"E 方面的正式作战已经开始"的密电。

为了保密起见，日军大本营派遣高山信武少佐到二十三军指导。并规定，在大本营尚未通报开战时，如以电报询问香港作战开始的时间，由高山少佐发出"海，海"（香港作战可否开始）的讯号。大本营立即回电："山，山"（表示香港作战尚应等待）或"鹰，鹰"（表示香港作战可以开始）。大本营预定开战的时间在 12 月 X 日，规定 X 日不在文件中出现，并避免使用电报传达，如不得已用电报时必须使用密码。

参加香港作战的日军第二十三军第三十八师团，长期驻防于广州西南地区。该师团必须在攻击开始之前推进到进攻出发地的深圳一带。但为了保密，决定在深圳地区除现有兵力外，严禁在深圳地区增加兵力；决定在逐步推进作战部队的过程中，首先将主力由海路和陆路（乘汽车或徒步）推进至虎门要塞附近，面向深圳河一线，作好下一步前进的准备；决定部队均在夜间开进，一律禁止灯火，并在 11 月 30 日前完成部队的集结。

从 10 月中旬开始，日军大量的军需作战物资，由大型运输船运至宝安，日夜搬运上岸。在深圳边境线上担任储备作战物资的北高支队，根据二十三军的指示，部下官兵谎说是为了"准备昆明作战"。北岛支队还宴请宝安伪县长夫妇，席间暗示日军最近要进攻昆明，因此储备物资，要求伪县长对市面上"日军要进攻香港"的传说，予以消除。

为了保密，日军对作战器材和物资的运输和储存，采取了一系列的伪装措施。宝安至深圳间的运行车辆也供居民使用。在深圳方面新储存的弹药，一律存放在房屋之内，不使外人看到。工兵所需的木材，原来曾在英占区方面暴露存放，新运到的材料也故意堆放在原来的地

方。炮兵弹药和建筑材料的运输道路及储存位置，都设在英占地区看不见的村庄以北的洼地里。渡河材料运输时完全覆盖，并在森林中存放。向深圳方面运输物资的汽车伪装成平时补给的车辆，并在白天运输。运输体积大、数量多的物资时在夜间灭灯进行。在以上运输作业期间，原来在边境线上的兵力和警戒配置一切照旧，日常生活均不变动。

日军还规定，对于英军飞机向日军占领区的侦察活动，应极力忍耐，不可轻举妄动。在边境线上如有英军炮击或飞机轰炸，也应以极力忍耐的原则，严禁越境向英方攻击或占领英方地区。如果英机反复侦察，日军作战企图有暴露之虞时，方可将其击落，但严禁飞机向香港领空追击。

三、一场虚惊

日军尽管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由于大量的军需物资输入边境地区，在 11 月下旬，边境部队中传开了很快要进攻香港的流言。这使北岛支队长忧心忡忡。他不得不又采取了一些伪装措施，如，对日本人经营的饮食店和娱乐场所在开战前照常营业；正在这里慰问的日本剧团，按原定计划巡回演出，官兵照常观看；驻扎在边境地区的炮兵情报第五联队的测量中队，在宿营地开办日语学校，教中国儿童学习日语；标定中队故意增建车场，给居民以长期驻 扎的印象。这些伪装措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迷惑作用。但引发泄密的更大的一件事出乎意料地突然发生了！

12 月 1 日晚，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派部附杉板共之少佐携带开战命令及有关文件到第二十三军传达。他乘坐伪中华航空公司上海——广州的道格拉斯三型班机出发。该机在飞越广东大亚湾上空时断绝联络。航空公司立即将此事通知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部陷入了极度混乱中。因为出事地点接近港英占领区。在其附近驻有中国第七战区部队独立第九旅。派遣军总司令部紧急命令第二十三军和第七飞行团进行搜索，并将此事分别报告了参谋本部和南方军总司令部。

日军大本营得知这一消息后受到了极大冲击，而无法以对，只有祈祷神明保佑，不要将开战命令落入敌方中、英手中。

2 日白天，因有雨，从空中和地面到出事地点搜索都很困难。当日 17 时，日军第二十三军发出如下电报："携带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决定开战的重要命令，准备向我军传达的杉板少佐一行九名（机内乘客共 18 名），乘上海——广州班机，昨日在大亚湾附近消息断绝，目前正在努力搜索中。但该机可能在香港附近的英占区内遇难，对此，甚堪忧虑。其所带重要命令如落敌手，对帝国开始作战时最初行动定有极大影响，故有认真研究妥善处理的必要。"

3 日，天气仍未好转，日军搜索仍很困难。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动用了特别情报系统的全部力量，了解中、英方面对此事件的反应。

伪航班机失事，确被当地防军中国国民党独立第七旅所部发现。该部当即对失事飞机实施搜索，并将此情况电报旅部："1 日 14 时，我平山坡附近的部队发现敌机一架坠落在猜稻田（平山坡南方），机体破坏，机体内的 7 人中 3 人死亡，4 人被击毙。目前尚正在调查中，详情后报。"这封电报被日军第二十三军特别行动班窃得。日军以此情报为线索，在 4 日上午 10 时终于由空中发现了失事飞机的位置及损毁情况。根据失事情况判断，开战命令及有关文件可能 已落入中、英方面之手。此情况使南方军各部和正在准备发动攻击而航行的海军舰队均感到焦急万分。

日军第二十三军得知飞机失事地点在英占区附近的中国地区后，立即命令广州的全部飞行队炸碎失事飞机残骸，并从广州派去了密探；命令距出事地点最近的驻淡水的荒木支队立即前往现场处理。在距现场 30 公里的该支队木村大队于 5 日上午到达现场，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射击。该大队终于在现场下方 200 米处的草丛中发现了还活着的空原大吉中尉，将其救出后下山。

携带开战命令的杉板少佐并未死。他和久野虎平曹长两人受轻伤逃离现场，2 日晨下山后将命令等文件撕碎，并分别在数处埋在草丛中。5 日拂晓遇到中国军队的步哨，两人逃散。杉板少佐被中国军队击毙。久野曹长于 7 日晚逃到淡水日军防地。

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了解到上述情况后，确认机密没有泄露。乃分别报告了大本营和南方军。牵动作战全局的一场虚惊，至此才算平静下来。

四、英国在香港、九龙的军事部署

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夺了中国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以后，到日军发动对香港的进攻时止已近一个世纪。在此期间，英国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地实行殖民统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香港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唯一的海军根据地。

1937 年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以后，英国三军参谋总长认为香港海湾在战争开始后，必然受到大陆炮火的攻击，因而决心放弃香港作为英国海军基地的打算。1938 年秋，日军攻占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后，英军又放弃了完成不久的九龙高地要塞设备。此后，保卫香港的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成为"尽可能长期地拒绝日军使用香港海湾"一点了。

1939年日军攻占海南岛后，香港在地理上已完全孤立。英国为防止日军对香港突然袭击，加速了香港的防卫措施。1940年6月，英军在欧洲战线上的敦刻尔克撤退。为应付德国攻击英伦本土已精疲力竭，无暇更多顾及香港。英国参谋总长认识到"日本正伺机把英国势力从中国和香港赶出去"，而他对香港的保卫则作出了如下决定：

"香港并不重要，过去认为当地守备部队不能长期抵抗日军攻击的看法是正确的。即使我们能够向远东派遣强大的舰队，而对已在中国大陆上站稳脚跟的日军，能否确保香港仍属疑问。在任何情况下，香港都不能作为一个前进海军基地使用。对于既不能援救，又不能长期抗战的香港，只能作尽可能长期保持的前哨阵地。对于主张加强守备部队的压力，应当坚决顶住。"

由此可见，英国并没有把香港的防卫放在眼里。而在中国来说，香港的确保，对中国的抗战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入侵中国后，香港成为中国与外国重要的联络点，特别是在武汉、广州失守后，日军封锁了中国沿海港口，香港即成为中国与列强联系的唯一门户，也成为外国援助中国的重要基地。当时，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置了许多对外联系的机构。中国共产党也在这里设立了八路军驻港办事处。1940年8月，中国政府派陈策率领的军事使节团常驻香港。香港当局也派情报人员常驻重庆，还在华南一带建立了防空情报网。此外，在香港还有中国各主要政党的宣传、文化团体，特别是大量出版抗日的报纸、刊物。抗日运动在香港十分活跃。但因香港为英国所占，中国在防卫方面无从插手。

香港英军防卫力量薄弱，有陆军步兵旅四个营。1941年7月20日，C·M·玛尔特比陆军少将接任香港英军总司令。其前任加拿大人A·E·古拉赛特少将在卸任归国途中，访问了加拿大参谋总长要求增援，回到英国后又说服英国防卫当局，结果于10月27日增援加拿大旅(两个营)到达香港。9月10日，杨慕琦就任香港总督，并兼任全军总指挥官。战争开始时，香港英军在驻军总司令玛尔特比指挥下的军队，有陆军香港兵旅(四个营)、加拿大旅(两个营)、香港义勇军、炮兵及各特种兵，共约1.2万人。此外，海军有驱逐舰3艘、炮舰4艘、鱼雷艇8艘、武装巡逻艇15艘和陆战队。空军有鱼雷轰炸机3架、水陆两用机2架。当时，香港有海岸炮29门。空军和防空力量更为薄弱。由于加拿大旅的增援，所以又重新使用九龙半岛从醉翁湾经金山、大围、女神山圣坑口的所谓"醉翁防线"。

五、开战前夕

驻港英军对日军进攻香港的企图虽然没有察觉，但作为保卫港九的任务必须予以重视。而万一发生战争，仅以驻港的部队保卫这一小岛是十分困难的。早在1940年8月，香港防卫司令官就与中国驻港军事使节团达成协议，即以香港的中国人组织义勇军和中国驻华南的两个军与驻港英军协同作战。1941年1月，I·E·台尼斯少将就任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加强了中英之间的军事合作。当时协议，如果香港受到攻击，中国军队应向广东及日军后方采取攻势，以便减轻日军对香港的压力。

1941年10月间，英国远东军司令部及其驻港人员，通过私人关系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取得联系。10月24日，双方第一次接触。英方人员提出，要求中共领导下的海南岛冯白驹部炸毁日军在海南岛的飞机场。英方供应炸药，并要求冯部派人到港学习炸药使用技术，以接济冯部军火和通讯器材作为交换条件。八路军办事处人员提出，应以长期合作，发展海南游击战争为前提，不以炸一次飞机场为限。既为合作，应由英远东军负责人直接参与商谈，并提出冯部在港设立办事处及电台，以便保持双方的联络，还需要一个团的机、步枪运往海南冯部。第一次接触仅为交换意见性质，未作任何协议。25日，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将商谈情况电报中共中央。26日，毛泽东电复廖承志，同意与英方合作，并同意办事处向英方所提条件。

此后，英方又与八路军办事处洽商两次。英方提出，尽量帮助琼崖和东江游击队，并可支付轻机枪500挺和大批炸药。办事处方面除第一次商谈所提条件外，并准备在下步商谈时提出，对琼崖、东江甚至新四军的武装接济。最低要为东江、琼崖装备三个团的武器和医药经费等新的条件。11月14日，廖承志将二次商谈情况电报中共中央。21日，毛泽东复电廖承志并告周恩来，指出："开口不要太大，条件不要太苛，否则将难以兑现，反为不好。"

12月初，英方与八路军办事处又进行了三次谈判。双方初步达成以下协议：一、冯部不设立公开的办事处，以"广南公司"的名义为掩护开展工作；二、拨给琼崖游击队驳壳枪1000支、轻机枪50挺；拨给东江游击队驳壳枪500支、轻机枪50挺。7日，廖承志将谈判情况和进一步与英方谈判的打算电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尚未复电，日军于翌日晨即对香港展开了攻击，使双方合作抗日的计划未能实现。

日军攻击香港之前的行动，英军并非一无所知。11月初，英军司令部即接到了华南日军频繁调动的报告，但司令官玛尔特比在向英国陆军部的报告中却说："虽有很多登陆舟艇，但丝毫未向边境附近活动。"

11月底，英国军方指令玛尔特比注意，“日军攻势将近”。这时，玛尔特比虽作了一些准备措施。可是，由于被日军的伪装所迷惑，英军发现边境日军似乎在后撤。直至4日，玛尔特比仍认为，华南日军进攻香港的条件尚未成熟。在4、5两日内，日军侦察机三次进入英占区上空。6日傍晚，英军已得到了日军三个师团已于5日到达边境13公里以内的情报。但玛尔特比仍然不相信日军进攻已迫在眉睫，7日，他还向英国陆军部报告说：“本人认为，有一万至二万的日军为攻击本殖民地已到达宝安至深圳之间的报告是夸张的。日军从其广州周围及边境附近的防地出发，深恐遭受攻击，因而故意制造这种流言。”

而日军在发动攻击的前夕，继续制造伪装活动。12月6日，英军参谋宝古塞会见日军第一炮兵司令部部员白本进一。借此机会，白本告诉宝古塞：“日军警备队决定于12月15日在边境上举行运动会，请务必前来观赏。”并托宝古塞带酒送给日本驻港总领事。7日，日军命深圳娱乐所的随军妓女十余人，伪装成慰问团的样子，登上深圳南侧高地金牌岭，在英军警戒部队面前走动，以迷惑英军。英军警戒部队的官兵，看看这些花枝招展的日本姑娘，怎么也想不到几个小时以后，日军就从这里向他们发起攻击了。

六、“花开，花开”

12月8日凌晨3时51分，一封贴着红纸的电报送到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部参谋处。司令部的人员急切地打开来看：

“参电第684号

12月8日3时40分发，

‘花开，花开’

参谋总长”

紧接着又接到一封电报：

“参电第685号

12月8日3时40分发，

‘E’方面的正式作战业已开始。

参谋总长”

军司令部的人员立即按照酒井司令官预先规定的计划，发出密码电报：

“波集参电第500号

‘鹰’命令已发出

12月8日4时

军司令官”

8日7时20分，广州机场尚被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日军第二十三军飞行队的战斗机群（九七式战斗机13架）起飞了，接着轰炸机队（九七式轻轰炸机34架）一架架升空，在机场上空编队以后，直飞香港。天刚亮时，日军飞机即到达香港上空。轰炸机队对启德机场和港湾停舶的英军舰只发动攻击，但命中率不高，战果不大，部分炸弹落到市区。战斗机队完成对轰炸机的掩护任务后，下降到低空对停在机场的英军飞机反复扫射，将其全部击毁。

在飞行队出击以后，日军地面部队迅速向边界地区前进。其先遣部队伊东支队分左、右两路，于8日12时30分突过边境，这时发现边境上竟然没有英军守备，于是坦克、汽车、马匹、人员像潮水般地拥过边境向南进击。海军第二遣华支队也在海上封锁了香港。

在九龙半岛上的英国守军，是瓦利斯准将指挥下的大陆旅。该旅以皇家苏格兰团第二营在左，旁遮普第十四团第二营在中，拉吉普特第七团第五营在右，配置在城门贮水池南高地及其两侧的要塞既设阵地上。此外，还配备了榴弹炮兵四个排（炮16门）。该旅的作战任务是阻击日军两周。

香港英军司令部于8日5时得到日军已在马来登陆的情报；拂晓，接到日军沿深圳河前进的报告，于是，在7时15分命令香港全部英军准备战斗。8时以前，边境警戒部队一个连炸毁了桥梁后，撤至粉岭前方占领草山阵地。九龙的海军设施向香港岛南岸转移。驱逐舰撒乃特号及斯考特号准备于当日开往新加坡，停在启德机场上的鱼雷轰炸机和其他飞机，由于奉命准备在适当时机攻击日军主力舰只，时机不到不准起飞，因而在日军飞机攻击中全部被毁。

在日军越过边境向南进击的时候，英军警戒部队未战即撤退，主力占领城门贮水池南方主阵地，准备抵抗日军的攻击。

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于9日10时30分下达向英军主阵地进攻的准备命令，预定攻击准备时间约一周。可是，由于出现了新的情况，使日军攻占九龙的时间大大提前。

日军第三十八师团步兵第二二八联队在向攻击出发地前进的时候，其第三大队的两个中队未奉命令，主动于9日夜袭击了英军城门贮水池南225高地，奋战三小时后，于23时30分占领该地。这一情况，使日、英双方指挥官都感到意外。日军第三十八师团不待攻击准备时限完毕，即于10日展开对英军阵地全线攻击。英军步兵旅长瓦利斯准备反击未逞。255高地是英军九龙半岛防御阵地的枢纽。此地既失，使九龙半岛的整个防御不稳。英军总司令决心撤出九龙，退守港岛。

10日12时30分，英军总司令下令九龙守军全线向港岛撤退。14日，九龙半岛全部被日军占领。

七、日军劝降

日军攻占九龙半岛以后，决定乘胜迅速攻占香港岛。所以，立即着手组织攻击准备。

英军在香港岛上的防御体系是，海岸阵地由铁丝网、地雷区、海岸探照灯、机枪火力点和海岸炮台为骨干编成的。在岛的四角构筑有摩星岭、拉坎角、白沙湾角、龙背半

岛尖端、赤柱半岛尖端及鸭巴甸西部等要塞。这些要塞阵地均安装有面向海面的最新式的加农炮。此外，在岛内还配置有高射炮。高射炮除对空作战外，也有对地面守军支援的任务。

九龙半岛的英军后撤到香港岛上以后，英军总司令玛尔特比，将守备兵力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旅由C·瓦利斯准将指挥，下辖拉吉普特第七团第五营，配置在北海岸，皇家步兵团第一营，配置在南海岸正面，密道尔·赛克斯团第一营(欠二个连)，配置在东南面。西部旅由J·K·罗松准将指挥，下辖旁遮普第十四团第二营，配置在北海岸正面；密道尔·赛克斯团第一营两个连配置在西部36个沿海据点及礼屯山阵地。两个旅均配有预备队和野战炮兵一部。两旅的战斗分界线是赛马场——黄泥涌山峡——浅水湾。总司令部直辖有总预备队皇家苏格兰团第二营，位于湾子山峡；还有各要点的炮台、高射炮部队和海军、空军残部人员。

12月12日，香港总督和英军总司令接到丘吉尔首相的电报：

“我们正在逐日和逐时地注视着你们对于香港这个港口和堡垒的防御。你们保卫着在世界文明史中久已闻名的介乎欧洲和远东之间的一个环节。我们确信香港对于野蛮的而且是无端的袭击的抵御，将给英国历史增添光辉的一页。

“在你们受磨难时，我们所有人的心都和你们在一起。你们抵抗的每一天，都使我们更接近于那必然到来的最后胜利。”

13日，香港总督和英军总司令接到了日军的通知说，将派遣军使到港谈判。接着在当日9时5分，日本军使多田督知中佐等三人，以一个英国妇女作向导，乘一小艇，悬挂着书有“和平使者”的小旗，由九龙驶向香港，上岸后，港英当局派曾经担任过英国驻日情报军官的宝古撒少校与日使谈判。日使带来攻城日军司令官致香港总督亲笔信。宝古撒拒绝收信。经英国妇女调解后，宝古撒将信送总督官邸。

其信全文如下：

“劝降书

我善战之攻城炮兵及勇敢之空军已做好准备，香港覆灭弹指可待。香港命运已定，胜败不言自明。我攻城军念及贵军之命运及香港百万无辜民众，不能一任事态之推移。溯自开战以来，贵军虽努力作战，但如继续抵抗必将断送百万无辜男女老幼之生命，此皆为贵国骑士精神及我国武士道所不忍，望总督深思，立即承诺举行献城会议。倘不接受本劝告，余只有忍泪诉诸武力，以使贵军屈服。”

对此，杨慕琦总督以“我等自信尚有作战的能力，而且我等对大英帝国国王尚未完全尽到忠诚的义务”作答。

日军劝降失败后，于当日晚间在九龙码头隐蔽处用广播喇叭，向香港放送流行音乐，并向香港居民说，日军的停战企图被英国当局破坏，日军将实施登陆作战，日军将协助居民离港避战。这种宣传活动在日军登陆战发起之前的几日里，白天在九龙市街，夜间对香港岛连续不断地进行。

英军拒绝投降，日军认为其原因是未受到正式的打击之故。因此，从14日起以展开在九龙半岛南端的全部重炮和航空队力量，对香港岛上的军事设施进行猛烈轰击。17日，日军大本营指示再次派出军使劝降。在派出之前，为了粉碎英军抗战意志，对香港市区周围进行威慑轰击。

17日9时，日军炮兵和飞机对港岛拉坎角以东，东角以西，正面宽约5公里，纵深500至1000米的市街地区实施集中轰击，雨点般的炮弹和炸弹落在总督官邸周围。香港市街完全被爆炸的烟尘笼罩。轰击延续两小时后停止。接着，日军劝降军使乘小艇驶向香港皇后码头，与英方人员会谈。这次劝降又被英方拒绝。

八、港岛激战

日军再次劝降被港英当局拒绝后，第二十三军于17日20时下令攻击港岛。第三十八师团于18日实施登陆作战，命飞行队予以配合。在香港南方30海里的巡洋舰五十铃号及三艘炮舰，进入南豫水道南方佯动。

18日20时，日军第三十八师团分左、右两路，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展开登陆作战。日军方面上下均认为“只要登陆成功，即是香港的陷落”，“敌纵然企图最后抵抗，但靠开战以来师团第一线部队所发挥的战斗力，定能一举席卷全岛。”

20时40分，日军第一批乘坐折叠船及铁船的部队离开九龙海岸，至21时59分即登陆成功。登陆部队在北角、石莱玛、水牛湾登上海岸。此时，在大埔军指挥所的酒井司令官看到登陆成功的红色讯号弹。他兴奋地和司令部的人员举杯庆贺大功告成。在《大本营机密作战日志》中记载：“昨夜半，香港敌前断然登陆成功。至此英国多年推行远东政策的根据地终于陷落，大东亚新秩序的曙光开始照耀。”

然而，攻占香港岛的战斗并没有如同上述那样乐观。

在日军发动登陆作战前几日内的炮火袭击，给港岛上的英军军事设施以很大破坏。北海岸正面的损失尤大，很多据点中弹，通讯网已被破坏。铜罗湾至白沙湾角之间的14架探照灯，只剩4架可用。海滨正面油库和工厂起火，使这里的防御阵地陷于混乱。但是，当日军发动对港岛的登陆作战时，英军仍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在日军登陆后的18日夜和19

日的战斗中，在北海岸防御的拉吉普特营受到严重损失，军官大部伤亡，全营失掉战斗力。日军攻占了筲箕湾要地。英军东部旅长瓦利斯下令反击日军，但未成功。西部旅长罗松在指挥作战中阵亡。日军第三十八师团佐野师团长九龙指挥所，深感指挥不便，于20日中午渡海在石莱玛角设立了指挥所。战斗至20日，英军已被日军完全分割在东、西两个地区。但英军仍在顽强抵抗。

这时，日军感到了与原来预料的日军一旦登陆成功，英军即将投降的情况相反，战斗进展并不顺利，于是，日军放弃了原来盲目求快的企图，而改变为在步炮协同下逐步攻占英军阵地的方法。21日17时30分，日军第三十八师团下达了新的作战命令，要求师团各部于23日晨进至摩里臣山、金马伦山、香港仔西侧高地、布里库山一线。

21日，香港总督接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电报。其内容是：

“我们闻悉日本人已在香港岛上登陆，深为关心。我们在此间不能断定使登陆成为可能或妨碍对侵略军施行有效反攻的情况。但是决不可有投降的意念。岛上的每一地段都需要争夺，并且必须极其顽强地抵抗敌人。

“应当迫使敌人消耗最多的生命和装备。在内线防御中必须奋力作战，而且如属需要，就逐屋作战。你能够维持抵抗的每一天，你都对全世界的同盟国事业有帮助，并且由于进行长期抵抗，你和你的士兵就能够获得我们确信将应属于你们的那种不朽的光荣。”

丘吉尔致杨慕琦的电报，无疑给正在艰苦撑持作战的英军官兵以精神上的鼓励，更增加了日军攻占港岛的困难。

22日至24日这三天内，日、英两军处在阵地反复争夺的苦战中。但是英军在逐渐地减弱中，阵地逐步缩小。至24日，主要战斗已转移至赤柱半岛上进行。

英军在港岛上的防御作战，在没有希望得到救援的情况下，已到了不能支撑的最后时刻。

九、港督投降

日军大本营曾在18日晚庆祝了香港陷落的胜利。可是，到24日，英军仍在抵抗。而早已决定的第三十八师团在攻占香港后立即调南方军作战。此时，大本营急不可待地督促第二十三军迅速结束攻占香港的作战。第二十三军期望能够在圣诞节前迫使港英当局投降，在24日又集中炮火对香港市街轰击，接着第三次派出使者劝降。

25日晨，日军派遣被扣留的英国退休炮兵军官，当时为九龙造船厂负责人的C·M·玛纳斯和香港评议会执行委员A·H·C·西路滋到杨慕琦总督处劝降。杨慕琦会见了他们，然后召开防卫委员会。委员会决定对此次劝降仍置之不理。杨慕琦即让此二人传话给日军：“香港现在尚未丧失抗战的武力，仍继续战斗。”

日军第三次劝降失败后，于25日下午集中飞机、炮兵火力对港岛上的仓库山峡、湾子山峡、歌赋山、扯旗山、西高山大肆轰击。英军总司令玛尔特比于当日15时45分向总督报告战况说，巴里秀山已失；仓库山峡及北海岸阵地正在瓦解；机动火炮只剩8门，弹药告罄。军队已无法进行更有效的抵抗。于是，港督、总司令同防卫委员会的民间委员会商讨后，作出停战决定，并于16时下令英军停止战斗。

17时过后，港督派出乞降军使R·G·拉姆中校、H·W·F·斯蒂瓦特中校和H·J·白奈德少校三人，打着白旗，到达加路轮山西北端三叉路圣保罗医院的日军铃川部队本部洽降。日军要求总督和总司令亲自前来洽降。

18时20分，杨慕琦总督和玛尔特比总司令来到铃川部队本部正式举行投降会谈。日军参加会谈的是第三十八师团参谋长阿部芳光大佐。第二十三军司令部参谋多田督知中佐在座。

阿部：“是无条件投降吗？”

杨慕琦：“完全无条件投降。”

阿部：“能向全军命令立即停止战斗吗？”

玛尔特比：“已于16时发出停止战斗命令，但要派出军使中的一人前往赤柱方面部队进行联系。”

随后，阿部向英方宣布了英军投降的一些具体事项。

19时，杨慕琦和玛尔特比在多田中佐带领下渡海到九龙半岛顶端的大饭店三楼。这里是日军第二十三军指挥所。在这里，杨慕琦和玛尔特比向酒井隆司令官正式投降。

日军第二十三军于19时30分发出停战命令。大本营于21时45分公布占领香港。

12月27日，日本天皇召见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颁发如下诏书：“在中国派遣军及中国方面舰队的密切配合下，开战之初即以适当措施处理了敌国在华利益，同时并迅速果敢攻占香港，使英国重要根据地终归覆灭。朕对此深为嘉许。”

对于香港的投降，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讲过下面一段话：

“守军支持了一个星期。每一个能够拿起武器的人，包括来自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的人员，都参加了拼死的抵抗，与他们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相媲美的是英国平民的坚忍精神。在耶苏圣诞节那天，已到了维持不下去的极限，因而投降成为他们不可避免的事。在他们坚毅的总督马克·杨爵士（指杨慕琦——引者）的领导下，这个殖民地已经打了一场漂亮的仗。的确，他们已经获得了应当属于他们的那种‘不朽的光荣’。”

（责任编辑　萧　徐）

李默庵纵谈湖南起义

● 高建中

湖南起义是于解放前夕，在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国民党军队发起的一次重要的和平起义。湖南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个伟大的胜利，她震撼了西南、西北、华南的国民党的残余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这次起义中，起核心作用的是程潜、李默庵和陈明仁三位高级将领。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知道了程潜和陈明仁参加湖南起义的过程。由于李默庵在组织和策划起义中间出走香港，后到阿根廷和美国定居40余年，所以人们对他在湖南起义的经历知之甚少。而他的经历，又是我们全面了解湖南起义的重要一部分。如今，程潜、陈明仁都已作古，唯有李默庵尚健在。

李默庵是黄埔军校一期生，湖南长沙人，他先后担任过蒋介石基本部队的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和绥靖区司令等职。1990年，李默庵回到北京定居后，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第八届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等职务。如今，他已经是92岁的老人了。

自1992年起，笔者应邀为李默庵老人执笔撰写回忆录。这期间，我听李默庵老人反复回忆叙说了自己参加湖南起义的过程，并查证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与李默庵老人进行了核实。老人满怀深情地畅谈了当年的情景，并拿出了自己所写的多篇文章供我参考。据此，笔者整理了此文。

支持程潜参加副总统竞选

1946年3月底到5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这期间，进行了总统和副总统的竞选，蒋首先被推上了总统的宝座。而副总统的竞选，则在李宗仁、孙科和程潜等人选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当时，李默庵任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住南通。竞选开始前，武汉行营主任程潜派杨继荣来到南通，游说李默庵支持程潜竞选副总统。李默庵得知此事，分析了形势认为，程潜是自己的老上级，同是湖南人，杨继荣又是戴笠派到程潜那里的人，于是决定支持程潜竞选副总统。他从“剿匪”经费中拿出20亿元，相当于当时的1500美金，并且派出了九部车，开到南京，资助程潜的竞选活动。李默庵回忆说：“我当年支持程潜竞选，主要是因为：一是程潜与我的个人关系；二是我一向佩服和敬重程潜。”

李默庵回忆说：“程潜有三个为大家称颂的特点：一是程潜带兵大气磅礴，没有私心。他的战区的部队无不服从他！就连土匪出身的孙殿英也不得不佩服他。二是程潜做事大义凛然，顾全大局。抗战期间，国民党不少高级将领拥兵自卫，唯恐自己的军队被日军吃掉。程潜则不然，他积极派出自己第一战区的部队到第五战区支持兄弟部队作战，取得了台儿庄对日作战大捷。三是程潜参与决策并指挥了黄河掘堤，迟滞长驱直下的日军达半年之久，为国民党军队的调整和整顿，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为长期抗战赢得了机会。当然，这种以水滞兵的办法，给老百姓带来了惨重的损失，也有人极力反对，可以说是毁誉参半，而我对于这种做法是赞同的。”

程潜得知李默庵支持他竞选，也很高兴。但是，竞选的结果，李宗仁获胜，程潜失败了。随后，引发了湖南问题。

程潜保举李默庵当湖南省主席

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以后，李默庵出于礼貌和关心，特地从南通赴南京看望程潜。程潜向李默庵讲述了他参加竞选的经过，对蒋介石千方百计控制竞选的种种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同时，他又向李默庵讲起了湖南问题。

当时，湖南的党（国民党）、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冲

突很厉害，党派为CC系张炯把持，团的一方则接近于军方，为黄埔系将领李树森负责。两派斗争，影响政局，省主席王东原控制不住局面，搞得一团糟。程潜历来被认为是湖南人的家长，他对于湖南的局势最为关心，有一次。他对李默庵说："湖南人打仗，出人出力最多，可在中央政府，连个部长也没有，'内不入阁，外不封疆'，原因就是窝里斗，弄得湖南人在中央里面受歧视，这次，非改组湖南省政府不可！"

对于程潜的这番话，李默庵深有同感，他表示支持程潜的主张。但是，他没有想到，不久后的一天，程潜突然通知李默庵，说要带他去见蒋介石，并说已经向蒋保举他去湖南当省主席。李默庵自然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他分析，在当时的黄埔一期同学中，有好几位已经当上了省政府主席，由他担任湖南省主席，也是够资格的。

但是李默庵没有想到，面见蒋介石，寒暄以后，蒋对他说："程主任保举你当湖南政府主席，你去湖南，带上赵君迈，让他当民政厅长。"赵是蒋经国的人，时任上海渔管处的处长。李默庵知道蒋这样安排，是为了照顾赵，当即点了点头。可是，蒋又说："你到了湖南，人事问题要多向程主任请示。"蒋的这句话，李默庵听了有些纳闷，程潜是武汉行营主任，湖南并非武汉行营管区，蒋为什么要自己在人事问题上多向程潜请示呢？

李默庵和程潜谒蒋是星期五。第二天，南京、上海的报纸就登载了李默庵要去湖南当主席的消息。按照常规，到了下周一，行政院例会应该提出改组湖南政府的议案。可是，一连过了好几天，行政院那里还是没有消息。李默庵分析，蒋介石的本意未必是愿意自己去当湖南省主席，不过是碍着程潜的面子，他没有当面拒绝就是了。

当时，正是"国大"会议召开以后，湖南的"国大"代表、立监委员及其他政治名流多云集南京，人数众多，派别各异，各自为利害争斗，环境很复杂。李默庵要到湖南当主席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CC系生怕李到了湖南，会站在靠近军方的三青团一面，对他们不利，于是多方阻止李去湖南。而在湖南，则由党的一方出面，电请中央挽留王东原继续担任省主席一职。另外，还有贺耀祖老先生等人，四处活动，想当湖南省主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对李造谣诽谤，说他是在走程潜的路子，向上爬等等。

基于这些情况，李默庵与他的好友、黄埔一期同学贺衷寒、袁守谦协商，他们认为，蒋所说的要李默庵在人事问题上多请示程潜一语，值得注意。因为依蒋的一贯作风，凡是自己培养的学生，极不愿意非亲信者保荐任高级职务。

因此，蒋的本意是不愿意李去湖南省当省主席的，但是，有碍于程潜保举的情面，他不便于拒绝。李默庵经过考虑，决定不放弃现任军事职务，不卷入政治漩涡。于是，他联合贺、袁，以他们三人的名义，邀请了一些"国大"代表到贺衷寒家里，让贺摆了几桌酒席，李默庵则事先准备好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席间，他宣读了这封信，意思说，湖南问题复杂，自己没有离开过军队，没有地方工作经验，请免派湖南工作。随后，他将这封信呈送给蒋介石，同时将信的副本送给了程潜。

程潜屈就湖南省主席

对于一些阻止李默庵当湖南省主席，特别是贺耀祖老先生的挑拨是非，湖南党方的卑劣手段，使程潜更加看清了湖南问题的严重性，他也就更加决心改组湖南省政府。而在这时，蒋介石却一再督促程潜赶快回武汉，在两周内，他三次让侍卫长俞济时派飞机，面请程潜启程，飞机随时准备起飞。同时，蒋还让湖南参议会议长何成，率地方各团体联名电请程潜，要他回湖南坐镇。原因何在呢？

原来，李宗仁竞选当上了副总统，桂系势力抬头，蒋介石很恼怒，据说，当他在收音机旁听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的消息，气得竟然一脚踢翻了桌子。当时的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是个空头衔，他对于蒋不信任他，是心怀不

王劲修（左二）、彭杰如（左三）是李默庵（中）的老部下，图为1937年冬，第十四军在山西赵县休整时，他们与前来慰问的李公朴合影

满的。这时的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作战，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陷入劣境，国统区经济全面崩溃，全国反蒋呼声日益强烈。白崇禧看到时势是非，深有图谋，他亟思谋得一个能够掌握兵力的指挥机构，以便于抓住军队，扩张势力。他经过多方策动，成立了“华中剿匪司令部”，由他担任总司令。对于这个方案蒋本来是很不满意的，可他为内外局势所困，勉强同意了，但他同时指定“剿总”总部设在九江，有为难白之意。而白崇禧则坚持将总部设在武汉。武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白要驻武汉，对蒋的破坏力极大，蒋自然极力反对。蒋驳斥他的理由是，武汉是行营管区，不宜在行营管区内再设置军事机构。

在这个问题上，蒋、白争执不下。白崇禧为了要挟蒋介石，竟然跑到上海去，要撂挑子不干了！蒋介石则以程潜回武汉坐镇行营，来阻止白崇禧。

程潜看到了这种局面，迟迟不动，他的基本想法有两个：一是不愿意介入蒋、白之争，他曾经对李默庵说，“他们（指蒋、白）争斗，我才不愿意去当马前卒和挡箭牌呢！”二是程潜决意改组湖南省政府。他多次公开说：“湖南问题不解决，我绝不离开南京！”

在这种情况下，程潜接到了李默庵给蒋介石的信的副本，对于李默庵不去湖南当主席的决定，程潜感到很意外，也觉得有些难堪，一气之下，他愤愤地说：“李默庵不干，我来干！”

“李默庵不干，我来干！”这本是程潜的一句气话，但他没有想到这一句气话传到了何应钦的耳中，却被何应钦利用了。何应钦是接替白崇禧任国防部长的，为了反对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他与白搞到了一起，他并不明白蒋介石拒绝白崇禧的原意，得知白要驻武汉，他曾经热心于为白奔走劝驾，当他听说了程潜自己说要去湖南，虽说知道程说的是一句气话，却也触发了他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他寻思，如果程潜去湖南，就可以解散武汉行营，蒋介石也没有理由拒绝白崇禧进驻武汉了，

然而，何应钦明白，程潜是国民党元老人物，他的行营主任的职务是管辖几个省的，让程潜仅作湖南省主席是说不过去的。于是他便想出个主意，把江西划给程潜，成立绥靖公署，管辖湘赣两省，让程潜担任湘赣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他怕程潜不同意，还答应报请中央批准让程潜扩建五个师的军队。为此，何应钦四处奔走劝驾，最后，弄得蒋介石也没有办法，只得同意这一方案。

对于这种安排，程潜也表示同意，随后于1948年7月中旬，回到长沙上任。虽说他是湘赣两省的绥靖公署主任，但是，就担任湖南省主席一职来说，他是屈就的。

再说蒋介石看到了李默庵的信，在程潜的安排确定下来以后，他便召见了李默庵。一见面，蒋介石便对李默庵说：“你的信我看到了，湖南政治情况复杂，你不去也好。”李默庵则乘机解释说，自己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即跟随校长服务于中央基本部队，20多年来没有离开一天，自己与程潜的关系，仅仅是出于尊重和礼貌，每一次来南京，都要看看他。蒋介石说：“这个我知道，你年纪尚轻，将来还有很多机会，现在程潜已经被任命为湘赣绥靖公署主任，他年纪大了，你去当绥署副主任，帮助他好了。”李默庵理解蒋介石的话，有暗示将来让他做湖南省主席的意思，便高兴地答应了。李默庵回忆说：“我就是这样随程潜到湖南工作的，并不像有些文史资料讲的，我是被蒋介石派到湖南去监视程潜的，也不是程潜保举我去的。”

有意思的是，无知的何应钦，还以为自己的安排打开了蒋、白争执的僵局，完成了调解，皆大欢喜，不料实际上他是破坏了蒋对于桂系斗争的部署，蒋对他自然很不满意，以后蒋被迫下野，李宗仁取代总统，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由于蒋的制肘，不到一个月，何应钦就垮台了。

决心随程潜走 和平起义的道路

李默庵到了长沙，任湘赣公署副主任，担任第十七绥靖区司令。他以主要精力协助程潜工作。

程潜上任以后，着手进行了五个师的部队的筹建工作。同时，他对地方武装进行了扩编并通过一系列政治措施，取代张炯担任了省党部的主任，改选了省参议会，调整了长沙警备司令人选，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站住了脚跟。

这个时期的程潜，虽然表面上高谈“戡乱”，表示要与“共匪”拼到底，但是在思想上，他对蒋介石已经失去了信任，对蒋的政权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特别是到了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完成了辽沈战役，平津、淮海战役也胜利在望，局势已经明了，李默庵和程潜都看到，属于蒋介石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他们不能不在新的局势面前作出选择，李默庵回忆说：

“当时，我想，我当初投奔革命是为了响应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伟大号召，后跟随蒋介石，相信他是中国新型革命军事的卓越领导人，完成了北伐大业，完成了抗战大业。但是，就在他的个人威望达到顶峰之际，蒋介石不惜忽视全国人民饱经战争苦难，极思和平安定的共同愿望，仍然采取战争政策，以致遭到众弃，蒋介石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一样，最终走上了由全盛到衰落到败亡的老路，这是历史发展前进的自然法则，如果我们仍不认识和觉悟，仍然坚持原来的路线，必然随之由

原来的革命变成反革命，被时代潮流所淹没。

“再者，程潜和我都是湖南人，我们也都不忍心看到家乡继续蒙受兵燹浩劫之灾，因此，在12月下旬，我同意并支持程潜发表通电，主张走和谈之路。当时，李宗仁、白崇禧也是主张走和谈道路的，但是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趁蒋所处的困境倒蒋，实现桂系一统天下，并非是真正要走和平道路。我们要坚持走和平之路，但不是李宗仁、白崇禧那样的有图谋的和平道路。剩下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与中共联系，弃暗投明。

“开始，我与程潜虽然没有明确达成共识，但是都有这样的倾向，在工作中，很默契地朝这个方向走。”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共地下组织的人员开始进行动员程潜起义的工作，也派人来到了李默庵的门上，过程是过样的——

程潜上任以后，创办了一张报纸，好像是叫《民国日报》，而李默庵在长沙有一位旧友欧阳敏讷。1939年，李默庵担任国共合作创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时，欧阳先生曾任干训班的教员。1940年，李默庵驻江西时，创办过一张《开平日报》，他曾经请欧阳先生主持过这张报纸的业务工作。李默庵到了长沙以后，又见到了欧阳先生。当李默庵得知欧阳先生多年以来一直从事报纸和刊物的工作，马上把他推荐给了程潜，让他担任了《民国日报》的社长。

这位欧阳先生是一位进步的知识分子，他常到李默庵的住处，与李谈论时局，分析中国的前途，他们彼此很是谈得来。

有一次，欧阳先生来到李默庵处，他坦率地告诉李默庵说，程潜已经和中共地下组织接上了头，谋求拯救桑梓的新路。他问李默庵是不是赞成？由于事关重大，李默庵表面上虽然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很高兴。

欧阳先生走了以后，他马上来到程潜的住处。

自参加竞选以来，李默庵虽然没有按照程潜的保举坚持到湖南来当省主席，但是，对于李默庵的处境和选择，程潜很是理解，他们依然亲密相处，无话不谈。对于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他们是心有灵犀的。见面以后，李默庵直截了当地问程潜：“听说程主任要走和平起义之路，以救湖南？”

程潜听罢，似有准备，他哈哈一笑说：“难道默庵以为有其他出路？”李默庵立即回答说：“主任审时度势，深明大义，决断英明，其实我也早有此心，有主任领衔，我决心追随，决无二意。”

程潜听了李默庵的话，拍着手掌说：“好，好，有默庵助我，同此义举，事必成功！”

从此以后，李默庵与程潜的关系更亲密了一层，他们常常在一起商量有关起义的重要问题，配合很是密切。

程潜感召陈明仁

程潜和李默庵确定了要走和平起义的道路，都认为白崇禧是最大的障碍和危险。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不断胜利，蒋介石政权的败局日渐明朗，美国不再信任蒋了，而桂系则趁机与美国建立联络，妄图在美国的帮助下，占据华中战略要地，以两广为支撑，以海南为后方，建立封建割据局面。

为此，桂系妄图借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消灭蒋军，在淮海战役时，他们极力阻止蒋军集中，时黄维兵团，原在华中地区，蒋介石调黄维入徐州参加会战，被白崇禧延误一个多星期，导致黄维兵团被歼灭在行进途中。白崇禧还力阻在宜昌附近的蒋系之有力第二军东进蚌埠，当时，第二军已经在宜昌上船准备开进，却因为白崇禧的阻拦，又下了船，同时，白还把持桂系的三个军的兵力于徐、蚌以西地区，不让其参战，坐观成败。徐州会战结束后，白崇禧则逼蒋下野，由李宗仁取代总统。

之后，李、白虽然高喊和平，向中共发动和平攻势，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建立封建割据局面，图谋与中共战斗到底。按照白的部署，如武汉受到解放军威胁，他随时可放弃武汉，南移湘南，这就对湖南的和平解放造成了直接威胁。

为了对付白崇禧，李默庵与程潜都想到了陈明仁。

到了湖南以后，承蒙程潜的信任，李默庵推荐了跟随他多年、交情甚深的黄埔一期将领刘嘉树担任了绥靖公署的参谋长，刘嘉树是陈明仁的很好的朋友，也是很好的牌友。而担任第一兵团副司令的刘进，与李默庵和陈明仁同是广州陆军讲武学堂的同学，他们又都是程潜的学生，有这样一些天然关系，程潜和李默庵都认为争取陈明仁是可能的，如果陈明仁和他们一同走和平起义的道路是最好的，退一步来说，至少可以通过他来通风报信，以便对白崇禧加以防范。

经过几番计议，李默庵和程潜决定采用“掏心”的战术，利用白崇禧攫取湖南的野心，把陈明仁拉到湖南来。同时选定他们的老朋友刘斐去游说白崇禧。

这时的白崇禧认为陈明仁是死心塌地依靠他的，他听了刘斐的游说，认为让陈明仁到湖南，有利于他通过湖南联结广西，能战能退。而陈明仁也觉得回湖南对于自己扩充实力，保全前途有利。这样，几方面虽然是各有目的，但是在陈明仁回湖南的问题上，竟然一拍即合。于是，陈明仁于1949年2月中旬，率部来到了长沙。

陈明仁到了长沙以后，很快拜见了程潜。在谈话中，程潜了解陈明仁很珍惜他们之间的师生友谊，对蒋介石撤他的职是耿耿于怀，极为不满。他投奔白崇禧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从中程潜感到争取陈明仁有了几分把握，

可是，怎样向陈明仁摊牌呢？程潜又和李默庵商量，李默庵说，这样重大的问题，即使是再好的朋友也不便直说，于是他建议程潜找人从中周旋一下。程潜则让他的族弟、参加湖南和平起义的另一位核心人物程星龄安排，程星龄从陈明仁的老家找了一位教书的老先生。按照程潜的意思，这位老先生来到了陈明仁处，他婉转地向陈明仁分析了时局，转告了程潜准备进行和平起义的想法，消除了陈的一些顾虑。这样，陈明仁初步表示了同意随程潜一同起义。

有了这样的基础，程潜才又约见陈明仁。他们交换了各自的想法，在起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同时，程潜嘱咐陈明仁，继续以反共的面孔出现，以取得白崇禧的信任，暗中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和共同维护湖南的政局等问题。

“拥程”与“驱程”的斗争

走和平起义道路的方针既定，稳定湖南政局，拥护程潜主政，便成为首要的工作。白崇禧为了实现其实施封建割据的野心，将程潜视为障碍，欲加以除之而后快。李宗仁当了副总统以后，李、白串通，曾多次要程潜去广州当考试院长，调虎离山。程潜则巧妙应付，用心周旋，坚持在湖南主政。围绕在“拥程”和“驱程”问题上的斗争，成为和平起义准备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李默庵积极配合程潜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巩固程潜的地位，发展和壮大和平起义的力量，抵御桂系染指湖南，李默庵建议程潜开展了湖南人团结自救运动。程潜同意以后，李默庵和程星龄、萧作霖、邓介松等人商议，联合参议会议长唐伯球，共同发起了湖南各界人士大团结活动，颂扬程潜的资望，大造拥护程主任的声势。时唐生智在湖南东安家乡闲居，他是国民党资深的老军人，北伐期间，他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第八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等职。抗日期间，他曾任南京警备司令。南京失陷以后，他遭到了国人的责难，辞官回家了。他与蒋介石积怨很深，在湖南人中有较大的影响。经商议，程潜和李默庵等人将唐生智请到长沙来，主持长沙各界的大团结活动。唐生智到任以后，李默庵经常和他筹谋湖南人的联合、团结、自救等方案，召开会议，扩大组织，得到了地方有力绅士的支持，使湖南和平运动揭开了新的一页。

四月间，大家得知白崇禧决定移住长沙以后，有些焦虑不安，都认为，白崇禧到了长沙，势必要影响和破坏和平起义的大局。为了对白加以防范和抵御，掌握住白崇禧的举动，李默庵觉得关键还是要利用白以为陈明仁是他新近收的心腹，对陈深信不疑的心理，利用陈暗中帮忙。为了便于陈及时沟通与绥靖公署的联络，统一安排行动，李默庵建议程潜将长沙警备司令一职，由萧作霖换为陈明仁。“剿总”和绥靖公署是不同的两套军队机构，依惯例，各自有各自的人事安排，互不兼任职务，破例使用陈明仁，也符合白崇禧的胃口。程潜差人去一说，白崇禧就同意了。

四月下旬，白崇禧移住长沙的风声更紧，对此，湖南各界一致主张给予抵制，联合商定举行十万人的大游行。与此行动相配合，由程潜上任以后组建的嫡系第三一四师准备对粤汉铁路长沙近郊的捞刀河及新河两座大桥实施破坏，以阻止桂军南撤。听到这个消息，李默庵认为极为不妥，他立即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紧急商榷纠正办法。第三一四师师长陈达认为，炸桥才能阻止桂军南撤，才能拒白保护湘政。李默庵分析说，此举虽然能够迟滞桂军南移，但是，顶多能够迟滞桂军两三天，而且很容易引发军事冲突。一旦发生战事，长沙方面没有足够的兵力与桂军相对抗，反而为白崇禧“驱程”找到了借口，陷程潜于不利。于是，李默庵坚决制止了这次军事行动。

对于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李默庵也表示反对。他对大家说，程主任主张走和平起义道路，大政方针已定，对此，湖南的军统特务和长沙的特工人员似有察觉。搞这么大的活动，如果闹出乱子，会让程主任很难处理，也会为白崇禧抓到把柄，不利于湘政。

经过反复做工作，大家才统一了认识，取消了活动计划，然后发出了紧急通知。处理完此事，已经是深夜了。

扩充和平起义的武装力量

程潜回湘主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湘赣绥靖公署可以扩建5个师的兵力。程潜上任以后，对这一问题自然十分重视。他与李默庵多次商议，很快确定了人事编制，随后招募新兵，筹措军费，各项工作抓得很紧，进行得也很顺利。但是，人事任命上报以后，军事委员会却迟迟批不下来。李默庵与程潜分析了原因，认为可能是蒋介石对此事不放心。为此，李默庵找了湘赣绥署的另一位副主任黄杰，让他在因公谒蒋时，当面催办。这样，人事任命才批了下来，可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时间。

在扩建正规部队的同时，程潜还决定扩充和编训地方部队，意在抓住自己能够控制的牢靠的武装力量。有一次，程潜向李默庵提出了此事，李默庵马上理解了程潜的用意，他向程潜建议说：“此项工作非用一个能干而

且牢靠之人，不知颂公意下如何？”程潜马上追问：“是谁？”李默庵说：“此人便是王劲修。”

王劲修是李默庵的老部下，跟随李默庵十几年。在抗战初期的忻口战役中，李默庵是第十四军军长兼任左翼方面军的指挥官，王是李的副军长。后来，李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长，王又担任过副教育长。此间，李默庵兼任了湘鄂赣边区游击挺进军的总指挥，李又推荐王担任了他的副总指挥。后来，王劲修因为工作不顺利，在湘鄂赣边区撤销以后，无意从政，在长沙老家闲居。李默庵随程潜回湘，王得知此信，主动前来看望了李默庵。那段时间，李、王和刘进等人经常接触，他们无话不谈。李默庵了解到王对蒋介石政权已经丧失了信心，有依靠他和程潜谋求出路的想法，加上他有编练部队的经验和能力，便极力推荐 他来抓地方武装。

程潜听了李默庵的介绍，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李默庵便邀请王担任了绥靖公署保安副司令。并告知王，程潜已经同意，由程潜亲自担任司令一职。于是，王劲修欣然答应下来，并当即上任，着手整顿地方武装。

过了几个月，陈明仁到了长沙以后，为了配合陈明仁加强第一兵团的工作，防范白崇禧，李默庵与程潜商议，改派王劲修担任了第一兵团副司令。此事，经过了好一番工作，才得到了白崇禧的同意。王劲修到了第一兵团以后，在争取部队起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湖南起义时，王作为主要代表之一，参加了与人民解放军的谈判。起义之后，他担任了军长。

王劲修到了第一兵团以后，李默庵又向程潜推荐了他的老部下彭杰如。

彭杰如也是黄埔一期的，也是湖南人。他也是跟随李默庵南征北战几十年的老部下。李默庵在抗战以前担任第十师师长的时候，彭杰如就是他的参谋长，李默庵在抗战前夕担任第十四军军长时，彭杰如接替李担任了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后，彭杰如到了东北，他曾经担任过东北“剿总”副参谋长兼第一兵团副司令，辽沈作战以后，国民党军队基本被歼，彭杰如转回老家湖南益阳闲居。李默庵到了长沙以后，彭杰如也马上来见李默庵，他们久别重逢，情谊深厚。李默庵了解了彭杰如的思想，坦诚地邀请他参加和平起义的工作。关于这一过程，彭杰如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到长沙以后，我首先与李默庵、王劲修、刘进、黄雍（均为黄埔同学，又同事多年）等几个人接触，从谈话中，我察觉他们有倾向和谈的苗头。李默庵有一次到我家，用试探的口气说：‘杰如，你刚由外地回湖南，对现在的局势看得一定很清楚，你个人有何打算？’我便把在北平和陈铁（曾任东北“剿总”副司令）的话对他讲了一遍，内容是把希望寄托在国共和谈上，但我们得先抓点‘本钱’（即军队）才行。他笑了笑，追问一句：‘现在时机紧迫，你想究竟怎样才好？’我说：‘我的想法和你差不多。依我看，还是抓点军队，反战主和，才有力量。’李这次还对我简略谈了程潜的主张，这正是我想打听的消息。隔了几天，李请我和王劲修吃饭，席间李对我说：‘颂公对我们这些同学和旧部非常关心和爱护，昨天提到了你，你可以去看看他。你的事，我已经和他谈了，咱们大家同在一起搞吧！’

“1949 年 3 月 2 日，沅陵发生事变（保安团长王援华纠合当地土匪，一度攻陷沅陵城）后，王劲修坚辞全省保安副司令职，李默庵力保我继任。程潜亲赴保安司令部传达和安排……

“1949 年 4 月，我接任了湖南省保安副司令后，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切实掌握军队。当时，湖南的地方武装力量，除各县的自卫总队外，保安司令部编组的部队共有四万余人。”

彭杰如和王劲修，在后来的起义中，是两个重要人物。彭杰如也是和人民解放军谈判的代表，起义后，他也担任了军长。

由于李默庵的工作，他的两个老部下，都参加了和平起义，成为骨干力量。不仅如此，为了扩大和平起义的武装力量，李默庵对他的老部队第十四军，做了许多工作。

李默庵是 1939 年 4 月调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从那时起，他就脱离了第十四军。第十四军各处转战，最后，参加了淮海战役。在这个战役中，第十四军被人民解放军打散了。他们撤出战斗以后，在湖北休整。李默庵听说以后，决心将他的老部队调到湖南来。但在当时，湖南没有战事，调第十四军过来很不容易。李默庵先找到国防次长林蔚，林是蒋的人，李默庵利用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再三说服林同意。然后又找到蒋的办公室主任俞济时周旋，终于将第十四军调到了湖南，交给负责编训的黄杰整编。第十四军的军长张际鹏、副军长谷炳奎、师长张用斌，是李默庵的老部下，与李的关系很不错，由于是李默庵将他们调到湖南来的，他们有心依靠于李，相互走动频繁。李默庵向他们讲述时局，鼓励他们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将第十四军也争取了过来，在湖南和平起义通电上，张际鹏、谷炳奎都签名了。

经过这样的工作，拟参加湖南起义的队伍有了基本力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李默庵和陈明仁之间，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顾全起义大局，李默庵不得不出走香港。

两次出走香港

国共和谈破裂以后，白崇禧撕下了和平假面具。5 月，武汉被解放之后，白崇禧退守到了长沙。对于程潜搞

陈明仁上将与夫人萧毅的合影

的和平运动，白极为反感。他认为，搞和平运动就是向共产党缴械投降。他为了实现与解放军对峙，建立武装封建割据的野心，立即采取强硬的措施破坏湖南的和平运动。

对程潜和李默庵、程星龄、邓介松、萧作霖等人积极组织和平起义，白崇禧的特务已有察觉，为这些人列了黑名单，李默庵是头一个。但因为抓不到证据，他们也不敢轻易地以兵戎相见。所采取的办法是"清君侧"，极力削弱程潜的力量，除其左右，最后赶走程潜。为此，白崇禧先从强行解散"自救会"入手，逼走了唐生智。随后又逼走了邓介松和萧作霖。

白崇禧一系列的破坏和平运动的活动，使湖南和平解放运动受到很大挫伤，陷入了低潮。

而恰在这时，李默庵与陈明仁产生了矛盾。本来，李与陈关系是不错的，陈明仁到了湖南，手握兵权，自恃势众，他手下的一些人也极力讨好他，奉迎他。那个时候，大家一方面看准了要走和平起义的道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多数人是借此来寻求个人出路的，为在起义之后谋取到个人地位和官职作打算。靠陈明仁谋求出路的一些人，有的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在李默庵与陈明仁之间挑拨是非。有人则到陈明仁处，说李默庵忌讳陈明仁来湖南，李默庵和刘嘉树及其他人在暗中勾结，要搞掉陈，起义之后好当湖南的省长。而陈明仁在起义之后的安置问题上，也想得很具体，认为有李默庵在，对他是个妨碍。

李默庵和陈明仁之间的这种矛盾，属于利害关系，很难调解。而当时，陈明仁得到了白崇禧的信任，而在白崇禧的眼中，李默庵是与程潜走和平道路的头号人物。在白崇禧疯狂破坏湖南和平运动的情况下，李默庵显然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李默庵经过反复思考，他看到：

"在湖南起义的问题上，可以没有我李默庵，但是不能没有程潜。如果是因为自己和陈明仁的矛盾，导致白崇禧借机赶走程潜，使湖南起义流于失败，那就太让人痛心了！"

"在这个大时代的转变中，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仍想乘时作满足个人利欲的图谋，那就太不识时务了。"

"以陈明仁鲁莽的个性，新近又仗白氏对其信任，气焰正盛，如与其计较，诚恐生出无谓是非与纠纷，徒使颂公难于处理，甚或贻误大局。经详加考虑后，凭我对时局的认识，既无名利权位之要求，又何必与其争衡以增颂公之烦虑……"

想到这些，李默庵决定退出军政生涯出走香港，以维护和平起义的大局。

可巧，这期间李默庵的父亲在长沙病故。处理完后事，李默庵便携全家出走香港。为了不影响起义的计划，他没有向程潜告别，也没有告诉他人。李默庵的亲弟弟李宗青时任李默庵的警卫团长，李默庵也没有告诉他。后来，李宗青率团参加了起义。

大约是在6月底，李默庵到了香港。当时，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军政人员都云集到了香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和谈代表黄绍竑，在国共和谈破裂以后，也来到了香港。他站在民主的立场上，申明和平大义，很是活跃。李默庵与他是很好的朋友，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时，李率部驻浙境，与黄相交甚密。李默庵到了香港以后，很快与黄见了面。李把在长沙的情况详细向他做了介绍，黄绍竑说："你要不要见见中共在香港的代表？"李默庵说："我当然愿意了！"黄便当即用电话联系，为李与中共代表见面约定了地点。

第二天，李默庵在香港的清水湾一带一家旅馆，见到了中共香港方面的代表乔冠华。当时的乔冠华30多岁，他中等偏高个，人很精明。李默庵如实地向他介绍了湖南的情况，讲了自己来香港的原因与经过。乔冠华对他说："你一直在军队工作，职务高，有影响，还是应该回到长沙去，组织军队参加起义，多做一些实际工作。"乔冠华认为李默庵不宜在香港搞政治活动。他还说："中国共产党是重视实际行动的，不咎既往，你参加和平起义不要有什么顾虑。"

在乔冠华的鼓励下，李默庵又详细地向乔冠华介绍了湖南的军队情况，并且将各部队的编制和人员及表现等情况一一写了出来，注明了通过自己的工作，可以团结那些人，争取那些军队参加起义等等。随后，将这篇东西郑重地交给了乔冠华。

6月26日，乔冠华将与李默庵谈话的情况用电报

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如今这封电报存中央档案馆。

然而，当李默庵返回了长沙，“深觉陈明仁一反多年友好常态，嫉忌之情，行诸言行。”“某日，我部高参李昊面报称，他因公往晤陈明仁，其态度很坏，行诸言色，似示对我极不友好，嘱我注意。”这期间，李默庵还见到了已经发生的许多事实，深感与陈明仁配合开展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没有可能了。他在长沙住了一个星期，不得已，又离开了长沙，第二次到了香港。这时间大约是在7月下旬。

“默庵没有负我，是我负了默庵”

1949年8月4日，程潜宣布接受中共中央和平协定，与陈明仁、王劲修、彭杰如等人率部起义，正式发出通电。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湖南解放。此时的李默庵，在香港听说了这个消息，他非常高兴。因为，在起义通电上，他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正如李默庵所说，他出走长沙，是迫不得已的，“并非是自己思想认识发生动摇”。

对云集在香港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设法进行拉拢。有一天，袁守谦来找李默庵，他带来了时任参谋总长的顾祝同写给李默庵的一封信，信是用钢笔写成的，内容是：“奉校座电令，询问吾弟行止，嘱转知可来台相见等因，特请企止弟来港面达。”袁守谦是李默庵的黄埔一期同学，黄埔系师生称将蒋介石为校长，“企止”是袁守谦的别号。李默庵看了信，稍加思考，对袁守谦说：“我从来是做军事工作的，鉴于形势，已决定退出军界，不再干了，不想去台湾，请代我婉言呈复。”袁守谦对此表示理解，李默庵就这样拒绝了蒋对他的邀请。

另一件事，是张发奎邀请李默庵参加反蒋、反共的第三势力，也被李默庵拒绝了。

蒋介石与中共的军事力量发生逆转以后，张发奎在香港与美国特务机关搭上了关系。在美国特务之支持下，他开始了组织反蒋、反共的第三势力。李默庵到了香港不久，张发奎便请李默庵吃饭，乘机劝李参加他们的组织。李默庵说：“以我的看法，搞什么第三势力是没有前途的。这样搞下来，又会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再说，搞政治的要么有理论，要么有群众，要么有钱财。我没有理论号召人，也没有群众支持我，更没有钱财来搞什么活动。我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无能为力。”张发奎说：“你可以以你的声望作号召嘛！”李默庵说：“我是带兵的，离开了军队，哪里还有什么号召力呢！”张发奎见他态度坚决，只好作罢。

8月，黄绍竑联络了在港的贺耀祖、龙云、刘斐等44名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联名发表了《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起义通电，宣布脱离蒋介石的政权。在这以前，黄找到李默庵，征求他的意见，李默庵看了通电的草稿，很符合自己的认识，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个起义通电发表以后，新移广州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极为震惊，马上下令开除了李默庵等44人的国民党党籍，同时发布了通缉令。

10月，新中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参加和平通电的诸人不少陆续到了北京。黄绍竑热情邀李默庵同行，李默庵窃思，自己一直在蒋介石的基本部队中任职，国共对战，自己的部队均为主力之一。原想在湖南起义中，尽力多组织一些队伍，将功补过，然而未能如愿。如果仅靠两次空洞的通电，贸然北上，似有再图混迹革命，迹近投机之嫌。自忆离开长沙，放弃了和平起义之路，虽然是出于顾全大局，但一时难以说清，亦恐天下人误会。自己既然决心脱离军政生涯，不如还是另谋出路为宜。这样，李默庵带领全家到了阿根廷定居。1964年，他又到了美国华盛顿定居，直到1990年回国定居。

1981年，李默庵应邀第一次回国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活动。在汉口，他见到了当年在程潜身边与他共同策划和组织和平起义的程星龄先生，他们在一起回忆了当年的情景，程星龄告诉李默庵，当年，李离开长沙以后，程潜黯然神伤，曾感慨地说：“默庵没有负我，是我负了默庵！”

李默庵听说了程潜生前有此言，无限欣慰，他趁程星龄尚在，立即给他的旧友、旧部写信，告知这一高兴的消息。

回忆当年，李默庵深有感慨地说：“我决定退出军政生涯，远走香港以前，未及与程潜深谈，是我的错误。那时，程潜以湖南家长的身份主政，也以家长式的方式领导部下，以为我们会听他的，跟他走就是了。程潜他说有负于我，恐怕是他未能将与中共的联系及时告诉我，抑或指无暇相顾，挽留于我。而我未能与他深谈，一是怕伤他的心，二是感到在起义这样大的事件上，开始，程潜未能与中共组织负责人接上头，我深问起来，恐有为难他之意。有幸的是，程潜能将我当年所为予以肯定，我也就坦然了。

“由于我与陈明仁的矛盾，导致我的出走，对湖南起义是有很大影响的，否则，完全可以多争取一些军队参加起义，可以多挽救一些人。

“我对于自己出走香港的选择，多年来常怀愧疚之情。然而，历史已经过去了，我只有以自己的晚年，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努力多做一些工作！”

（责任编辑　萧　徐）

张国焘血屠鄂豫皖

● 朱秀海

一

1931年4月9日，鄂豫边苏区所属的黄安高桥区区委书记兼苏维埃主席李先念，接待了两个来自中央的“大人物”。他们是几天前由上海经武汉辗转进入苏区，又由黄安独立团特务队一路护送来到这里的。李先念知道：一个名唤陈昌浩，是中央新派任的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分局书记，一个是新来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张国焘。

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时年22岁，黄安本地人，他热情接待了这两位中央派来的“要员”，十分困难地给他们弄到一只鸡吃，然后送他们继续北上，前往鄂豫皖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临时所在地七里坪。

张国焘，字恺荫，江西萍乡上栗镇人。张国焘19岁那年，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结识了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北大教授李大钊，受二人影响，思想日益激进。1919年，北京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张国焘以极大热情投身其中，任北大学生会干事、学联讲演部部长，参与“火烧赵家楼”。1920年1月，张国焘和一群学生领袖，到上海拜会孙中山，回北大后参加了李大钊创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年里，他还频繁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做陈独秀、李大钊之间的联络人，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张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和大会筹备人之一的双重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主持会议，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党纲起草人之一。党的中央局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次年1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受到了列宁的接见。1923年，张国焘受命领导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在同年6月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提出国共合作、建立两党统一战线。张国焘却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他的“激进”观点与大多数代表相异，因而在中央委员选举时名落孙山。

张国焘这时第一次显现出了他生命中的机会主义特色。是年6月他刚因反对国共合作被淘汰出中共领导核心，次年1月便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成了共产党员中直接参与国共合作的中坚分子之一。张国焘的“改正错误”使他重新受到陈独秀的信任。在中共“四大”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工农部主任。1925年5月，张国焘在上海参与领导“五卅运动”，再次成为党内国内的风云人物。

张国焘的人生再次发生重大转折是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共党内陈独秀退出领导中心，张国焘也被党内视为“老右倾”而处于尴尬地位。为反抗蒋介石、汪精卫的屠杀政策，临时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起义前夕，共产国际来电，认为“起义如有把握可举行，否则不可动。”临时中央委派张国焘以中央常委身份由武汉去南昌，传达共产国际意见，遭到恽代英、周恩来等人坚决拒绝。起义爆发后，他随起义军一路南下潮州，失败后经香港潜回上海。11月，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因其“反对（八一）暴动”，“使全体同志受很大影响”为理由，将张国焘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执委会除名。张国焘再次从革命的“浪尖”跌到“谷底”。

此后张国焘在上海闲居了8个月。这是他投身革命数年来心境极为黯淡的时期。1928年5月，中共“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临时中央“八七会议”后领导的三大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共产国际对于以瞿秋白为首的领导班子亦不满意，张国焘便以党内反对派的身份受到邀请，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张意识到这是自己“革命生涯”的一个转机，主动在会上做了“检讨”，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操纵下，张国焘重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1930年6月，“立三路线”受到共产国际批评。7月，张国焘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反对“立三路线”，

要求回国“工作”。8月，共产国际没有让他回国，却将瞿秋白和周恩来派了回去。9月24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纠正“立三路线”，停止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向中心城市进攻的计划。但是，共产国际却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阶段的现实任务”。此时已回国任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王明等人趁机反对三中全会决议。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立三路线”问题，张国焘在会上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批评李立三“是半托洛斯基的冒险主义”，“执行了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反国际的路线”，同时指责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有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再三表示自己“服从国际路线”。共产国际诸要人这时感到放心，同意张国焘回国。次年1月20日张国焘回到上海。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已开过，三中全会后组成的中央政治局被改组，瞿秋白、李立三从政治局除名，周恩来受批评。张国焘原本与米夫、王明不睦，此次回到上海，见王明一派成了共产国际的“宠儿”，在政治局内占了多数，不得不向王明靠拢。他在党刊《实话》上发表文章，吹捧“陈绍禹(王明)同志等是坚持执行国际路线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反对“所谓陈绍禹派”，“就是反对党和(共产)国际”。张国焘是老资格的中共领袖，如此热烈地赞颂一个年仅26岁、刚刚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实在令王明及其追随者受宠若惊，莫斯科的旧怨一扫而去。2月，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张国焘成为中共临时中央的三位常委之一。

刚当上常委的张国焘，出于一种值得玩味的原因，突然自告奋勇地要去鄂豫皖工作，并得到政治局王明等人的支持。中央政治局又做出决定，派张国焘代替沈泽民，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改任将要成立的鄂豫皖省委的书记。于是，这个只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对军事和土地革命一无所知的人，从此开始了他的游击战争生涯。

数十年后，后人沉思张国焘当时所以做出此种选择，发现其原因是：一是在瞿秋白的城市起义和李立三“全国总暴动”式的革命失败之后，朱德、毛泽东以武装割据然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正被共产国际肯定；二是对于王明一伙“新进”(张国焘语)，张国焘内心是瞧不起而又厌恶的。与王明等人常在一起，他的前途根本不会“光明”。前往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就不同了。在那里他是第一把手，不仅鄂豫皖苏区，而且整个长江以北的党组织都归他领导(虽然后来事实上做不到这一点，但当初中央却是这样规定的)。张国焘出于做一个独当一面的中共领袖、在中国革命中扮演“要角”(张国焘语)的愿望，如愿以偿地主宰了这个王国。

1931年4月，当张国焘走进鄂豫皖苏区时，他是十分清醒的，他知道自己贴着“老右倾”标签；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他必须“忠实地”执行“四中全会路线”，他越是“左”，就越能洗刷“右”的嫌疑。这是另外一场战争，他个人的战争，他必须赢得这场战争，才能真正受到莫斯科的器重。

张国焘就这样带着他的历史包袱、信仰与思考、热情与梦想，他的才能和人格缺陷来了。

二

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初期，待人温和，文质彬彬。当地那些土生土长的干部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位“大人物”很会发现问题。久战过后，苏区内村村寨寨一片断墙残垣，田地荒芜，粮食紧缺，只要红军数日不打仗，军队没饭吃，老百姓也跟着饿肚皮。原来白军频繁“围剿”，老百姓种下粮食无法收获，干脆就不种了，等着吃红军外线作战时缴获的“红米”。张国焘由鄂豫边苏区南部进入苏区，一路向北走，一路对各地苏维埃的头头说：这样不行啊，地还是要种的，不然会闹大饥荒。现在插秧已经晚了，种点南瓜之类的菜蔬怎么样？总能充饥嘛。问题虽不大，却很受务实的基层干部拥护。至少在鄂豫边苏区，因为张国焘的到来，普遍种起了南瓜。

张国焘于4月13日到达七里坪，与苏区负责人郭述申、王平章、郑位三会面。张国焘没有急于在这里推行王明的“新政策”，他要先熟悉情况。最初几日，他与郭述申等人的相处与谈话都是愉快的。几天之后，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曾中生从前线回到七里坪。对于曾中生，张国焘就不那么客气了，曾中生是鄂豫皖地区犯“调和主义错误”的代表人物，属于被打倒之列。

1931年5月12日，经过多日筹备，鄂豫皖特委会议在新集开始，史称第一次“新集会议”。张国焘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任书记；改组鄂豫皖特区军委，张国焘任主席；成立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也称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陈昌浩任书记。

张国焘走出了第一步，这一组织改造却是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推行“四中全会路线”的基础。又经他一个多月的认真准备，从6月28日到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新集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史称第二次新集会议)。这次会议的气氛就不同了，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在会议上高举“四中全会路线”的大旗，猛烈指责以曾中生为首的原鄂豫皖特委在三中全会后“掩盖了立三路线的实质”，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

误。指责红四军“遭受严重的失败”。会议号召苏区党和红军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会议进而决定对苏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进行全面的“布尔什维克的改造”。会后，全区八个中心县委的书记被换掉了七个，除曾中生外，徐朋人、舒传贤、陈定候等苏区初创时期的功臣，分别受到批判，其中徐朋人被开除了党籍。作为这次会议的一个具体成果，中央分局决定组成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等七人的常委会，实际上剥夺了另外四名委员曾中生、邝继勋、蔡申熙、舒传贤参与决策的权利。从此，张国焘不顾敌我力量对比，要求红军不停顿地进攻。会议按照四中全会的调子，决定重新划分土地，“贫雇农分好田，中农田不动，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还规定“凡是当年有余粮的就是富农”。为使新的“中央路线”得以贯彻，会议还为鄂豫皖党和红军具体规定了“十件大事”。

对于注视这部历史的后人来说，这“十件大事”中至少有两件是触目惊心的。一，决议要求“改造红军的成份”，“淘汰富农和地主豪绅份子”；二，“加紧肃反工作，消灭‘改组派’、‘第三党’和‘取消派’”。

三

第二次新集会议之后，张国焘真正排在第一的大事却是如何搞到粮食。到任之初，他曾发动了一场种南瓜的运动，但眼下南瓜苗刚长出来，距离吃南瓜还很遥远。红军已经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加上党、政府和各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至少有两万人等着米吃，更不用说还有大量群众也靠“红米”过活了。苏区久战之地，外有白区经济封锁，内无储备，“米荒”的严重，使新成立的中央分局不得不专门为“党和苏维埃机关每日吃两餐稀饭”发出一个“通知第三号”。这种时刻，粮食问题已关系到鄂豫皖苏区的存与亡。

解决粮食的主要途径还是红军的战斗缴获。第一次新集会议之后，新任红四军政委曾中生就主动提出：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围剿”江西中央苏区，对鄂豫皖苏区暂取守势，红四军应利用这个机会，南下蕲春、黄梅、广济，恢复红十五军开辟的鄂东根据地，既解决自身的吃饭问题，又打击和牵制了敌人，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他是个务实的领导人，懂得这样做最起码可以“就食于敌区”，如同毛泽东解放战争时期派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说的那样，是“将灯捻子插到敌人肚脐眼上”。张国焘反对这样做，他想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商南的亲区，顾敬之的民团虽屡受红军打击，仍顽固地坚守着一些山寨，裹挟群众逃离家园，反过来对红军实行坚壁清野，如同一根硬刺，反过来扎在苏区的肚脐眼上。张国焘不懂军事，但曾中生知道“顾狗子”是反共老手，坚守的全是石头堡寨，每打一座我军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国焘同志，是不是先南下解决粮食问题，再回过头来解决顾敬之？”在军委会议上，曾中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行！”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曾中生。

曾中生、邝继勋率红四军主力前往商城亲区，他们不能不执行既代表中央又是军委主席的张国焘的命令。

6月初，红四军在连绵的霪雨中出发。“顾狗子”的堡寨散布在山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硬攻了几次，伤亡不小，却一座也没打下。军内主要将领见粮秣难以为继，坚决要求曾中生率军回撤，“不打这种饿肚皮的仗”。曾中生派人向张国焘提出，改变红四军的作战方向，“立即南下，解决吃饭问题”。张国焘将此视为对自己领导权威的公然挑战，勃然大怒，指责曾中生被“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

曾中生在这里表现了同样的倔犟。作为对红四军负全责的政委，他不能让这支队伍继续饿着肚子打这种无望的消耗仗，在第二次新集会议上，曾中生反复说明情况后，中央分局的委员们竟同意了他的建议，张国焘也放弃了原先的主张。张国焘的退让给了大家一种错觉，好像他能够接受大家的意见了。没有人知道这是张国焘第一次“以退为进”：他必须搬掉这块障碍。

7月初，红四军厉兵秣马，准备南征，张国焘突然发出通知，要召开鄂豫皖军委会议。会议在商南余家集召开，张国焘推翻二次新集会议时形成的决议，提出在江西中央苏区受到蒋介石重兵“围剿”，要“有效地”援助中央苏区。张国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红四军南下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逼南京！此话一出，语惊四座，所有的红军将领都说不出话来。区区红四军一支孤军，弹少粮缺，要冲破重重封锁，越过数百里白区去进攻安庆，岂非痴人说梦？

“我反对这个计划。”刚直的曾中生怒不可遏，他不明白二次新集会议做出的决议怎么能随便被这位张主席否定。“国焘同志提出的计划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冒险主义的计划。我仍然认为红四军应执行新集会议决议，南下蕲、黄、广，既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又可以扩大苏区，威逼长江，调动和牵制敌人。我们这样做了，也就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他停顿了一下，“我坚决认为，这也是目前我们鄂豫皖红军的力量只能做到的事情。”

红四军军长邝继勋支持曾中生：“我和中生同志的看法一致！”

“我附议！”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也说。

陈昌浩起而支持张国焘：“国寿

同志的计划是报经中央批准的，因此它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计划，而是一个应当研究如何执行的计划。”

沈泽民也站在张国焘一边：“这个计划并非国焘同志一时心血来潮，它是根据中央苏区要求各地红军援助的电报精神做出的。执行不执行这一计划，实际上是一个顾不顾中国革命大局的问题。”沈泽民情绪激动地说。

会场沉默了。

张国焘站起来：“我是中央分局书记，又是军委主席，在这件事上，我个人对中央负责。”会后，张国焘突然决定改组红四军的领导：邝继勋被免去红四军军长职务，由徐向前接替。

张国焘用徐向前取代邝是因徐不是中央分局委员，不能参与决策，这样他就可以随意控制红四军。

7月中旬，徐向前、曾中生率红十、十一、十二师主力五个团离开商城亲区，冒着酷暑，挥师南下。8月1日拂晓，红十师、十二师三个团突然兵临英山城下，下午4时，占领英山。守敌全部被歼，红军缴枪1200枝，机枪18挺，迫击炮4门及大批弹药和粮食。多日忍饥的红军指战员，终于吃上了大碗的白米饭。

打下英山只是张国焘计划的第一步。下一步便要越潜山、太湖，向安庆进军。英山距安庆四百余里，中间全是白区，我军将远离根据地，进行无后方的作战。何况打下英山之后，还要留一个团守英山，红军只有四个团出征，打到安庆城下，还有多少力量能发起攻击？

曾中生明白，他不能继续执行张国焘的计划了，这是一条死路。他的党性和肩负的责任，都不允许他再执行这一计划。他要保住红四军和鄂豫皖苏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带部队南下蕲、黄、广，恢复鄂东根据地，执行二次新集会议关于红四军行动方向做出的决议，用在蕲、黄、广的实际胜利向张国焘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对的。曾中生知道自己这样做从组织纪律角度上讲是不能被允许的，很容易被张国焘抓住把柄。他已经想到了，在他和张国焘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具有更高权威的决策机构，它就是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只有后者才有权下令红四军中止执行张国焘的计划。然而即使他现在写信给中央，要想得到答复，大约也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曾中生一不做二不休，既没有立即向中央报告，也没有向张国焘为书记的鄂豫皖中央分局报告，就在第二天早上下了决心：兵发蕲、黄、广！

8月3日，红十二师一个团由许继慎率领，留守英山，红十、十一师四个团加军部直属队直下鄂东。曾中生在部队出发之际，派人把红四军南下蕲、黄、广的决定正式“报告”给鄂豫皖中央分局。18日，红四军以两团兵力，一昼夜急奔120里，突袭蕲春北漕河镇敌新编第八旅。战斗于拂晓时打响，红军如同神兵天降，两小时后即毙敌数百，其余1600余名敌人被俘，敌旅长王光宗也被抓获，我军获枪1200余枝，部队乘胜进占广济县城。曾中生乘胜分散部队，帮助当地党组织恢复活动，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四军出击蕲、黄、广，不过短短半个月时间，原鄂东苏区已大部分恢复，红四军缴获了大批粮食，还缴获金子20斤，白银1800斤，大洋7万元。这一批缴获，帮助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苏区军民渡过1931年空前严重的粮荒。

但是这一连串的胜利并没有减轻曾中生的忧虑。8月20日，曾中生以红四军军长徐向前、自己、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的名义，执笔写了一份给中央的正式报告。

红四军南下蕲、黄、广，蒋介石命徐源泉的四十八师急调鄂东。徐向前、曾中生立即在广济、英山两县之间的洗马畈紧急布阵。当下两军搅成一团，混战到天黑，敌终于不是红军对手，三个团大部被歼，红四军取得了南下鄂东以来的又一场大胜。曾中生兴高采烈，让人打扫战场，呈报战果。这时，一位从新集来的中央分局的交通员被引到他面前。

信是张国焘代表分局和军委于8月17日写给曾中生和徐向前的，信的主要内容是：红四军犯了“放弃援助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红四军不去完成援助中央苏区的“政治任务”，而以解决经济问题“为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张国焘的结论是：红四军南下，是对中央分局和军委的“公开抗拒”，“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他命令：见信后“火速”率队伍北返。

这是一个惨淡的胜利之夜。曾中生透过这封信已经看到，张国焘已经拉开了架式，要一棍子将他打死！此时的曾中生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带红四军恢复了鄂东苏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他保存了红四军，避免了执行张国焘的冒险计划可能招致的全军覆没。他的错误仅仅在于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违犯了纪律条文。而真正的错是张国焘！

曾中生开始十分冷静地处理这场正在发展中的危机。张国焘的信已在全军上下引起了强烈义愤：张国焘想干什么？他到了鄂豫皖苏区，除了种南瓜，好像一件好事也没做过！“打倒张国焘！”部队在英山鸡鸣河停下来，全军紧急要求开会讨论张国焘的来信。还有人提出：现在蕲、黄、广形势这么好，回去做什么？要是仅仅为了澄清谁是谁非，军部派一位领导回去不就得了？曾中生在这个叫鸡鸣河的小山村召开了连以上支部书记、指导员干部会议，公开讨论张国焘的来信，决定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会议通过了曾中生草拟的一份题为《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信》的决议，决定派军政治

部主任刘士奇先行北返，向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军委“面陈一切”。

刘士奇出发了。在他带走的《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信》中，曾中生对张国焘8月17日来信进行了尖锐的反驳。

刘士奇出现在新集城北张国焘那间庙宇式的小房子门前时，张国焘认为，跟在这位军政治部主任身后的将是红四军的千军万马。

“部队呢？”他问刘士奇。

“这里有四军给你和分局的一封信。”

张国焘坐在门外一张摇椅上读曾中生的信，不由气冲斗牛：“通知分局常委和军委委员，到我这里开紧急会议！”

分局常委和军委委员们很快都来了。

面对这一“危机局势”，没有人不同意张国焘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的处置办法。

9月13日一大早，派出接替政委职务的陈昌浩乘飞机从新集机场起飞，直飞皖西苏区的麻埠。这是一架空军教练机，原属四川军阀刘湘，1930年2月15日由驾驶员龙文光操纵，自南京返回重庆中途迷航，迫降在苏区西缘罗山宣化店陈家河子的河滩上，驾驶员做了俘虏，飞机被缴获，正式命名为“列宁号”。这是历史上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这年的7月，陈昌浩第一次乘坐这架飞机对潢川、固始一带进行过敌情侦察，9月初又乘坐它远航武汉，投撒大量传单，震惊了武汉三镇和南京。现在，他又乘坐它前往皖西，从曾中生手中夺回红四军的领导权。可惜的是麻埠的机场没有修好，飞机当天飞临目的地上空，无法降落，只好返回新集。次日，陈昌浩乘马日夜兼程，再去皖西。9月16日，陈昌浩到达皖西麻埠红四军军部，立即以分局和军委名义召开师以上干部会，宣布命令：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任红四军政委；红四军即刻回师豫南苏区休整。10月初，红四军翻越大别山主脉，回到中央分局所在地新集以北的泼皮河。

张国焘以中央分局名义在泼皮河召开会议，对曾中生两次拒不执行中央分局命令的“原则和路线错误”展开批判。

会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做出决议，以“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为名将曾中生调出部队，去后方“考察”。

四

1931年春天，一个自称钟梅桥的人，说是许继慎的旧识，要求与许见面。许继慎让他进来，钟梅桥交出一封信，许拆开一看，原来信是黄埔一期同学、蒋介石身边的大特务曾扩情写的。

信的大意是：蒋介石欢迎你“归顺”，你要的官衔和部队驻防地也没有问题，等等。这封信意在栽脏，手法并不高明。许继慎读了此信，勃然大怒，他把钟梅桥连人带信送到了红四军军部。曾中生、徐向前很快审问了钟梅桥，又见曾扩情信中漏洞百出，两人一致认为这是敌人的阴谋，遂把特务和特务带来的信送交中央分局。事情在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那里已经了结，但在张国焘这里，却还刚刚开始。

鄂豫皖苏区大“肃反”的发生有其国际和全国背景。早在1929年10月，共产国际就明确指示中共中央，要在革命根据地内开始反对“改组派”的斗争。1931年3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强调指出“反对革命势力在苏区内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第二次新集会议上，“肃反”已在会议决议中被列为“目前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原苏区政治保卫局被改造和更名为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总局，苏区所属各县成立分局，做为专门的“肃反”机构，以对付“打进内部”的所谓“改组派”、“第三党”和“AB团”等“反革命分子”。张国焘的人格缺陷就在这时表现了出来。即使是执行中央决议，实事求是地去做还是在执行中将它变质为翦除异己、推行一己私欲的工具，结局就大不一样了。张国焘那种“唯我独尊”的性格缺陷和他那密不可分的政治野心，使他感到机会来了。红四军军部解送到分局来的钟梅桥以及曾扩情给许继慎的“密信”，恰好给了他一个苏区内部“反革命分子”的“证据”。

9月10日左右，保卫局在谭畈河红军后方医院逮捕了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没有资料说明她被捕的直接原因，但她所在的医院既发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AB团”，她的被捕就很可能与此有关。在严刑拷打之后，这个不幸的女人“说出”了一个“轰动”的“大阴谋”：在红四军内部，以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为首，包括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在内的一批师团级干部，准备于9月15日举行“兵变”，将部队拉到长江边上，“投靠蒋介石”。

张国焘大约也被这一“口供”吓住了，然而这一“口供”却与他内心中对鄂豫皖苏区党政军群中暗藏着大批“反革命分子”的想象相吻合，又与他要彻底改造红四军领导层的愿望一致，他相信了这一“口供”的真实性。他马上令人逮捕了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用尽酷刑，逼迫他承认自己即将参与“兵变”的实情。随后，当陈昌浩前往麻埠取代曾中生任红四军政委时，他又命令陈逮捕参与“兵变”阴谋的其他人。

9月16日，陈昌浩到达麻埠，就任红四军政委。当天便下令将红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等二十余人逮捕。红四军西移至斑竹园，他又

下令逮捕了红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十二师参谋长兼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部队途经余子店，他下令逮捕了著名红军战将、红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委分会主席许继慎、红十一师师长、商南暴动的领导者周维炯、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喧、原红三师政委姜镜堂。10月初，红四军移至光山白雀园，张国焘亲自赶来主持大"肃反"，又下令逮捕了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十二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该师副师长肖方、十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与此同时，逮捕的范围向大批营、连、排干部发展。

为了坐实"兵变阴谋"，张国焘还指使人对曾扩情派来的特务钟梅桥施以毒刑。钟梅桥受刑不过，叫说什么就说什么，从而取得了一份许继慎、周维炯等人将在9月15日发动"兵变"的"铁证"。

在政治保卫局的"法庭"里，对被逮捕的人拷打逼供，牵连的人越来越多。

1931年10月和11月，是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上两个血腥、狂暴的月份。红四军著名将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喧、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以及一大批干部战士，被分别冠以"AB团"、"改组派"、"第三党"以及"预谋兵变"的罪名，惨遭屠戮。大屠杀过后，红四军四个师十二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两人，有的团、营、连，仅在大屠杀进程中，干部就换了三、四遍。

张国焘一边进行大"肃反"，一边将许继慎、周维炯等人的"兵变阴谋"以及鄂豫皖中央分局处理红四军原领导人曾中生的决议急送中央。11月3日，张国焘焦急等待的"中央来信"到了。"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四军领导干部违中央(分)局的命令，自由决定占领武穴回兵进取六安的策略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是立三路线的重复"，"严重的反党错误"，"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至于许继慎，"中央来信"说，"中央(分)局对许应做严厉的考查"。有了这柄"尚方宝剑"，许继慎不能不死。这个月的中旬，张国焘下令将许继慎秘密勒死于新集政治保卫局总局牢房之内，时年30岁。随后，周维炯也被以同样方式处死，年仅26岁。不久，许继慎之妻王望春也被秘密杀害于英山上河摆。

临时中央明确表态支持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使原来多少还有所顾虑的张国焘越发大胆和果决，干脆用"怀疑一切"的目光注视着他统治下的鄂豫皖苏区，决心对下述三类人一律进行审查：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据陈昌浩自称，至1931年11月中旬，被当作"改逆"(即"改组派")加以"肃清"的红军指战员已有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说，"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红四军当时总共才有15000人，被"肃清"的比例竟高达六分之一！

"肃反"在苏区各县党组织、政府和地方武装中造成的损失无法统计。中共六安县委除两名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霍丘县委全体干部被害；赤南(即商南)县苏维埃政府48名干部被杀45名；英山苏维埃11名干部被杀10名；六安独立团一次逮捕"反革命"二百余人；红山警卫团八连从连长到战士一百多人全部杀光。至于被牵连进去的区、乡干部群众，到底被杀多少，没有人统计过。

张国焘得意洋洋地将鄂豫皖苏区大"肃反"的"成果"、"经验"上报中央，说它"比富田事变的经验还大，可以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经验"。临时中央果然将这一"经验"向其它苏区"推广"，各苏区由此也开始了大"肃反"。仅在湘鄂西苏区一地，主持"肃反"的夏曦就逮捕和杀害了一千六百余人。还有资料讲，张国焘的"肃反经验"甚至还被介绍到了苏联，对苏共30年代极端残酷的大"肃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结束鄂豫皖苏区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时，笔者不能回避下面的问题：张国焘为何不杀他在鄂豫皖苏区和红军中的最大反对派曾中生、邝继勋，以及曾支持曾中生南下鄂东、后又联名越级给中央写信的徐向前？原因是临时中央1931年11月3日写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中，对许继慎和包括曾中生、邝继勋、徐向前在内的其他"红四军领导干部"做了区别。是属于"必须用教育的方法帮助"的红四军将领之列，要杀他们也就不能没有个"说法"，而徐向前的妻子却难幸免。

有必要补上一笔：1942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到了延安，向徐向前和党中央讲了一件事：国共合作抗日之后，一次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陈毅遇上了国民党将领冷欣。冷欣很得意地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陈毅的话，在中共中央高层引起的震撼是巨大的。此前，他们也知道张国焘杀了很多无辜，却没有人敢怀疑许继慎、周维炯的"兵变阴谋"是冤案，现在真相终于大白。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党中央终于为含冤而死许继慎、周维炯等人平反昭雪。

（责任编辑　刘家驹）

邓子恢被称为农村问题专家由来已久

●许人俊

50年代，在我们党内对一些年长且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往往习惯以“某老”尊称，如董老（必武）、徐老（特立）、吴老（玉章）、谢老（觉哉）、林老（伯渠）……邓老（子恢），也是其中之一。连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老总、邓小平等，在各种场合见到邓子恢同志，也都是这样亲切称呼。

据了解，“邓老”称呼的最早倡导者是陈毅。1941年，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在新四军众多领导干部中，论年龄，邓子恢时年45岁，比谁都大，是长者；论学历，邓子恢是留学日本的大秀才，知识渊博，毛笔字漂亮，有学者风度；论资历，邓子恢1915年就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早年追求马克思主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论人品，邓子恢正派，厚道，德重，有兄长风度。加之，“邓老”二字简洁，爽口，亲切，既能准确反映邓子恢的形象，又能表达人们对邓子恢的敬重之情，所以一旦陈毅同志带头称起“邓老”，广大指战员自然迅速响应。于是，“邓老”二字就越传越广，由新四军传到了八路军，由军队传到了地方，又由华东传到了华中和中南。建国初期，邓子恢调中央任农村工作部长、国务部副总理，“邓老”二字随之在中央机关和全国广泛称用。甚至连越南胡志明主席来华访问，他同邓子恢交谈土地改革问题时，也常常开口闭口亲切称用“邓老”二字。

邓老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农村，自幼生活在农民之中，曾参加各项农事劳动，熟悉农业和农村情况，了解农民的饥与饱、爱与恨，同农民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他虽然是出过国、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但毫无洋气，也没有一般知识分子惯有的书生气。他常常身着布衣和大裆裤，脚穿草鞋或布鞋，脖子上挂一条擦汗的毛巾，出入于农民群众中，随意同人们促膝交谈，而且长期如此，是典型的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农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他都心中有数。

20年代末、30年代初，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在党内一度占主导地位，推行“反

富农路线”，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歪田，贫农分好田”的政策。表面很革命，实际形左实右、危害革命。加之地主与富农、富农与中农难以准确划定，致使一些人失去土地，生活无出路，被人为地推向与我党拼死对抗的道路，大大增加了革命的阻力。那时，邓老就实事求是，不跟风，不随大流，大胆提出用“地主也分田”替代“地主不分田”，主张给地主富农以生活出路，减少革命的阻力。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不要把各户原有耕地全部打乱、重新分配，而应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有耕地的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以稳定大局，避免混乱，减少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和不安。

分与不分，一字之差，却体现邓老敢于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也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1929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正率领红四军转战到闽西地区，他支持邓子恢的正确主张，赞赏邓子恢在土地革命中的才智和创建的成功经验。两人在革命活动中志同道合，朝夕相处，常交谈彻夜，共谋革命韬略，友情笃深。那时，邓子恢任闽西特委书记。为帮助闽西创建苏维埃政权，加强闽西特委的力量和建立地方武装，毛泽东应邓子恢的要求，亲自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贺子珍、曾志等在闽西地方帮助工作。并让蔡协民任特委组织部长，江华任秘书长，谭震林负责军事工作，曾志任共青团特委书记，配合邓子恢开展革命活动。

1929 年 7 月，中共闽西第一次党代会在上杭蛟洋召开，毛泽东、谭震林、蔡协民等代表红四军前委出席。会上通过的几个重要文件，都是在毛泽东指导下，由邓子恢亲自动手写的。会议即将结束时，蒋介石就发动了对福建、广东、江西三省的会剿。7 月底，各路敌军疯狂向闽西苏区进攻，红军迂回周旋，相机开展游击战。当时，战斗频繁，天气炎热，毛泽东不幸患了恶性疟疾，病情很重，上身肿得很厉害，坐着担架到上杭县城。这一期间，邓子恢对毛泽东非常关心，照顾得非常周到。他像尊敬良师益友那样，以出自内心的爱护，无微不至地去关怀、体贴毛泽东。他派人到处寻找优秀的中、西医，为毛泽东诊治；托人专程去购买牛奶、白糖，给毛泽东补养身体。为了让毛泽东尽快康复，他还买了牛肉和母鸡炖汤送去。由于医生的精心治疗和邓子恢等同志的细致照料，20 天后毛泽东终于恢复了健康，迅速返回红四军主持工作。

患难之交的感情，往往是最深刻、最珍贵的。同年 10 月，毛泽东在上杭蛟洋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文件，也都要找邓子恢共同商量。直到年底，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闽西开赴江西时，对邓子恢等同志、对闽西的这段生活，还是念念不忘的。

然而因李立三“左”的倾向在福建党内逐渐增长，致使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闽西转战江西后不久，邓子恢就遭批判，定为受“红四军的机会主义路线影响”，犯了“富农路线”错误，被免去闽西特委书记、苏维埃主席职务，调离闽西，让他任省委巡视员到沿海地区“巡视”。

此时，率红四军在江西瑞金地区轰轰烈烈展开革命活动的毛泽东，对远在福建的邓子恢十分惦念，邓子恢的正直为人和聪明才智，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特意推荐选举邓子恢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和土地部长，并派人到处寻找邓子恢，想让他早日到位就职。

遗憾的是毛泽东未能找到邓子恢，直到 1932 年 4 月，毛泽东、聂荣臻等率中央红军再次挥师福建攻占龙岩时，毛泽东与邓子恢才又见面。老友重逢，分外亲切，毛泽东开口就问：“你这些时候到哪里去了？我到处找你不到。”并通知邓子恢：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已选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任命他为财政部长和土地部长等。

毛泽东这番挚情之言，使邓子恢深受感动和鼓舞，他不久就随毛泽东和红军主力由闽西启程，匆匆赶赴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就职。

邓子恢到职后埋头苦干，勤奋工作，运用智慧为统一中央苏区财政规章制度，整顿税收，严禁强迫摊派公债，大力发展苏区经济，肃清封建地主残余势力，巩固土地革命成果等等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他心直口快，对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财政经济方面造成的困难局面，敢于直言，实事求是提出了批评意见，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毛泽东等受到王明“左”倾

路线排挤、打击的时候，邓子恢也被降为副部长。于是毛、邓等人一道落难，共度风雨。

邓子恢为人宽厚、忠实，受排斥打击后仍顾全大局，继续效忠革命事业。1934年3月，为保证反“围剿”战争的急需，克服群众生活的严重困难，他从实际出发，在粮食征集工作中采取了符合群众利益的方针，效果很好，深得人心。但“左”倾领导却颠倒是非，妄加罪名，在严厉批评之后，给了他严重警告处分。

邓子恢虽连连受到立三、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斥和打击，但他作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逆境中始终忠于革命。1934年秋，“左”倾错误路线导致革命斗争连遭挫折，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长征。邓子恢奉命留在苏区担任中央局委员，与项英、陈毅等一道领导敌后斗争。不久，他与陈谭秋、张鼎丞等又奉命率领少量红军，冲出敌人的层层包围圈，从江西沿路拼杀，终于转移到闽西根据地，由此开始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的斗争生涯。尽管环境艰苦恶劣，敌强我弱，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但邓子恢和战友们以惊人的毅力和胆识，紧紧依靠群众，同广大劳动人民保持血肉相连的关系。加之制定的政策对头，善于团结中间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顽敌，终于由弱变强。敌人发动了无数次疯狂“围剿”，都被闽西军民团结抗击所粉碎。30万人口的闽西革命根据地，犹如铜墙铁壁的革命大堡垒，屹立在敌人的大后方岿然不动，革命红旗始终在闽西上空高高飘扬，成了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对于闽西三年游击战的卓著功绩，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赞扬。1946年4月18日，党中央在延安开会研究土改问题，邓子恢前往出席。会上毛泽东满怀深情地对他说：“你们当年留在闽西坚持敌后游击战不容易啊！我们万里长征，是同大部队在一起，条件再困难也比你们好。你们是小部队，人数少，势单力薄，困难比我们大。你们在闽西根据地，不但坚持了下来，还发展了那么多部队，真了不起啊！”

邓子恢是文武双全、足智多谋的领导人，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受命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淮北党政军委员会书记，曾深入敌后，在日、伪、顽三方夹攻的的险恶形势下，成功地创建淮南、淮北抗日民主政权。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历任华东局副书记，中原局、华中局第三书记，华中军区第二政委，为挺进中原，解放中南地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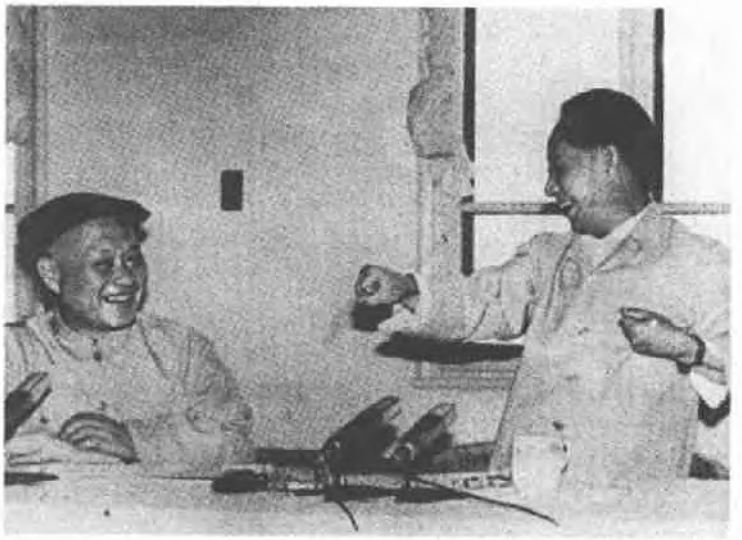
建国后，中南局一度管辖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武汉、广州六省二市，任务繁重，地位显要。在第一书记林彪长期养病期间，实际工作一直由邓子恢主持。邓子恢不负重托，在短短三年中，就出色地领导完成了中南地区繁重的剿匪反霸、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任务。特别是在发动农民搞土改，发展农业支持城市，开展城乡商品交流，巩固工农联盟等方面有独特建树，获得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1950年春，党中央召开全国土改工作座谈会，研究土改工作的方针、路线、政策。中南局派秘书长杜润生等出席，发表了许多意见，刘少奇、朱德等领导特意询问：邓老对这些意见态度如何？杜润生说中南局代表的发言，都是同邓老共同研究的。后来，中央政治局开会进一步审议土改问题，少奇同志表示：“等各大区书记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再定。特别是要听听邓老的意见，在中国农民问题上，邓老是最有发言权的。”

邓老不仅熟悉农村工作，富有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而且精通农业生产，农业知识丰富，有些农民曾把他视为农学教授。周总理会见外国贵宾时，常常风趣地把邓老作为农业专家或农村工作专家加以介绍。他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的意见，举足轻重，影响很大。50年代初，越南胡志明主席多次公开或秘密访华，他数次在中南局所在地武汉停留，同邓子恢谈如何搞土改和恢复经济问题。一次，胡主席要求我党派一个土改顾问团，中央批示要邓老安排人选。邓老起初想让广东的赵紫阳去，因广东任务复杂，一时离不开，后确定让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长乔晓光出任。乔晓光帮助越南草拟一个土地改革大纲，为慎重起见，先报我党中央征求意见。毛主席郑重批示：“请邓子恢同志过目。”这些都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一直把邓老视为我国农村工作的“权威人士”。

（责任编辑　杜　晋）

福建地下党冤案平反的一波三折



1982年，胡耀邦（右）在福建视察时与项南谈话

● 戴　煌

一、地下党冤案的由来

1977年8月，福建省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时，清查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黄国璋，泉州地委副书记许集美的问题时，有人认为他俩原来都是闽中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遂对这个组织的其他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政治历史问题，莫名其妙地进行了"专案审查"。

1978年6月13日，福建省委以《闽委〔1978〕综字62号文件》向中央报告，"现已基本查明：在全案审查的二十五人中……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南（已故，原闽中特委副书记，解放后任省教育厅长）等人都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于是纷纷予以开除党籍，逮捕法办。

全国解放后，这是对原福建地下党同志搞极左斗争的最后一个大案。早在前20年，即1958年的"反地方主义"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反地方主义补课"中，福建地下党和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就受害尤甚；其中波及面最大的，是党的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曾镜冰的"内奸嫌疑"案和原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红旗反革命案"。

何谓曾镜冰的"内奸嫌疑"案？

1948年初，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浙赣区党委，怀疑自己的组织被内奸特务所控制而错杀了一批骨干同志，解散了城工部组织，使党的事业遭到了重大损失，从而引起党中央的重视。因此，1955年5月，中央对当年党的"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原闽浙赣区党委书记、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的曾镜冰，产生了政治上的怀疑，认为他"长期执行着违反中央路线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对他进行专案审查。

1957年3月5日，中央五人小组《关于曾镜冰案的请示报告》认为曾镜冰的"内奸嫌疑很重"，决定撤销其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务，"留在党内继续审查"。"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害致死。

这一案件，直接影响到对原闽浙赣区党委工作的评价，株连了一批干部群众。

而所谓"红旗反革命"案，是完全根据国民党特务和国民党特务档案的材料办的案。

1950年5月，从解放军俘获的敌特人员口供和原来缴获的敌特刑庭档案中发现：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成为闽西南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的陈华，在1947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经不起生死考验而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并写了一份帮助国民党特务钻进革命队伍做内奸的"计划书"。1949年2月，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即将横渡长江之际，陈华才离开了敌人的监狱，但他没向党组织交代叛变情况，而当上了安溪中心县委书记。因此，中共福建省委于1951年2月，决定对原闽西南白区组织的六百多位同志一一进行审查；同年7月21日，省将《关于审查原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中陈华案件的综合报告》（即审查结论）上报党中央。

受上述三大案件的株连影响，以及1942年4月闽粤边委按当时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指示"，决定部分地下党组织"停止活动"等原因，使得全省一些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游击队，长期没有得到承认，有些党员的党

籍也未得以恢复；甚至很多人被关押审查，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许多人一直抬不起头；有些人的亲属穷困至极，不得不攀附亲友或流浪乞讨……

福建，本是老革命根据地之一。1926年北伐战争前后，这里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1927年南昌起义不久，这里就开始组建工农武装，不断开辟和扩展革命根据地；其中，以长汀、连城、永定为中心的闽西根据地，与中央苏区连成了一片。

1934年10月，王明的"左"倾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主力红军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留在福建的大大小小的游击武装牵制了大批敌人，支持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福建党组织始终坚持武装斗争，同时加强城市工作，解放了一些城镇和广大农村，有力地配合、支援南下大军顺利解放了福建全境。

在这绵延二十多年的紧张残酷斗争中，全省先后有十多万人参加了红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其中参加长征的有两万多人，抗战开始由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的有五千多人，其他人分散在两千多个革命基点村坚持斗争到全省大解放，赢得了"红旗不倒"的美誉。

当年分布在闽西南崇山峻岭和闽北以武夷山为依托的星星点点地下党组织，在分属中共闽粤赣、闽浙赣省委领导前，方志敏、陶铸、张鼎丞、邓子恢同志都分别领导过。长期斗争的历史充分表明，福建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为夺取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她不愧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她领导的武装部队不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英勇的战斗队伍。然而全国解放后刚刚吃了几年安心饭，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使很多当年风餐露宿、侥幸余生的同志及其亲属，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和羞辱，其影响之坏可想而知。

二、胡耀邦说，应该公正地解决这个难题

1981年，福建省委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如果福建地下党的冤假错案再不认真对待并加快解决，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改革开放的大业也难以进行。这不仅是当地干部的强烈要求，也是包括太行、太岳、江苏、山东南下干部的共同愿望。正好，福建的一位党员干部上书胡耀邦，反映了福建地下党遗留的这些问题，表示十分忧急。胡耀邦立即在这封长信上批示——

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请先从福建抓起。

从此福建地下党问题的解决，开始有了新起色。

同年8月22日，根据胡耀邦这个批示，中共中央组织部致函刚到福建不久的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等同志，要求福建省委"指定有关部门予以调查了解，并把结果告诉我们，以便共同研究处理办法"。项南和主管党务、政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省委书记金昭典、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长李正亭等同志喜出望外，认为上下看法完全一致，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当年10月13日，福建省委召开了常委会议，决定由省委书记程序、伍洪祥负责，并成立"地下党问题办公室"，调查处理地下党问题。此后，省委又相继召开了正确处理地下党问题座谈会，省委负责同志都到会听取了意见。参加座谈会的地下党的同志从大局出发，以党的利益为重，在会上心平气和地反映了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尽管这样，胡耀邦还不放心。他又让中央组织部派出干审局负责同志专程前往福建，核查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福建省委也派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去北京，向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领导部门汇报请示，力求妥善圆满地解决这个大难题。

在摸清了地下党主要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后，根据耀邦"公公正正地解决"这一问题的精神，福建省委不少同志，特别是省委常务书记胡宏、省委宣传部长黄盼、建阳地委书记张翼等同志尤为积极。他们都认为：地下党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正确处理这一问题，必须要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方面，要从地下党远离党中央，在敌强我弱、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长期坚持斗争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看待地下党斗争中出现的某些缺点、错误和挫折；另一方面，也要从解放后长期受"左"倾错误影响这个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看待过去在处理地下党问题上的失误。因此，解决地下党问题，要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宜粗不宜细，不要追究个人责任，做到既分清是非、解决问题，又有利于安定团结；

同时，解决地下党问题，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尊重历史，一切都要通过调查研究，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该解决的问题不能顶住不办，但对过去处理正确的问题也不能"一风吹"。

有了这"公公正正地解决"问题的精神，对三大案件及其他类似问题的复查，进展得顺顺当当。在1982年5月31日，省党委会听取和讨论了关于福建地下党的第三个大案——闽中地下党领导机关"完全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的"专案办公室"的汇报，同意莆田地委的意见，撤销了1978年6月省委对原泉州地委副书记许集美的原处理决定，宣布无罪释放，恢复党籍、职务与工资级别；同意省委组织部的意见，撤销了当年省委对原省委

常委、组织部长黄国璋的原处理决定，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工资级别。1983年5月12日，省委又对这个案件进一步发了专门文件。这个叫做“闽委[1983]综字273号”的文件指出：经过多年工作，对此案所审查的问题已经澄清，对所审查的党员干部都已作出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为此，省委撤销这一专案，撤销1978年6月13日以“闽委[1978]综字62号文件”给中央的报告。同时通报有关部门和地、市委，对专案审查材料按政策规定进行清理，对受该案株连的人员要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做好善后工作。

省委并认为，原闽中地下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领导机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她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支战斗队伍。原认定“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南等人都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是错误的。因此，应为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南和其他受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恢复名誉。不久，许集美被选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

接着，也是在1983年5月中旬，福建省委向党中央呈递了《关于为曾镜冰同志平反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经过多年审查证明，曾镜冰同志政治上没有问题，应排除“内奸嫌疑”。曾镜冰同志任福建省委、闽赣区党委书记期间，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是有重要贡献的，对他的“长期执行着违反中央路线的机会主义路线”的认定，应予撤销。1948年初，闽浙赣区党委怀疑其所属城工部组织被内奸特务所控制，错杀了一批骨干，解散了这个组织，使党的事业遭受了损失，错误是严重的。1965年经中央批准，为这个城工部平反，是正确的，遗留问题应继续抓紧解决。经过长期严格的审查和考察，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作怪。基于上述结论，我们认为应为曾镜冰同志的“内奸嫌疑”平反、恢复名誉。这一专案应予撤销。凡属受此案株连的原闽浙赣区党委的其他领导人和干部群众，也应同时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1983年6月22日，中央批准了福建省委的这个《请示报告》，并撤销过去有关撤销曾镜冰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务的决定。省委随即将中央的这一决定及省委的《请示报告》印发全省。这样，就把工作中的错误和“内奸嫌疑”区分清楚了。

对于第三个大案的解决，福建省委于1983年5月29日，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对原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审查结论作部分修改的通知》。《通知》说：1951年2月，省委由于发现了陈华叛党的问题而决定对原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的成员进行审查，是必要的。审查后，把陈华个人问题与这个组织加以区别，确认这个组织“不属于红旗反革命，而是我党的组织”，这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这一案体的审查，是在解放初期进行的，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又由于在审查中对解放前夕斗争形势和白区工作的特点研究不够，因此对这个组织在斗争过程中的某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安溪中心县委在领导1949年2月到10月这8个月的斗争中，其政策和路线的错误是严重的，在党的方针原则、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领导问题等等也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其思想作风是非无产阶级的，以致党政军民的组织不纯是十分严重的。《通知》说，这部分结论是错误的，应予撤销。对受其影响而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群众，应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认真地落实政策。

随着三大案件的公正了结，福建全省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对提出申诉的4441件涉及地下党人员的刑事和党纪政纪案件进行了复查。到1983年底，复查结案的就有2253件，其中予以平反纠正的冤假错案达1710件，占复查结案数的75.9%。同时，承认了福州地区的东岭工委及东岭游击队、厦门市的原闽中地下党厦门省立医院支部、宁化县的闽宁游击大队恢复了1478名确曾入党、间隔多年仍具备党员条件的党员的党籍。

但是，由于“文革”灾难及“清查”的扩大化，搅翻了建国初期军队、老区、地下党干部会师时的“五湖四海”，不少单位领导班子的组成，出现了“清一色”——只选用来自一个方面或“文革”中同一个观点的干部——“表面无山暗有礁”，对地下党一些遗留问题的彻底解决，仍然难上加难……

三、胡耀邦再作批示：抓紧进一步解决

1983年冬天，从中共河北省委第二书记退到二线、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江一真，到福建山区考察。这对他来说，大有落叶归根之感。

他出生于闽西连城县。1927年12岁就参加了革命。全国解放后，他曾回到福建工作了十几年，担任过省政协主席、省长和省委书记，人熟地熟山水熟。所以他这次一踏上故土，省委机关就有不少人对他说：中央三令五申选用“四化”干部，可我们闽南原来地下党培养的几百名大学生党员，眼看宝贵的年华就要耽误光了，你能不能想些办法抢救？

江一真是个“肚子里打灯笼”、心地亮堂的直肠人。他就听不得有人受委屈的事，这次回家突闻还有一大帮同志受冤，他把到山区考察暂搁一边，立即转入对这几百名“老大学生党员”的调查。

他调查了两个多月，调查得很细。他发现，从土地革

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后在厦门大学、从上海移到福建的暨南大学和其他许多大专院校及中学，培养和发展了一千四百多名知识分子党员；其中大专学生五百五十余名。他们大都学有专长。江一真对这五百五十余名大专学历的原地下党员，调查了其中的 351 人；其所学专业分别有国际贸易、工商管理、财政金融、工程技术等二十多种。他们当年都曾长期开展对敌斗争，建立了游击武装，最后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厦门和闽南各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解放后，由于相继发生了本文前面提到的三大案件的株连影响，加上历次的政治"运动"，原来这些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党员，特别是有海外、台湾、港澳关系的同志，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有些同志被整死整残废；有些同志一直受到没完没了的审查和控制使用，几乎谈不上积极发挥他们本来可能发挥的聪明才智。

这当中使江一真感到特别悲怆动情的，是其中多数人因为屡屡挨整，级别偏低，生活十分艰难。特别是"八·一三"上海抗战后不久，从上海匆匆搬迁到闽北建阳的暨南大学的许多老师和学生。他们在抗战前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如论资排辈，他们全都应纳入"土地革命战争"或"红军时代"序列的老干部。可是后来许多人竟被打成了"叛徒、内奸、特务"，直到 80 年代初，对他们既不平反，也不很好地使用。有的是几十年前的老教授，才行政二十四级，比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还低两级，每月所得与省委机关打扫院子的清洁工差不多。

江一真在调查中还发现，有些同是福建地下党员，如果早早离开了福建，则往往没有遭到身心备受凌辱的厄运。如原来同是厦门大学城工部党员而早早去北京工作的 11 人，已多数成了师、局级干部，根本没有缺吃少穿之虞。有些出走海外的，更成了颇有影响的学者名流。而留下来的这些"死忠臣"，则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可是他们绝大多数都历经磨难而对党忠诚，工作兢兢业业，善于联系群众，一般身体都还健康，还可为党工作一段时间。

江一真觉得，福建的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还是党的政策落实得不够，特别是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策的落实，还亟须继续努力快抓、抓好。

江一真回到北京后，迅速写出了《关于落实原闽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政策问题的建议》，于 1984 年 3 月 10 日送交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并报胡耀邦。

胡耀邦在 3 月 14 日，对这将近三千字的建议作了 9 处批注，除标点符号共二百六十多个字——

在"这些组织在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其他大专院校、中学，培养并发展了一千四百多名知识分子党员，其中大专学生五百五十余名"处，**耀邦注："请注意！"**

在谈到"多数人屡屡挨整，级别偏低，有的生活困难"处，**耀邦注："要重视这种情况！"**

在提到"不少人学有专长……三分之一以上有亲友在海外、港澳、台湾"处，**耀邦批注："要一个一个了解一下，凡属真有专长身体又好的人，要吸收他们参加搞侨务工作、对外经济工作、科技工作和教育文化工作。"**

在"政治上对原闽南地下党组织的形象和作用要作出正确评价"处，**耀邦注："两三句话就讲清楚了！"**

在"六十岁以上的，一般可不在第一线担任实质性工作，但现在二、三线如顾问、人大、政协以及侨务、外经、外贸等战线妥善安排"处，**耀邦注："分别几种情况，加以调整安排是对的。"**

在"这些同志中的冤假错案，尚未平反的应尽快彻底平反，还未恢复自由的应尽快恢复"处，**耀邦注："要快刀斩乱麻！只要不搞繁琐哲学，纠缠细微末节，几天时间就可解决。"**

对"1982 年以前工资级别一直没有调整过，目前工资又确实偏低的，建议拨出专项指标，给予调整解决，有的可多调两级"的建议，**耀邦批注得更细更感人："搞了几十年革命，受了半辈子委屈，现在在待遇上调高两三级，人不多，花不了几个钱。省委就可以定！"**

对"工作有需要和有条件去港澳、台湾、国外的，可安排他们出去，有条件和必要的可长期在外工作和居住"的建议，**耀邦也批注得相当细致："只要有条件，而且本人愿意，完全可以去。去时还可送点安家费。在国外多有些故乡人，好处很多。这方面也要进一步破除保守思想。"**

最后，对这整个建议书，耀邦批了这样两句和日期："薄一波同志阅后转野苹同志。请中组部协同福建抓紧进一步解决。三月十四日"。

三月十七日，薄一波在"一波"二字上划了个圈，以示"圈阅"。

福建省委的同志，看到了耀邦的这个批件复印件奔走相告："密密麻麻，大快人心！"他们都认为这是党中央对福建党组织、福建知识分子的最大关怀，必须不折不扣地火速照办。

可是在那个特定的境地，有个别别有心机的人，竟利用几个高干子女，对党的历史，尤其对福建地下党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残酷性不甚了然的弱点，怂恿他们向正在福建检查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告省委书记的状，说什么中央早有规定，平反只是政治上的平反；而省委书记却独出心裁，要给这些人解决"级别待遇"问题，而且还要给他们一下就要提高三四级，这也太玄了！

这位领导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了。他听到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凡几，所以没有一听就信。他还要兼听兼听"被告"究竟如何的"玄"法，于是就有了下面他与项

南的一场对话—— 这位领导问："有人说你给人平反还提级，而且对有些人一提就是好几级。可有这个事？"

项南答："不错，有！"

问："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你过去也吃过冤枉，给你平反时，别人给你提级了吗？"

答："没有。"

问："可见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平反就是政治上平反；为什么还要给他们提级呢？"

答："就是应该提，而且要多提几级！一个大学教授，现在还是二十几级，跟我们那些扫地打杂的勤务员们是同等级别待遇，这怎么叫人看得下去，又怎么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这些吃了半辈子冤枉的大学教授，一下提个三四级，也不过二十级左右，这多吗？"

这位领导不禁一愣："啊，有理由，这可以，真是你的一个创造！"

项南神情严肃地说："这可不是我的创造。"说着便拿出了耀邦同志的批件。

这位领导兴致冲冲地说："耀邦这批示很好嘛！"他把批件带回北京后不久，党中央转发了这个文件，督促各地推动类似政策的兑现。

四、真是"快刀斩乱麻"

1984年5月26日，离耀邦3月14日的批示连头带尾才两个月十二天，福建省委就向党中央写了《关于调查处理福建地下党问题的报告》，报告了从1981年耀邦对福建的一位党员干部来信的批示起，到1984年3月14日对江一真建议的批注止，福建各级党组织和各部门对有关地下党同志落实政策的情况。

《报告》说——

> 对于有关地下党员的刑事或党政纪处分案件，分别由纪检、政法和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受理，于今年底根本复查处理完毕，同时还要认真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消除影响，落实政策。对于遗留的组织和党员党籍问题，以及落实地下党干部政策的遗留问题，由组织、人事部门根据有关文件规定的精神抓紧调查处理。对于有关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和"五老"人员的优抚工作，由民政部门和老区建设委员会继续抓紧抓好。总之，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一定要各负其责，善始善终地把地下党问题解决好。

中央和耀邦见到了这份报告，立即批给中央组织部办理。当年8月7日，福建省委就接到了中央组织部的通知。通知表示"同意省委对福建地下党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认为：

1991年，江一真（右二）、项南（右三）在黄山

> 1981年以来，福建省委对处理地下党遗留问题，做了很多工作，解决了几个在全省有重大影响的地下党遗留问题；平反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承认了一批地下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游击队；恢复了一些地下党员的党籍，并作了大量的善后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
>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按照耀邦同志今年三月对江一真同志关于落实原闽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政策问题的建议的批示精神，继续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凡是问题较多、任务较重的地方和单位，必须组织一定的力量，善始善终地做好这项工作。

当月29日，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印发了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江一真给中央的建议和耀邦的多次批示以及中组部的这个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根据耀邦的批示精神和中组部的意见，认真检查这方面的工作，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

后来很快，福建"老大难"之一的地下党遗留问题，终于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责任编辑　萧徐　洛松）

满门英烈的张太雷一家

● 伊　里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1921年就受党的委派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历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党的第四、五届中央委员，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北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等职。1927年他在领导广州起义时，不幸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才28岁。

张太雷江苏常州人。1918年与夫人陆静华结婚，育有二女二子，家庭非常幸福。张太雷牺牲后，陆静华历尽艰辛，含辛茹苦，顶住国民党反动派对她一家的迫害，一面奉养婆母，一面抚育幼孤，在抗日战争紧急关头，毅然把一子一女先后送到皖南地区的新四军。1941年，皖南事变中，大儿子张一阳不幸被俘，英勇牺牲。小儿子张知春从苏联学成后回国，“文革”中被造反派诬为“苏修特务”，对他百般折磨，加上他突然听说在常州家乡的母亲和大姐张西屏，因不堪忍受造反派无端的欺辱与迫害，双双自缢身亡，突然神经失常，至今仍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

张太雷、陆静华的家庭是革命的一家、英雄的一家，也是为革命事业作了无私奉献的悲壮的一家，从这个家庭传出的感人事迹，被人们广泛地传颂着。

张太雷家原本是常州有名的大户，但传到张太雷父亲张亮采时，家道已经中落。张太雷出生时，父亲为他取字“泰来”，应周易“否极泰来”之意，把振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可是，这良好的愿望并未能挽救衰败的家运，张太

雷三岁时，全家因贫困，靠亲戚举荐，张亮采在江西安源煤矿谋了个小职位。然而在张太雷八岁那年，刚得温饱的小家，又因张亮采去世，悲痛欲绝的母亲只好带着张太雷和他的姐姐返回常州，靠给人帮佣和做针线活养活张太雷姐弟。张太雷小时非常聪明，儿时随父亲读过一些诗文，有些旧学的根底，被送进小学读书后，又非常勤奋，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还能写出一笔出色的赵体字。长辈、老师都很喜欢他，校长还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张复”，希望他成为复兴国家的栋梁之材。张太雷小学毕业后，顺利地考入常州中学堂。当时西方文明的进步思想和文化已逐渐传入中国，张太雷如饥似渴地追求宣传科学进步思想的知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他都读过。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先贤，更是充满了无限崇仰之心，立志长大后要效法先辈，挽救沉沦中的中国。张太雷除苦学文化知识之外，还广泛涉猎体育、棋类、书法、诗词等领域，积累广博的知识，这为他以后投身社会献身革命事业，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张太雷在学校读书时由于思想激进，随同学参加过拥护武昌起义、反对签订不平等的二十一条条约等政治活动，临毕业时，他和同在一个学校读书的瞿秋白都被校方列为除名学生。当时，北平知识界新思想运动很活跃，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风气新，许多著名的学者云集北大，成为进步青年仰慕的地方，张太雷也非常向往北大的求学环境，遂考入北大预科。可惜他只读了半年，因经济困难又改进天津北洋大学法律系，想毕业后当一名律师，为劳苦大众伸张正义。

就在他在北洋大学读书时，母亲写信催促他回家结婚，1918 年暑假，张太雷回到常州，和陆静华结婚了。

陆静华是常州南乡人，和张太雷是同乡。她自幼父母双亡，跟随叔父婶母生活。仃伶的身世，使陆静华过早的成熟，养成了寡言内向、外柔内刚的性格。陆静华 20 岁时，叔父为她作主，许配给西下塘张家之子，即张太雷。从此，一个是风华正茂、才学过人的年轻学子，一个是温柔文静、娴熟女红、精通文墨的贤惠姑娘，他们结为终身伴侣，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家。

正当张太雷在天津求学的时候，马克思、列宁的革命学说传到了中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炮声，振奋了中国广大觉醒的年轻一代。张太雷读了不少当时报刊上刊载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宣扬革命的文章，使他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人生观发生了突变。他对朋友表示：“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他是天津的学生代表之一。在那个急风骤雨的年代，张太雷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太雷”的名字，就是这个时候他自己取的，寓意自己像长空霹雳，摧枯拉朽，猛击腐朽的旧制度。在火热的斗争中，张太雷与李大钊、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毅然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精通多国文字，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翻译，往来于北平、上海，帮助李大钊、陈独秀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参加北平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还担任天津党、团组织的领导人。由于他积极投身于革命工作，毕业时，连毕业文凭都来不及回校领取，该文凭至今仍保存在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的档案中。

尽管张太雷因工作繁忙难得回乡探亲，家里的一切全靠陆静华撑持，但只要他回家，这个小小的家就充满了欢声笑语，洋溢着融融生意。每逢他回家，不仅抢着干家务，为妻子分劳，还教妻子读书、写字，告诉她革命的道理和外面世界的许多新鲜事，使这个善良的家庭妇女胸怀逐渐开阔起来，积极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两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西屏”。

1921 年年初的一天，陆静华收到张太雷寄自天津的一封长信，告诉她自己要到国外去求学，并谆谆嘱咐她要学习她喜爱的刺绣和绘画，掌握一门娴熟的手艺，并要她多读书，充实知识，做一个独立的女性。张太雷在信上说：“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好，那时我们多快活啊！”字里行间，对妻子充满了希望和温情。

张太雷要去的地方是俄国。俄国，这个名字

张太雷与夫人陆静华

对陆静华来说是多么陌生和遥远，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她捧着信，久久凝望着北方……

此刻张太雷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乔装成商人，偷偷越过风雪交加的中俄边境，安全到达了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东方局就设在这里。张太雷很快担任了东方局中国科书记，并受命准备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共产国际"三大"的会议厅里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挤满了各种肤色和操着各国语言的代表。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健步走进会场，在国际讲台上第一次响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声音。他的发言使各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解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他还先后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少共国际"二大"，并为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积极做筹备工作，他的许多意见和建议，受到了列宁的重视。

张太雷的无穷的精力、渊博的学识、乐观的态度和热情诚恳的作风，吸引了各国的同志。日本共产党领袖片山潜、越南革命家胡志明都成了他的好友。张太雷还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革命作出了不少贡献，是中共最早参加国际共运的活动家。

后来，孙中山组织赴俄考察团，派太雷再次去苏联。任务完成后，他留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并在东方大学学习。张太雷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兴趣广泛，除博览中外书籍外，他也热爱大自然，常常和同志们到郊外游玩。一片树林，一湾小溪，都会使他留连忘返。在绿草如茵的旷野里，他们纵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张太雷都常有独到的见解。对邓肯的舞蹈、罗丹的雕塑，以及古典歌剧、芭蕾舞，张太雷都很感兴趣。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五大"时，他担任秘书和翻译，夜以继日地工作，李大钊称赞他"学贯中西，才华出众"。

张太雷去了俄国以后，陆静华按照他的嘱咐，在家奉养老人，教育孩子，同时按照太雷的期望，抓紧学习。半年多以后的一个深夜，张太雷突然悄悄回了家。原来是他因国内革命斗争形势需要，提前从俄国回国。他给母亲带来了一块雪白柔软的俄国毛毯。可惜这次他在家只呆了两天，就匆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了。

这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张太雷为建党、建团、国共合作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也时时惦念着老母、妻女。这时，他的二女儿西蕾也出世了，他把陆静华和两个女儿接到上海，住在慕尔唯路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从未出过远门的陆静华，看到丈夫成天在外忙碌，还不时有一些学生来向他请教问题，一谈就是大半夜。张太雷清秀儒雅，有学者风度，讲话又颇有风趣，他的讲话常常使满座皆欢，气氛十分活跃。这时，陆静华也常常坐在一旁听他们谈话，逐步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张太雷有时和妻子出去散步，城市的喧嚣，熙来攘往的人流，黄浦江上的点点渔火，都使张太雷更热爱这沸腾的生活，更关怀遭受苦难的民众，他的情怀也渐渐感染了静华。他告诉静华，真正幸福的日子不久就

要来了，还不时低低地反复哼唱起《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给陆静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常去看望张太雷夫妇。孩子们一看见蔡伯伯、瞿叔叔，马上就活跃起来。陆静华微笑着招待客人，心想丈夫有这么多善良、正直的朋友，他们是多好的人啊！

由于婆婆身体不好，半年后陆静华带着孩子又回到常州。不久，儿子出世了。因为是冬至那天生的，按《周易》"冬至一阳生"之意，张太雷给儿子起名"一阳"，也寓意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革命信念。

1921 年 11 月，张太雷第一次从俄国回国后，就担任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助手和翻译。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马林和陈独秀多次会谈，因双方意见不一，多次发生争执，关系闹得很僵。张国焘虽和马林比较熟悉，但对马林与陈独秀之间的争执不愿讲话，所以，能够在马、陈之间做沟通工作的就只有张太雷了。不久，法租界巡捕房突然查抄了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住所，逮捕了陈独秀夫妇在内的五个人。陈独秀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时有"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之称。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张太雷闻讯后非常焦急，立刻向马林报告，并商讨营救的方法，结果马林拿出五千元，由张太雷请著名的外国律师巴和为陈独秀辩护，并到巡捕房上下打点，很快陈独秀就被保释出来了。

这一场虚惊之后，陈、马二人之间逐渐消除了隔阂，经过协商，统一了决定国共合作的意见，并决定由张太雷陪同马林会见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屡遭挫折的孙中山很重视这件事，派廖仲凯到桂林迎接马林并护送到广州。在广州，孙中山亲自迎接马林和张太雷。为了打消孙中山的顾虑，张太雷向他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和共产国际的情况，并且向孙中山坦率诚恳地进言："国民党多年奋斗之所以难以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发动群众，只是和军人政客打交道。如果能够深入劳苦民众，启发他们的爱国精神，领导全中国人民去奋斗，革命一定成功。这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做的事情。"孙中山把张太雷引为知己，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并让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

国共合作后，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张太雷受党组织的指派，又再次南下广州，当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兼任广州区委的领导工作，并主编机关刊物《人民周刊》。这时他已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

张太雷在这次去广州之前，回常州探望母亲和妻儿。他拿出一幅精美的湘绣送给陆静华，谁知这幅湘绣竟成为太雷送她的永别纪念。陆静华精心地保存着这幅珍贵的礼品，直到解放后才把它献给了革命博物馆。

张太雷到达广州时，国民党右派正蠢蠢欲动，企图暗杀一批左派和共产党人，鲍罗廷的名字也列在黑名单上。狡诈的蒋介石为了掩饰自己的右派面孔，也常来鲍罗廷家作客。张太雷对蒋介石早存戒心，"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张太雷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尖锐指出当时存在的政治危机，要人们提高警惕。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他支持毛泽东、周恩来要坚决反击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主张，建议共产党应掌握有自己的武装。由于陈独秀等人的软弱妥协，蒋介石又利用"整理党务案"进一步打击共产党。张太雷更加忧愤和焦急，他不断写文章揭露蒋介石的阴谋。

在"四·一二"政变后的危急关头，张太雷调任湖北区委书记。他坚定地表示："我们要改变斗争方式，农民要上山，搞武装斗争。"他一面顶住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投降主义，一面领导同志们进行各种应变准备。7 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改组，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张太雷任中央常务委员。八七会议后，他出任广东省委书记，积极准备暴动。当时南昌起义已经失败，局势非常险恶，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忠心为党为人民的共产党员是不怕困难的，我为革命义无反顾！"

11 月下旬，他带着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指令来到广州，不顾危险日夜四处活动，进行起义

前的准备工作。他的自信、沉着和热诚，深深感染和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个同志。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点30分，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整个城市从沉沉的黑暗中惊醒，经过激烈的战斗，两个多小时就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昨天还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羊城，今天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到处是标语、旗帜，欢歌笑语，夹杂着嘹亮的口号，人声鼎沸，枪炮震耳。清晨，彻夜未眠、指挥战斗的张太雷，容光焕发地主持了广州工农兵政权的首次会议，他担任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代理主席。

12日正午，庆祝大会在丰宁路西瓜园广场召开，会场上响起了张太雷庄严的声音："广州苏维埃成立了！"全场一片欢腾，接着他激动地宣读了共产党的政纲和政府成员名单。大会结束后，听说由观音山一带扑过来大批由帝国主义军舰掩护的敌军。张太雷急忙赶去指挥抵抗。当时，他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曼同乘一辆车，紧急中，他和原坐在司机旁边的罗曼换了座位，谁知车过惠爱西路与大北直街（现解放北路）附近时，突遭埋伏。张太雷英勇还击，罗曼安然脱险，而张太雷却身中三弹，倒在车上，壮烈牺牲。

当时正在广州的陆静华的叔父得知张太雷牺牲的消息，马上写信把这噩耗告诉远在常州的侄女，并要她警惕国民党对她一家的迫害。

张太雷一走三年，虽然经常捎信寄钱回家，却始终不见人还，陆静华日夜盼望他早日归来。可是，她没有想到盼到的却是这最不幸的消息。陆静华痛不欲生。开始，她不敢告诉婆母，只能独自悲泣。婆母见静华终日落泪，再三追问，静华不得已才把实情告诉了婆母，婆母惊痛之下，瘫倒在床上。陆静华擦着眼泪安慰婆婆说："妈请放心，一切有我。您在一天，我侍奉您一天。我一定要把儿女养大，决不辜负太雷！"

她当即收拾行装，去上海找地下党！

白色统治下的上海一片混乱，陆静华小心机警地找到了党组织。同样悲痛的同志们，一再安慰她，为防不测，还劝她带着孩子去苏联。但陆静华想到瘫痪在床的婆母，婉言拒绝了组织上的好意，只是同意将小儿子张知春送去苏联抚养并学习。

陆静华带着组织上给的少量生活费回到常州，她嘱咐孩子们说："以后不要再对外人提起你们的父亲。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他在外地教书，不知道他的音讯。"为了避人耳目，陆静华把家搬到城里的一个大杂院中居住，独自挑起了奉养婆婆和抚育子女的重担。

婆母多病，要请医吃药；孩子们大了，要上学堂读书，陆静华一面拼命干活，一面四处求人，以每学期都能考进前三名为条件，免费把几个孩子陆续送去上学。街坊邻居看她如此艰难，就劝她说："你日子过得这么苦，女孩子还送去读书干什么？"陆静华总是回答说："这是他们父亲的意思。"她牢牢记住张太雷要她学习，做独立的女性的话，因此也希望两个女儿能够像她父亲期望的那样，做一个自立的、有思想、有知识的人。

在父亲的影响和母亲的教育下，张西屏、张西蕾姐妹，从小就聪明勤奋。她们上学后，因为功课好，连续跳级。初中毕业后，姐妹俩双双考入了苏州女子师范。张西屏从苏州女师毕业后，回常州当了小学教员，帮助母亲挑起养家的重担。和母亲一直相依为伴，直到母女人生的同时结束。

继续上高中的张西蕾读到二年级，赶上"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她和同校的进步同学一起参加抗日活动，到医院帮助护理伤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将破矣，人们不愿做亡国奴的呐喊声，深深震撼了张西蕾的心。有同学邀她随军去国民党大后方，她征求母亲意见时，陆静华说："这和你爸爸走的不是一条道。"张西蕾明白了母亲的意思。不久，她告诉母亲想要去上海找党，投靠革命，母亲赞同了，为她收拾起简单的行装。

送走张西蕾以后，局势越来越紧张，为了躲避战祸，陆静华带着婆母和大女儿张西屏、儿子张一阳逃到乡下。可是，乡下也不是安全之所，不久，全家又返回到常州城内。这时家境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陆静华对还不满14岁的儿子一

阳说："棠棠，妈对不起你，本想让你继续再读高中，可是……"话还没有说完，张一阳就说："妈，您别说了，我都明白！"因为营养不良而十分瘦弱的儿子紧紧抱住了母亲。不久，一阳去了西门外协丰油坊当学徒。

张西蕾一路千辛万苦到了上海，好不容易才和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她自己原想去延安，可是，上海的党组织决定送她去刚建立不久的新四军。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山区，去新四军的人需以遣送难民回原籍的名义，先安排在上海河南路难民收容所，然后转道浙江再去安徽。张西蕾和许多同她一样决心投奔革命的热血青年一起，开始了又一次长途跋涉。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冯伯华，就是在去新四军路上结识的。

张西蕾到达新四军军部以后，由于她勤奋工作，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一天，通知她去听周恩来副主席的报告，张西蕾被队长叫进周副主席的屋里。西蕾迎着周副主席父亲一样慈祥的目光，刚叫了一声"周伯伯"就泪如雨下。周副主席亲切地让她坐下，关心地询问她家里还剩下什么人？然后要陈毅派人去把他们全家接来，特别关照要把张一阳送去延安。周恩来和张太雷从青年时期就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他对烈士的遗孤充满了深情，勉励张西蕾要努力学习，为党工作，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

不久，军部按照周恩来和陈毅的指示，派人到常州准备把陆静华一家接来。可是陆静华不忍心丢下有病的婆婆，再一次谢绝了组织上的好意，只请来人把张一阳带走，让他走上父亲的革命道路。

第二天天未明，载着她儿子远去的小船快要开航了，陆静华赶来为儿子送行，看着已经启动的船身，她将一只小衣包丢进船舱，泪流满面的嘱咐爱子，到部队后要听二姐的话，要平安地早日回来。船走远了，她还停立在江边，望着渐渐模糊的儿子的身影。她这已是第三次送亲人出征了，可她没有想到儿子这一去，竟也成为永别。

张一阳到达新四军军部以后，见到二姐张西蕾，姐弟俩喜出望外。张西蕾从口袋里取出一支新华牌钢笔递给张一阳，对弟弟说："要用这支笔好好学习，不要给父亲脸上抹黑！"张一阳被分配到四队当学员兼文教干事，很快，大家都喜欢上这个踏实要强、什么都想学、对什么都认真的年轻人。不久，他和姐姐张西蕾一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调到三支队教导队当政教干事。

1941 年，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奉命北撤，军部安排后勤机关和女同志先行。张西蕾考虑弟弟年纪太小，身体孱弱，就向组织上请求让张一阳和她一起走，组织上同意了。可张一阳不干，他对姐姐说："我已经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了，张太雷的儿子更不能特殊！"他决定和部队一起走，姐弟俩挥泪而别。

张一阳所在的部队为了掩护军部撤退，经历了几次恶战，大多数人牺牲、被俘。张一阳受了伤，也落入敌人魔掌，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集中营的生活如人间地狱，每天只发给每个人两杯清水、两碗白饭，还要被驱赶去担负开山挖石等苦役。由于监狱环境非常恶劣，传染病蔓延，许多人染上了一种凶险的地方病——回归热，每天都有不少人死去。有的人尚未断气，就被敌人拖出去活埋。张一阳不幸也染上了这种病。他病后，难友们强烈要求狱方为他治病，并要求改善监狱的条件。难友们的举动，引起敌人的怀疑，这个张一阳到底是什么人？还不到 18 岁，竟能煽动起这么大的风潮！于是，派叛徒到狱中打探。结果更使他们愕然，原来张一阳是中共领袖张太雷的儿子！特务们好像手上抓到了一张王牌，马上设下圈套，把张一阳抬进了医务室，特务头子假笑着对高烧中的张一阳说："你瞧，这是特效药，这是自首书，只要你在这上面签上字，马上就给你打针！"张一阳对敌人的阴谋毫不理睬。特务又劝诱说："你有张太雷这样的父亲真是好福气！他和我们蒋委员长都有交情。你投过来保管你高官厚禄，可别不识时务哟！"不管敌人如何威逼利诱，张一阳始终一声不吭。老羞成怒的敌人把张一阳和两个难友扔进柴房，断了他们的饭和水。

高烧昏迷中的张一阳，反复在喊"打退敌人进攻"！第三天黄昏，他清醒过来，费力地对身旁

的难友说："如果你能越狱，请把我的指甲和笔尖带给我姐姐张西蕾……"难友们含着眼泪守着他，直到他那滚烫的身躯渐渐冷却。

张西蕾非常担心弟弟，日夜盼望他能平安归来。然而，她看到的只是越狱同志历尽艰险送来的弟弟的遗物。她用颤抖的手把它们包在一方洁白的布中，珍藏在自己的背包里。这年秋天，日伪军集结了大批军队向根据地大举进犯，张西蕾率领的抗大女生队在黑夜中和校部失散了。黎明时分，枪声骤起，敌人发现了她们，张西蕾当机立断，下令全队抛掉背包，游泳过河。脱险后，她突然想起弟弟的遗物也随背包沉入了河底，却连那条河的名字都不知道。陈毅代军长和刘少奇政委听到张一阳遇难的消息，都非常痛惜。他们勉励张西蕾，要坚强地战斗下去，争取革命胜利的早日到来，为两代烈士报仇雪恨！

18 岁的张西蕾，当时已担任苏中根据地抗大女生队的政治指导员，她精明能干，引起不少单身男同志的倾慕。但是张西蕾有自己的心上人。当年和她同时赴皖南参加革命的战友冯伯华这时已调到抗大学习。冯伯华工人家庭出身，聪明勤奋，知识广博，在当年辗转去皖南投奔新四军途中，张西蕾对冯伯华的印象就非常好，视为知己。参加革命后因战争环境几次分开，这次冯伯华调到抗大，朝夕相处，张西蕾深深爱上了这位忠厚正直、品学兼优的青年。

婚后，因战事频繁，他们又人分两地，但他们的心息息相通。冯伯华肺病复发，住进了苏中军区医院。快要临产的张西蕾征得了组织的同意，深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找到了隐蔽在老乡家的军医院。不久大女儿呱呱落地，冯伯华和张西蕾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双双重返前线。

八年浴血抗战终于胜利了，随后又经历了三年解放战争，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张西蕾不仅从未回过家，而且和母亲也很少联系。直到 1949 年 4 月大军过了江，张西蕾才带着三个子女去常州探望母亲和姐姐。陆静华看到女儿、外孙，喜极而泣，转眼望着墙上张太雷的照片，心里百感交集。这时，奶奶已经病故。张西蕾很感激姐姐张西屏为家庭做的贡献。过了几天，冯伯华也赶来拜望岳母，陆静华非常喜欢这个憨实、精干的女婿，一家人沉浸在团聚的幸福中。

解放后，张西蕾和冯伯华都被分配到南京化工系统工作，冯伯华后来任化工部副部长，张西蕾任化工部所属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兼党委书记。有一天，张西蕾突然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有着陌生口音的电话，原来是失去多年音讯的小弟张知春，从苏联回国寻找亲人。路过上海时，陈毅市长告诉他，陆静华健在，二姐张西蕾在南京工作，张知春就急切地给姐姐打来电话，希望早日见到母亲。张西蕾激动异常，她嘱咐弟弟赶快到南京来，她自己则赶回常州接母亲。当一别多年的张知春见到满面慈祥的母亲时，激动得跪倒在地，长呼一声："妈妈！"这是陆静华多年来梦绕魂牵想听到的儿子的呼声，母子俩都觉得此时此刻恍如隔世。陆静华把全部的母爱都倾注在小儿子身上，为他织毛衣，做家乡可口的饭菜，校正他的中文发音，带他上街、散步……张知春一刻不离地紧跟在母亲身边，他感到从来没有的幸福。由于在苏联的学习任务没有完成，张知春不得不告别母亲和姐姐，又只身北上，返回苏联。临行时，他像当年父亲孝敬祖母一样，把一条雪白柔软的毛毯留给了陆静华，深情地说："妈妈您多保重！我还会回来看您的。"

谁能想到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张知春被驱赶回国。"文革"风暴来临，他又被当作苏修特务在北京批斗。当听到母亲、大姐因不堪屈辱，双双自尽的噩耗时，他紧张到极点的神经再也支撑不住，全面崩溃，竟神经失常了。张西蕾探听到小弟无人照管的惨状，悲痛至极，几次向周总理写信求援，终于使弟弟脱离了监禁、批斗，送进医院治疗，病情得到缓解。又为他力争在工资、住房等方面得到合理的待遇。"文革"后，张知春神经不正常的病体，仍然时好时坏，已是鬓发斑白的姐姐张西蕾，经常带着鲜花、食品等去看望病中的弟弟，尽一位长姐的手足之情，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张西蕾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在她身上可以感受到她继承了父亲张太雷那种好学不倦、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精神。在她 36 岁已是五个

孩子妈妈的时候，以良好成绩考入北京化工学院，学习高分子专业。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岁月，张西蕾充分发挥了一个共产党员和科技工作者的作用，为三线工厂的设计、开工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为了铺设急需的西宁到拉萨的输油管，她来到海拔三四千米的青海高原。那里渺无人迹，很少见到女同志，象她这样年近半百，还在风雪中指挥施工的更是绝无仅有。由于地势太高，空气稀薄，条件艰苦，张西蕾得了冠心病。

就在西蕾顶住唐古拉山口强劲的北风，在顽强拼搏工作的时候，来自家乡常州的噩耗像一股狂飙几乎将她击倒……她的母亲陆静华和姐姐张西屏不堪凌辱，双双自缢，以示抗议。

陆静华，这位既是烈士的贤妻又是烈士慈母的伟大女性，在全国解放不久，应邀来到北京，她将张太雷的遗物送交革命博物馆保存。周总理关切地询问她家里的情况，请她吃饭，还曾将她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握着她的手，亲切地称她为“大嫂”。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热心的陆静华当了常州市烈军属委员会的副主任。刮风下雨，她都不辞辛苦地四处奔走，关心军烈属的疾苦，还把儿子的抚恤金捐献出来办工厂。

后来，她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市妇联副主席，工作更是积极了。

大女儿张西屏这时也入了党，调去做统战工作。不久，她爱人因病去世，母女俩更是互相倚靠，互相扶持着艰难地抚养着西屏的五个子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这座江南小城，陆静华母女也未能脱此厄运。

瞿秋白被诬为“叛徒”后，陆静华也受到了冲击。“造反派”逼她交代和瞿秋白、杨之华一家的关系。瞿秋白和张太雷是同窗好友，瞿秋白牺牲后，陆、瞿两家一直保持着联系。解放后，陆静华帮助杨之华处理过不少瞿家的家务，比如帮助安葬了瞿秋白烈士的母亲。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成了陆静华的罪状，骂她是为“叛徒”瞿秋白树碑立传。女儿张西屏，此时也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被诬为“吃剥削饭的老板娘”。1968 年炎夏的一天，陆静华这位善良的烈士遗孀，忍受不了这无端袭来的欺凌侮辱和无休止的批斗，决心和女儿以死明志，二人相对而泣，留下遗书后，双双吊死在后园的树上。

听到陆静华母女自尽的消息，邻居们都纷纷赶来帮助料理后事，自发来悼念她们的人把一条街堵得水泄不通。人们敬爱张太雷和他的遗孀，敬爱这个为革命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两代烈士家庭。

在“造反派”的把持下，陵园拒绝安放她们的骨灰盒，张西屏的大女儿子娟就珍重地把骨灰盒捧回家。群众怀念陆静华，1976 年清明节时，常州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人群中也有人高举着陆静华的画像，表示对她的敬意和悼念之情。

母亲和姐姐去世后，张西蕾几次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亲自指示当地政府要照顾好张太雷和陆静华的后人，张子娟姐妹才得以留在常州工厂工作，没有被赶到外地。粉碎“四人帮”后，张西蕾回到常州，参加为母亲、姐姐平反昭雪的追悼会，骨灰被安葬在革命公墓。张西蕾此时此刻又好像看到了辛劳一生、善良慈祥的母亲；看到了正直不阿、热情洋溢的姐姐；看到了活泼稚气、勤奋志高的弟弟，还有依稀记得的父亲高大魁梧的身躯……她更难忘的是她们一家为革命所献出的一切。离别常州回北京时，她谆谆告诫子娟姐弟：要永远记住我们一家为革命付出的一切，要世世代代继承祖父母传下的革命家风，努力学习和工作，为完成烈士未竟的志愿，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

现在已近暮年的张西蕾仍兢兢业业地在为党为国家作出贡献，她和大姐张西屏的十个儿女，也个个都学有所成，成为建设四化各条战线上的骨干。这些第三代的孙辈中，有的又各有自己的家庭。在这个代代相传的革命的一家，虽然随着几十年风云变幻，历尽沧桑，但这个家庭的革命家风不变，爱国之心不衰，他们的后辈，在任何时期、任何工作岗位上，都秉承着张太雷烈士的革命意志、革命气节和清廉正气的人品，被人们广为称赞。

（责任编辑　方　徨）

张闻天为何三让中共中央总书记

●孙彦钊

延安整风时期的张闻天

在延安，毛泽东曾对王震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洛甫即张闻天。

事实确乎如此，张闻天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为了党的事业，曾多次主动辞让总书记职务，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丝毫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格。

张闻天对他的这种作为也很自豪。当王震将毛泽东的话转告张闻天时，张闻天说："这是对我的最好评价。"

为了开展党的白区工作，一辞总书记

张闻天是中共党史上第五任总书记。

1935年1月，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召开了，在会议决定的第三条中写着："常委中要进行适当的分工"。

据此，1935年2月初在云南、贵州、四川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了中共中央常委会，推举张闻天为

党的总负责，取代博古。

总负责其实就是党的总书记，可自向忠发叛变后，中央正式文件中就不再称党的最高领袖为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因此，博古也好，张闻天也好，均称总负责或书记。可是人们仍习惯地称他们是党的总书记。

张闻天受命于危难之际，是他本人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和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决定的，是党的明智的选择。

遵义会议前，张闻天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党内是仅次于博古的第二号人物。那时他已经开始抵制和批评“左”倾错误路线，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上他作了“反报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何况张闻天出任党的总负责，也易于被共产国际认可。

据周恩来回忆说，当时张闻天曾推举毛泽东担任总书记，毛泽东没有同意，反过来却支持张闻天。

张闻天就任总书记后，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从而及时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为党和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遵义会议决议中特别提到了中共在白区的工作。决议指出：“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

较长一段时间，由于国民党的破坏和我党“左”倾错误的推行，特别是30年代初顾顺章的被捕投敌、向忠发的叛变，使白区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白区工作遭到极大的损失，在当时成为全党工作异常薄弱的一环。然而白区工作开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共力量能否发展，因而如何在新形势下重建和加强白区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

1935年3月，张闻天接到了红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获悉上海中央局早在1934年10月就遭到破坏，心情异常沉重。他找来当时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潘汉年，希望潘能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同时寻求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可是中央还是不放心，并有意派出一领导同志去白区工作。

1935年4月，红军渡过北盘江后，中央进行讨论，张闻天主动提出由他去。

张闻天认为白区急需有人去工作，他有责任有义务前往，何况他在上海呆过好几年，也有一定的白区工作经验，特别是他感觉自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在毛泽东等人领导下渐有起色，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开始扭转了极其被动的局面，因而他也比较放心。他主动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去白区工作。

然而，中央经过再三权衡，否决了张闻天的提议。张闻天只好服从组织意见，此议暂罢。

五、六月间，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议派人去白区工作之事，最后决定派陈云去。陈云到上海后马上与潘汉年取得联系，但上海严重的白色恐怖使他们难以开展工作，后请示中央奔赴莫斯科。

张闻天到达陕北后，仍十分关心党在白区的工作，他亲自主持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重要报告，推动了新形势下党的白区工作的开展。

顾全大局，二让总书记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人的军事指挥下，党中央和红军四渡赤水河，智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于1935年6月12日在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力量一下壮大了许多，红军上下一片欢腾，中央领导倍受鼓舞。

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团结一致实施正确的战略方针，完成战略大转移，开创新局面。

然而，恰恰在红军战略方针问题上，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发生了分歧。

中央根据对形势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北上”方针，即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尔后占领川陕甘。张国焘认为“西进”、“南下”方有出路，“西进”即到西康、青海、新疆“经济落后，文化落后”区域发展；“南下”即“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双方拧不成一股

绳，产生了尖锐矛盾。

张闻天是坚决支持北上方针的，他和毛泽东等人耐心地与张国焘进行电报往来磋商，交换意见，希望他能权衡利弊，同意中央的战略方针。

6月16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今后行动方针问题。在此电文中称："今后红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电文中明确指出张国焘的西进方针不利，因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况更差，均非发展方向。权衡左右，目前红一、四方面军应坚决打破敌人新的进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并击破胡宗南部的南下，这是计划的关键。

但是，张国焘完全不考虑中央的正确意见，却提出相反的方针。6月17日，他给中央复电称，应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再向南进攻。

6月18日、20日，中央连续两次电告张国焘，分析北上、南下、西进的利弊，明确指出北上是问题的关键，尤其要红军主力攻打平武、松潘，否定西进、南下方针。同时通知张国焘"立即赶到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闻天还特别撰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发表在《前进报》上，说明红军会师的意义和北上战略的重要。文中指出红军两大主力会合"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到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而目前关键是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部队。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召开，张闻天、毛泽东等及红四方面军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

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6月28日，政治局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再次明确了中央早已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及目前攻打松潘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实现北上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

张闻天与夫人刘英和孩子在一起

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也表示同意北上。

然而就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攻打松潘战役部署的当天(6月29日)，张国焘却致电中央强调攻打松潘有困难，同时反对集中攻打的方针，还要求一军团去阿坝、四方面军主力往南，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张国焘还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好，故意拖延执行攻打松潘战役计划。

张国焘一再拖延不与中央合作是因为他的权力欲没有得到满足。在张国焘看来，他率领红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会合，劳苦功高；他领导的四方面军还有8万人，而一方面军已不足3万人；现在他仅仅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这太不公平了。他认为四方面军在中央政治局占多数，才能解决所谓的组织问题，实际上是要夺党中央的权。

7月初，张国焘与人谈话时表示非常关心“统一组织问题”。并抓住《前进报》批评“西北联邦政府”这件事，攻击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关系，鼓动中共川陕省委出面向党中央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

7月10日，张国焘致电中央明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也致电红军总司令部，公然提出要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并有“独断决行”权，同时表示如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就“无法顺利灭敌”。

党和红军又到了危急时刻。一方面是敌人逐渐围攻上来，红军久留在这穷险之地非常不利；一方面是张国焘恃兵要权，从中作梗，拖延执行中央制定的计划。

如果党中央不及时作出决定，党和红军势必受到很大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毛泽东等人还是对张国焘做耐心说服工作，敦促他尽快北上，与一方面军合力攻打松潘地区。同时为了团结张国焘，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在“组织问题”上党中央不得不予以考虑、重视。也就在这种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时刻，张闻天不计个人得失，主动提出辞让总书记职务，与张国焘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7月中旬，中共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相聚在芦花镇，商量如何处理张国焘提出的问题。与会者对张国焘的行为极为愤慨。

张闻天认为张国焘简直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做法与军阀无二。

博古认为对张国焘不能让步，否则，他得寸进尺，就更不好对付了。

毛泽东心情非常沉重。本来红军会师形势看好，谁料竟出此等怪事。但气愤尽管气愤，冷静下来还得认真对待。

毛泽东主要谈了两层意思：一是不让步不行，二是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也不行。

毛泽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攻打松潘的关键是张国焘，必须把他团结过来，使一、四方面军拧成一股绳，完成中央的战略部署，因而必须作出让步。

毛泽东接着分析说：“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可是朱德总司令担任这个职务，他没法取代。张国焘只当副主席，与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又感到不甘心。”

张闻天这时站起来，主动向毛泽东提出为了摆脱目前的困境，为了争取张国焘早日北上，也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就让他当这个总书记吧。”

毛泽东立即表示异议，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位置，麻烦就大了。”

王稼祥等人也不同意张闻天把总书记让出来。

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让张国焘当总政委。按毛泽东的意思是尽量满足张国焘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尔后与担任总政委的周恩来商量，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并说这个安排好，考虑的也是全局。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宣布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这样，张国焘不便再说什么，只好率领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向毛儿盖集中。

但是，张国焘又一次产生动摇，行动迟缓，并且进行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导致红军大部队未能及时集结实施松潘战役计划，延误了有利时机。这时胡宗南部队集中了主力并构筑堡垒，阻堵红军北上。蒋介石又调集各路军队，围攻红军。红军被包围在岷山以西、懋功以北雪山草地之中，处境异常危险。

8月上旬，中央在沙窝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任务及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并做总结发言，同时起草了会议决议。该决议深刻分析了两大主力会师后一个多月来出现的问题，比较策略地抵制和批评了张国焘的“西进”、“南下”的错误方针。

决议再次强调北上方针的正确，“西进”、“南下”方针的错误。

1935年9月，张国焘仍找出种种借口拒绝北上，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张国焘问题，张闻天在会上明确指出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会议还原则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当时没有立即发布)，再一次批评张国焘的错误。

但张国焘却一意孤行，仍然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1938年张国焘叛党，投靠蒋介石特务机关。

顺应潮流，主动让贤，三辞总书记

长征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张闻天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审时度势，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引导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的航程，实现了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张闻天对于和平解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确立和加强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张闻天认为：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因而，他始终把毛泽东看作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从思想上行动上真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上，尊重毛泽东，配合毛泽东的工作，很多事情都要事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自己甘当“配角”，有人表示不理解，有人讥笑他：堂堂党的总书记，怎么老是护着毛泽东，听毛泽东的，如同“泥菩萨”一般。但张闻天依然故我，抱定“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的信条，坚决支持毛泽东，维护毛泽东，并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上与毛泽东“站在一条战线上”。张闻天作风民主，且虚怀若谷，宽宏大度，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所以在中央很多文件或电报上都与他人联名签署，据档案记载，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有洛甫(或张闻天)署名的电报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的多达286件，占总数的64%。正因如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才得以在党中央和军队内顺利推行。

当然，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与他本人卓越的领导才能密切相关。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靠正确主张逐渐确立了在红军和党内的领导地位。

然而，王明的回国却向毛泽东和中央权威提出了挑战，引发了一场毛泽东和党中央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尖锐斗争。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王明从莫斯科经新疆返回延安，当时中共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到机场欢迎，毛泽东致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中共领导人对王明寄予厚望，并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增补王明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次会议调整了书记处。之后，张闻天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是在中央发文发电署名上多以毛泽东居首。

然而，王明回国不久即提出了与中央相背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观点。王明还自恃“钦差大臣”的特殊身份，目空

一切、独断专行，在担任长江局书记时，多次违背党的组织纪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甚至企图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把自己日益凌驾于张闻天、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之上，处处以自己为中心，兜售自己的观点，暴露了王明争权夺利的野心。这时的王明早已把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对他的叮嘱抛到九霄云外。季米特洛夫曾在王明回国前对他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对于当时这种局势，中共极需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指示，于是1938年3月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8月，早在1937年就去苏联养病的王稼祥返回延安，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在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这一重要指示："中共一年多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还特别关照王稼祥让其转告王明"不要竞争了。"

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政治上肯定了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在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也解除了王明右倾错误的武装，王明失去了最后的"庇护"，这样有利于中共完全否定和纠正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张闻天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主动让贤，请毛泽东担任党的总书记。但毛泽东没有同意，并要张闻天继续当下去。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也就没有将这个问题提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

1936年9月26日—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张闻天主持并作了组织报告，这次全会进一步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确认了毛泽东为党的最高领袖，连王明本人也承认"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周围"。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曾提出："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

张闻天虽然没有辞掉总书记职务，但在六中全会后，他主动将工作转移给毛泽东，并把政治局会议地点也移到毛泽东住处，张闻天主要抓宣传教育工作。

张闻天曾在其《延安归来》中谈起这一情况："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也谈到："六届六中全会以后，闻天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毛主席，会到毛主席那边开，一切事情都由毛主席决断。不过，毛主席是大事抓得紧而不爱管具体事的人。所以一般的日常工作还是由闻天处理，中央秘书局也跟着闻天。"（《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第16页）

后来张闻天又几次提出把名义上的总书记辞掉，没有如愿。

到了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至此，张闻天从形式上完全离开了总书记职位。

大凡去过江西瑞金叶坪村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红军纪念塔，塔基周围有10块红色石碑，其中一块刻有建塔碑志，其他8块已镌刻上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凯丰、邓发、项英、博古、王稼祥的题词，还空着一块石碑，原本应该镌刻上谁的题词呢？张闻天！张闻天当时是题过词的。由于种种原因，石碑空了很久。它躺在那里，默默地、无声无息地经历着历史的风雨，经历着时间的考验，它空白的意义远远胜于文字的意义。

（责任编辑　萧　徐）

炸不垮打不散的红军长征队伍

● 童小鹏

红军长征途中，蒋介石除了调遣他的嫡系及各省军队前堵后追和侧击红军外，还利用他的空军优势，每天派飞机对红军进行空中侦察，发现前进中的红军队伍或驻地时，就用机枪扫射或投掷炸弹，以达到杀伤红军的目的。有时，也向红军驻地散发造谣污蔑共产党和红军的传单，妄图扰乱军心和民心。如果同红军进行战斗，他们便利用空军配合炮兵，先对红军阵地进行轰炸、炮击，然后掩护步兵向红军阵地攻击。虽然当时国民党的作战飞机并不多（每次出动一至三架），火力也不强（一架飞机只能带百把磅左右的炸弹二至四枚），但是开始时对红军指战员的精神威胁还是不小的。如果部队集结点受到轰炸，还可造成相当大的伤亡。尤其对于没有经验的新战士，需要有个从“怕”到“不怕”的锻炼过程。

红军老战士们是藐视敌机的，并常常戏谑国民党的飞机只有三种本事：放屁、撒尿和拉屎。放屁，即撒反动传单，根本不要理它；撒尿，即机枪扫射，只要分散隐蔽，没有什么了不起；拉屎，即投掷炸弹，要认真对付，要做好隐蔽和分散，也可以避免大的牺牲。

30年代国民党的作战飞机也有很多缺点。一架飞机只有一个螺旋桨，飞不高，最高三千米；噪音大，很远就听得见；速度慢，发现飞机后，有几分钟的疏散隐蔽时间；雨天、雾天不能飞行，夜间更不能飞行等等。

英勇的红军，既不怕蒋介石和各省地方军阀的大军进攻，更不怕那几架飞机的干扰和轰炸。军委总参谋部总结了对付敌机的经验后，规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命令全军执行，因而避免了许多损失。主要办法是：

一、除因战斗必需外，一般部队的行军时间都避开敌机活动时间，即在凌晨二三时利用夜间行走几十里路后，在八时以前分散在村庄或树林休息；或者在下午五时以后行军，走到半夜再休息。在这些时间内，敌机是无法活动的。

二、无论行军或休息，各部队的司号员都要随时警惕敌机飞临，首先听到或看到敌机的司号员，即吹起“的的的，哒哒哒，的的哒的哒”的警报号，其他司号员也立即吹号。所有指战员听到警报号后，即分散、隐蔽，特别要把白色衣物和骡马等暴露的目标隐蔽起来。等到敌机远离时，司号员又吹出“的的哒哒哒的的哒哒”的解除警报后，才准恢复行军或活动。

三、因战斗需要在白天行军时，每人及骡马或挑的担子，都要戴上用树枝或者青草扎成的伪装帽，发现敌机时，就离开大路，分散卧倒在低洼处或树林、草丛中隐蔽起来，使敌机不易发现目标。听到解除警报后，才恢复行动。

四、如果在一地休息几天时，各单位都要根据地形地物挖防空洞或防空壕，敌机来时有秩序地隐蔽。

五、如在城市或重要阵地，司令部就在制高点布置防空警戒，除司号员外，还架设机枪。当敌机低空扫射或轰炸时，就用交叉火力对敌机开火。红一军团驻在湖南通道县城时，就用架在城门上的机枪打下了一架敌机。

但是，在红军没有防空武器时代，完全避免敌机轰炸是不可能的。1935年3月5日，我在贵州遵义附近，就亲身经历了一次敌机的残酷轰炸，我们所在单位死伤数十人。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取消了博古和外国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接着指定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负责指挥军事。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因而就恢复了毛泽东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战术。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急忙调他的嫡系薛岳、周浑元两纵队共8个师追随到贵阳并继续向北进攻。又调动贵州的王家烈、四川的潘文华、云南的孙渡等大军共13个师、13个旅包围和进攻红军。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指挥下，经过一渡赤水二渡赤水的机动作战，于2月26日在遵义以北的娄山关击破王家烈的阻拦，又于2月28日第二次占领遵义城。接着又在遵义以南打败吴奇伟两个师的进攻。这次战役，共歼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军3千多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军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称赞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遵义附近的群众也为红军打垮了压迫剥削他们的贵州军阀王家烈而高兴，不少青年自动报名参加了红军。

蒋介石听到这次失败的消息后，恼羞成怒，自己飞到重庆去督战，不得不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

大辱”！除了命令各路军队对红军加紧进行包围进攻外，还加调空军到贵阳机场，每天出动多次飞机对红军加强侦察、轰炸，妄图把红军消灭在贵州。

为了乘胜消灭蒋军周浑元纵队，红一军团奉中央军委令，于3月5日清晨从遵义城出发向西往鸭溪方向前进。红军指战员虽然对长征开始以来占领的第一个较大的城市遵义有些留恋，但是为了争取更大胜利，以便把遵义地区建成根据地，也就意气昂扬地离开了它。当地群众则自动夹道欢送红军，希望打更大胜仗后再回来。

我当时在中央红军第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当秘书。局长罗瑞卿，为了及时了解敌我情况，行军时，就骑着骡子到司令部同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一起行进，把保卫局机关（只有三十来人）和一个保卫队（百把人枪）交给我带领，跟在司令部、政治部的后面前进。后面则是卫生部、供给部等军团直属部队。

部队离开遵义城向西，走了约十里的马路，两边是稻田，当太阳从东边出来后，大家估计敌机会来，就把密集的队伍拉开间隔，准备敌机来时疏散。因马路两旁没有树林和杂草，也就无法搞伪装帽。幸好再走一段路就转到小路上，小路弯曲，靠近山坡，较好隐蔽。

大约八时左右，国民党飞机果然出动了。空中远远传来了嗡嗡响的马达声，同时又隐隐看到了三个黑点正向我军的上空靠近。

“的的的，哒的哒……”的警报号吹响了，我即本能地告诉同志们疏散隐蔽。恰好我们队伍正走在一个小松树林附近，这当然是一个隐蔽的好地方，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往松林中隐蔽。可是大家都集中在松林中，也增加了被集中轰炸的危险，如果敌机发现了目标的话，会造成严重的伤亡。这时，敌机已飞临上空盘旋侦察，再来不及分散了，大家各自找个比较低洼的“保险”地方平卧下来，只好“听机由命”了。当时，地面上寂静无声，但空中三架敌机却在狂乱飞翔，噪得天轰地动。我看到队伍都隐蔽好了，就趴在一棵松树旁边，静听动静。

突然，“哒哒哒……”敌机用机关枪扫射了，大概是对分散在路上的目标。接着“轰隆，轰隆”两颗炸弹爆炸了，听声音是在前面部队投下的。我暗想“不会在军团司令部吧”（后来才得知是在军团教导营）。紧接着，又在我们隐蔽的松林中连续投下四颗炸弹，把我们一个小小部队炸得死伤遍地！我虽然侥幸没有中弹，但被震得耳聋目眩，遍身泥土，周围还有一些受伤同志的血迹。

我不管敌机还在空中盘旋，毅然从地上站起来看看部队死伤情况，就在离我十多米远的地方，有一个爆炸点，死伤了一批同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受了伤的陈大生、郭永祥同志按着伤口蹒跚地走过来，满身泥灰和血迹，面孔青白，他们要求赶快找卫生员上药。我看到他们，十分难过。但这时敌机还未离开，卫生员不知在哪里，我只得安慰他们：“你们先在这里躺下，等敌机飞离了，即找卫生员来。”敌机丢完炸弹飞走了，我即找到卫生员来给他们和其他受伤的几个同志一起上药。

我立即跑到保卫队，队长、指导员都正在扶着伤员集中在一起上药。他们说，保卫队死伤较大，可能有几十个。我找到总务科李道元科长要他清查局里死伤人员，并把伤员集中一起上药、休息。

敌机飞走后，部队要继续前进。我们因要处理死伤人员，所以无法跟上，就同几个负责同志商量，一方面派人请求卫生部派大夫、护士来抢救伤员；一方面立即动员全体未受伤的同志分工掩埋被炸死的同志和照顾伤员。同时又派通讯员到司令部向罗瑞卿局长报告。总计共牺牲了八个同志，其中两个班长、六个战士。我和队长、指导员、李科长等怀着对敌人的怒火和对同志的悲伤的感情掩埋了尸体，举行了简单的悼念仪式，并向烈士们宣誓：“一定要为你们报仇！”

接着，就赶紧处理伤员，共计伤员52人，除了3个重伤员外，都是弹片擦破肉皮的轻伤，经过包扎上药后都可跟着部队前进。重伤员中，有两个可用担架抬上几天跟部队走，只有一个伤了头部已入昏迷状态，不好跟部队同行，只得到前面找到一家群众，做好了工作，把总务科仅有的15块银元交给群众，请他帮助治疗，等到能走路时找红军归队。这是一家贫苦农民，他们很同情红军，就高兴地接受了。

把伤员处理后，已是下午四时了，这时才感到又饥又渴，大家只好喝些凉水，吃点炒米又继续前进赶队伍。由于一天的紧张、疲劳，又有不少伤员，勉强走了20来里就走不动了，只得在一个小村罗门城住下来。第二天一早又走了20里，才到鸭溪附近的阎王县找到军团司令部归队。罗瑞卿局长对大家的归队表示高兴，并立即对伤员进行慰问。

毛泽东亲自指挥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的战斗，以及在贵阳、昆明附近采取声东击西的大规模运动战术，把蒋介石指挥的几十万大军远远地抛在后面，他的空军也没有跟上目标。等到5月9日中央红军几万人从云南的皎平渡一带安全渡过天险的金沙江后，蒋介石才惊呼他对红军的追剿又失败了！

英勇的中央红军是一股炸不垮打不散的红色铁流，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地胜利前进，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会师。从此，开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1936年10月，又在甘肃会宁地区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到来。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胜利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

（责任编辑　刘昌亮）

周扬晚年的彻悟

● 宋廷明

周扬同志在平反落实政策复出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同志任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我当时是研究生院现实经济系的学生。每当研究生院有重大活动，周扬都要来给我们这些莘莘学子讲话或作报告。他在公众场合总是保持着一种绅士派头和学者风度，尤其是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不苟言笑的表情和一板一眼的话语，有一种震撼听众心灵的气势，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做人和做学问都很严肃认真的人，令人久久难忘。

省悟：困知勉行

"文革"后的头几届研究生，差不多都是"文革"初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在"文革"中上过大学的"老三届"工农兵学员，大家都有过一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艰苦磨炼的经历，考上研究生后，有的人显得有点自命不凡，不能静心坐下来老老实实做学问，热衷于到处写文章发表自以为是的议论，大有"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味道。

针对这种情况，周扬在1980年研究生院新学年开学典礼上，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着重给我们讲了"困知勉行"的道理，即孔夫子所说的"困而知之，勉而行之"。他说：一个人在顺境中很难获得真知，只有在困境中苦苦求索，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比较，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掌握带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求得真知；同样，一个人不能只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实际情况往往相反，许多事情虽然自己主观上不愿意去做而客观上又需要去做，人就只能勉为其难服从客观需要，"勉而行之"才能真正成就一番事业。那些只愿做自己高兴做的事情而不愿"勉而行之"的人，也许本人很聪明，但到头来很可能一事无成。

他这一席话，讲得透彻，真诚，入情入理，使我们这些心气很高的年轻人打心眼里佩服。此前，我们也听过许多老学者"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教诲，但总觉得像在说教似的，听不大入耳。而周扬的这番讲话虽然也借用了孔夫子的名言，但使人感到是他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因此听起来倍感亲切。

周扬是一生顺境和逆境都亲历过的人。"文革"前，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大红大紫，所向披靡；"文革"一来，又一落千丈，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身陷囹圄十余年，是"四人帮"垮台后最后一批被"解放"的老干部。如果他没有经过这些大起大落的炼狱之苦，可能也不会有这么深刻的醒悟。因此，他的讲话在我们这些有过"上山下乡"磨炼的经历相似的年轻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悔悟：爱惜人才

1981年元旦，研究生院在政协礼堂举行新年座谈会，周扬在会上就培养人才问题即席发表讲话。他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大批各种的人才，研究生院就是为培养人才而开办的。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家培养一个真正的人才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不仅要培养人才，而且要百倍地爱惜人才。根据我一生的经验，培养一个人才需要一二十年时间，而毁掉一个人才只要一两天，甚至一两个小时。人才难得，我们要百倍爱惜人才啊！……讲到这里，一向讲话声音洪亮、铿锵有力的周扬突然语言梗咽，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久久说不出话来……大家静静地听着，他显得无比激动，在场的人也受到了强烈震撼和感染。突然，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打破了会场的平静。这既是对他的肯定，也是对他道出了大家的心声的报答。

事后我想，周扬在晚年能对培养人才和爱惜人才有如此深刻的省悟，实属难得。周扬过去曾长期担任过党的文艺和宣传工作的主要负责

人，我虽然不搞文艺工作，但在同文艺界的朋友交往和从有关史料中得知，从延安文艺界整风，到解放后文艺界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批修正主义等，在他所领导的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人无计其数，受到摧残和株连的文化、教育和知识界的人才成千上万！当年他在整人的时候，绝对不会认识到培养人才和爱护人才有多么重要。他虽然整过很多人，但最终没有逃脱在"文革"中挨整的厄运。也许是既整过人又挨过整的人，能够切身感悟到整人不对。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扬平常是一个喜怒哀乐含而不露的人，他之所以在讲到爱惜人才时激动得老泪纵横，可能既带有对自己在过去领导的历次运动中伤了那么多人才的一种深切的悔悟，也包含着自己后来挨整时所遭受的种种不平的痛楚回忆，因此才能有如此真情的流露。的确，周扬在复出复职之后，不但再没有整过任何人，而且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关心、提携和保护了不少人才。当时有个著名女歌唱演员由于采用一种新的唱法遭到了许多批评感到压力很大，周扬就曾在有关会议上仗义执言，并当众给予支持和鼓励，这个女歌唱演员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又是周扬帮她得到了解脱。

对"作茧自缚"的彻悟

然而，这位大声疾呼爱惜和保护人才的坚强老人，在晚年却没有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80年代初，他因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演讲和文章，遭到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的严厉批评，各种报刊也相继发表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其声势不亚于"文革"中对他们"四条汉子"所作的声讨，使他又一次陷入了极度困境之中。他在被迫作了检讨之后，便住进了医院一病不起。当然，这种靠发动起来的群众性批判也难免会闹出许多笑话。当时某省的一位负责人在本省组织的批判会上竟振振有词地说："中央号召我们搞"四化"，而周扬却只讲"一化"(异化)，这不是公然与中央唱对台戏吗！"对于"异化"到底是什么，的确当时有许多参加批判的人并不太清楚。

1983年冬天，我到北京医院去探视一位领导同志时，也顺便去看望了病中的周扬，他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只见他在人的搀扶下挣扎着下了病床，腿脚僵直，缓缓移动到沙发前坐下，面无表情，目光呆滞，语言梗塞，偶尔从嘴里迸出一两个字，半天也难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他的夫人苏灵扬女士在旁边给他倒水，剥好桔子一瓣一瓣地送到他嘴里慢慢地咀嚼着。只有从他腰板笔直、目不斜视地端坐在沙发上的姿式里，能使人想起他当年给我们作报告时的风采。我在一旁静静地望着这一切，心头掠过一阵难以名状的悲哀。

周扬在研究生院给我们作报告时，也曾讲到过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由于我们大多数人不是研究哲学的，因此他讲得非常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他说，所谓"异化"就是事物发展到了自己的反面，好比"作茧自缚"。茧是蚕自己吐出的丝做的，但茧做成后，蚕反而被封在自己吐丝做成的茧里面，只有蚕蛹变成了蚕蛾之后，才能破茧而出。他还举例讲到了防止权力、劳动和人的思想的"异化"：我们的干部本来是人民的公仆，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有的人却把手中的权力拿来谋私利，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这就是权力的"异化"；商品本来是工人、农民自己劳动生产出来供人们支配和消费的产品，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却反过来成了统治和剥削工人、农民的工具，这就是劳动的"异化"；神仙菩萨本来是人类迷信思想的产物，但许多人却反过来又对自己塑造的神像顶礼膜拜，把它们当作人的命运的主宰，这就是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异化"……

我猜测周扬当时讲这番话的本意，无非是提醒人们要进一步冲破曾经笼罩在思想理论界的"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革故鼎新，对外开放，防微杜渐，警惕执政党走向反面。过去我们长期闭关锁国，实际上就是"作茧自缚"。这些主张本来与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磨炼之后的一种大彻大悟，是值得全党警省的肺腑之言，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从来就承认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但不曾想他的这些忠告不知犯了什么"天条"和禁忌，后来竟受到了那么严厉的批判和口诛笔伐。现在，周扬和匆忙为文批判他的主要负责人均已相继作古，尚不知哲学界将如何认识和评价这桩"哲学公案"。但事实胜于雄辩。国内近年有些地区不少执掌党政大权红极一时的人物，由于以权谋私而蜕化变质为贪污腐败分子，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在全党提倡反腐倡廉的今天，听听周扬当年的这些彻悟的忠告，不要作茧自缚，时刻警惕自己"异化"走向反面，应该说对每个党员、干部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与周扬没有什么个人交往，也没有深入研究过他所说的"异化"等深奥的哲学问题，但他晚年的治学精神和高尚人格，尤其是他的省悟、悔悟和彻悟，使人感到钦佩。不管人们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如何评价，在他逝世8周年之际，谨以这些片段的回忆，作为一个后学者对他的怀念。

（责任编辑　萧　徐）

从历次政治运动中走过来的大翻译家

——许渊冲

●龙梅

对于学习英语、研读外国文学的人来说，许渊冲教授许多人是知道的。这位把中国诗词译成英文、法文两种文字的翻译家，在他的晚年，以惊人的速度，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竟出版了近十部译著。

作为如此高龄的老人仍保持如此高产令人难以置信。正像中国译协副会长贺祥麟说的那样，许渊冲在中国翻译界创造了一个奇迹。

然而有谁能了解到，这位享誉中外的大翻译家，在他1950年留法回国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近三十年中，即他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岁月里，却因为种种干扰而不能从事他所热爱的翻译事业。每当谈及这一点，性情直爽、身体健康、说话声音如洪钟一般响亮的许渊冲教授激动得扼腕顿首，痛惜自己在那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几乎一无所成，他说，如果回国以后就能从事翻译工作，那么现在该会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就。

对已经过去多年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岁月，许渊冲教授回想起来仍耿耿于怀。

现年75岁高龄的许教授1921年4月出生在江西南昌一个书香门第。他走上翻译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受他一位远房表叔的影响。表叔叫熊适逸，是我国近代很有名的翻译家。当他留学英国时，将中国有名的剧目《王宝钏》译成了英文，并搬上舞台，演出获得成功，在英国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也因此受到英国大文豪肖伯纳的接见。后来表叔举家迁往英国。这件事对还不谙世事的许渊冲的影响很大，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便认为只有学好了英语长大了才有出息。他从江西南昌一所最好的中学考入了当时全国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大学毕业以后他在云南一所中学教书。这所中学（现为云南昆明的天祥中学）当时光是院士级的教师就有五个。我国工程物理学家朱亚光当时也在这所中学教授数学。

学校充满了自由民主的空气，学术气氛也非常的浓厚，教师和校长之间没有什么领导被领导之分，大家可以自由发表学术观点，对别人有意见也都是坦诚地当面提出来。这对许渊冲思想和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1948年，许渊冲因学习成绩优异，被国民党政府派到法国深造。埋头做学问而很少参与政治的许渊冲到了法国，还不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1949年发生的几件事使许渊冲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

一件事是1949年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大败，国民党中将黄维被俘的消息传到巴黎，对许渊冲的震动特别大。因为在许渊冲的心目中，黄维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早在他读中学时，该校校长与黄维曾是同班同学，那时还是国民党少将的黄维到许渊冲所在的班级讲过军事课，而且他与学生打成一片，授课期间他严格要求自己和学生，早晨起来和学生一起跑步。许渊冲对他的印象非常好。淮海战役国民党惨败，他心目中的英雄被俘，使得善于思考的许渊冲对共产党有了最初的认识。

第二件事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敢打当时还是殖民帝国英国的军舰，把英国的军舰驱除出中国的沿海。这件事在法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向落后的中国敢于向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挑战，这大大地长了所有中国人的志气，灭了外国列强的威风，留学生们个个拍手称快。许渊冲对共产党的军队肃然起敬。

第三件事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解放上海。许渊冲了解到解放军在解放上海时为了不打扰老百姓，露宿在街道上。这与国民党的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许渊冲的记忆里，国民党的军队开到哪里，哪里的

老百姓就要遭殃，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却这样纪律严明，说明共产党是一个最讲民主的政党。

那时在法国的留学生自发成立了"星期五学会"，每个星期五的下午，大家组织起来学习马列主义。许渊冲也参加了。大家的热情很高，边学习边探讨将来中国的出路，探讨救国的办法。当时在星期五学会学习的人很多都回国了，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周总理翻译的董宁川，他曾跟随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谈判。

许渊冲逐渐认识到，只有回到祖国，用自己所学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才是自己的真正出路。几经周折，他终于回到了祖国。与许渊冲同道回国的有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端木正，著名数学家吴文俊，著名画家吴冠中等等。

1949年摄于巴黎大学，左起：卢清（云南师院院长）、李廷揆（北外法语系主任）、端木正（最高法院副院长）、许渊冲（北大教授）、王乃梁（北大地理系主任，已故）、吴其昱（法国科研中心研究员）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回到北京的许渊冲被教育部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任教。如今满头白发的许教授回想起当年的激动心情仍然情绪昂扬，他终于可以用他所学服务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了。然而到了50年代，运动连着一个又一个，几乎所有的运动都和他过不去。

50年代初"三反"运动的后期，许渊冲的名字就列在了被改造的名单上。原因是个人英雄主义、名利思想严重，有自由主义、享乐思想。为此许渊冲不得不反复检讨，一次不行两次，直至检讨了七次才勉强过关。

紧接而来的1955年的肃反运动，又将他卷入，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原来，早在1941年许渊冲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即将毕业时，赶上国民党政府在学校征召美军翻译，许渊冲和其他几位英文比较好的同学被选到美国志愿空军陈纳德麾下，成了一名空军中尉翻译。

在即将入伍之际，他们都必须填写一份加入国民党的简历。这时的许渊冲犹豫了：早在他上大学之前，父亲就告诫他，要他老老实实地做人，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要参与政治，不要加入任何党派。于是，他向负责入伍的人提出：他只当翻译，不加入国民党。负责的人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就这样，许渊冲变成了只填过一张表，没交过一次党费的国民党党员。

这件事在肃反运动中自然而然地成了许渊冲一大罪状，说他是国民党特务。许渊冲想，这些他在回国时早已做了交代，怎么还要旧账新算？于是他与领导运动的同志发生了争吵，情急之中的许渊冲骂这些领导无知、不懂历史、不懂民主。为此他被软禁在家，停止工作，接受批判，写检讨，失去自由约有半年。幸运的是，组织在审查一年之后作出结论，说他只是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膨胀，不是敌我问题。这个结论对许渊冲关系很大，使他后来因祸得福。

1956年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许渊冲在1943年大学毕业时就已翻译的英国作家德莱顿的诗剧《一切为了爱情》在上海得以出版。1957年，许渊冲和外国语学院鲍文蔚合译秦兆阳的《农村散记》，也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且提出倡议，要他一年翻译一本书。不料好景不长，反右运动开始，秦兆阳、鲍文蔚都被打成右派，许渊冲与他们的合作也终止了。

1958年党提出总路线，许渊冲所在的外国语学院学生成绩不算太好，却要响应"多、快、好、省"的号召，提前超额完成学习任务。许渊冲根据自己学外语的经验，引用列宁的话说"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提出了战略上要"多快好省"，战术上却要"少而精"。为此，第二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又批他思想右倾，反对"多快好省"的总路线。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1960年林彪提出"少而精"的教学方法时，外语学院纷纷响应，并且向许渊冲赔礼道歉，说当年批他批错了。不料许渊冲并不买账，他对登门赔礼道歉的人说："少而精"只是方法，目的应该是"多而精"。当时国务院就有明确规定：外国语一级教授至少应该精通两种外国语。这不是"多而

精"吗？话里话外表明，他自己所提的"少而精"与林彪所提的并不一样。这样一来，"好事"便成了坏事，学院又说他名利思想极端严重，并且通知出版社，不同意出版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书。于是许渊冲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协议中断。60年代许渊冲只在商务印书馆出了他校订的《巴黎公社文选》和《布郎基文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灾难降临在中国人的头上，首当其冲的是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许渊冲当然在劫难逃。

他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挨批挨斗，挨打挨骂，戴帽挂牌，剃阴阳头，坐喷气机，焚书抄家，关进牛棚，下放劳动，人身人格受尽了屈辱。

而他的罪名呢？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原来他回国参加工作时曾签过一个《爱国公约》，公约的第一条就是：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他不明白：为什么把毛主席个人放在共产党之上？不明白他就问。这就成了他反对毛主席的一条罪状；他又提出，"共产主义"是日本人翻译的，原文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并没有"共产"的意思。这又成了他反对共产主义的一条罪状；他还问过：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不能在一国实现，列宁却实现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又提出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也是要发展吗？

善于思考而又心直口快的许渊冲提出的所有问题后来都成了造反派批判他的罪证。

造反派对他的批判无所不用其极：

肃反运动批他在美国空军当翻译；到了"文革"更进一步，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帮助美帝扔原子弹，屠杀日本人民。"反右"时他出版了罗曼·罗兰的小说，"文革"中却从小说中断章取义，如"朋友翻了脸，比仇人还狠"，造反派说这是影射中苏关系。又如小说中讽刺雇佣兵："谁晓得他们为了什么理由打仗？一会儿为了旧教，一会儿为了新教。"恰巧那时造反派分裂，互相武斗，便说这是讽刺他们。为此他大受皮肉之苦，并且"漏网右派"的帽子又被补戴上了。

许渊冲留学法国期间，曾坐美军飞机三飞北平，又同留法学生组团去过罗马，见过教皇，因为留学生中只有他一个人懂得意大利语，他便代表中国留学生在教皇的面前讲了几句话。"文革"时期这也成了一条罪证，说他是潜藏在大陆的国民党最危险的特务。

饱受运动之苦的许渊冲再也不敢随便发表自己的见解了，他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行为符合时尚。当时《毛主席诗词》风行一时，几乎人手一册，人人会背几句，英法文译本也已出版。但都是把有韵有调的诗词译成无韵无调的分行散文了。许渊冲认为这不符合毛主席说的"诗要押韵"的原则。于是他在劳动和被批斗之余，偷偷地把毛主席的诗词翻译成英法韵文。

有一天在烈日下陪斗，又热又累，许多人支持不住都昏倒了。而他却没有倒下，原来他正在默默地背诵着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惟余莽莽"，"顿失滔滔"，并在心里悄悄把这些词语译成英文。

说来也怪，一翻译诗，他就把热、累、批斗都忘到九霄云外了，眼里看到的仿佛只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心中想到的只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等他把全词译完，批斗会也结束了。于是他心中暗喜，自以为找到一个消磨批斗时间的绝妙方法。不料乐极生悲，造反派知道了他在译毛主席的诗词，不但不许他"将功折罪"，反说他是在歪曲毛泽东思想，是在逃避阶级斗争，狠狠地抽了他一百鞭子，打得他皮青肉肿，坐立不得，而且还不让看医生，强制照常劳动，什么累让他干什么。

经受多次运动的许渊冲在1959年他38岁时才与现在的夫人照君结婚。

每当许渊冲挨打屁股坐不了硬板凳时，他的夫人就把游泳用的救

作者与许渊冲教授

生圈吹足了气，让他当座垫用。

就是这样，许渊冲把全部毛主席诗词，包括当时传抄的作品，都译成了英、法韵文。可以说在“文革”最后的几年，他对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已经达到千锤百炼的程度了。这为他以后唐诗、宋词、楚辞等古典的和现代的诗词的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6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钱钟书教授审定的《毛泽东诗词》。钱先生是许渊冲大学时代的英文老师，许渊冲就把他的译稿寄给钱钟书。钱钟书回信说：“译稿成就很大，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跳得灵活自如，令人惊奇。”这封信给了许渊冲很大的鼓舞，坚定了他以诗译诗的信心。后来他陆续把《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西厢记》等译成了英文或法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年近花甲的许渊冲终于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光明的日子。他终于拥有了可以光明正大搞翻译的权利。

此起彼伏的“运动”使得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法或不敢搞专业。而许渊冲虽然也不能放心大胆地搞他所热爱的翻译事业，但他却在过去30年里一直在悄悄地用心揣摩翻译这门艺术。没想到到了老年，他过去琢磨的东西都派上了用场。

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和执著追求，他的翻译技巧已步入炉火纯青的境地，例如毛主席的诗词“不爱红装爱武装”，全句七字就有两个“爱”，有两个“装”。如何传达原诗这种意美、音美和形美呢？许渊冲的英译用了两个Face，两个Powder，译成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意思是说：不爱在脸上涂脂抹粉，而爱面对硝烟弥漫的战场。这个译文得到国内外的好评。

长期的翻译实践使他体会到：译文一定要先是译者知之、好之、乐之，然后才能使读者分享其乐。这也使得他对叔本华的话有了更深的理解：“美是最高的善；创造美是最高级的乐趣。”如果能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成为全世界的美，那不是最高级的善吗？不是最高级的乐趣吗？

就是在这个信念之下，许渊冲教授千方百计把1958年到1978年之间由一次次运动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曾受了近许多年压抑的他，如今终于硕果累累。

到目前为止，许渊冲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把中国诗词翻译成英文、法文这两种文字的翻译家。尽管过去抑或现在有人做过或正在做许渊冲所做的把诗词翻译成外文，但那只是把诗词翻译成英文或法文这两种文字中的一种，且大多数都是不押韵的分行散文。许渊冲教授的翻译水准得到其所翻译国家的专家们的认可。许渊冲独特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水平使他的译著《中国古诗词三百首》被英国企鹅丛书出版社破例接受出版，而在此之前该出版社从不接受中国人的译作。

谈到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同班同学，许教授不无自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等都是他当年的同窗，他们各自都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好胜的许教授当然也不甘为人后。

现在许教授以饱满的热情翻译着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许渊冲教授感慨地说，每当翻译到小说中的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被压制排挤不能搞音乐创作而痛苦不堪的情节时，他都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禁不住老泪纵横，想起当年所经历的一切，仿佛自己就是小说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似乎罗曼·罗兰在用异国的笔叙说着那不堪回首的运动年代里许渊冲的遭遇！

（责任编辑　洛　松）

六州歌头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

● 刘宝安

会宁菊月，金蕊簇旌旗。肝胆洞，心曲共，聚精英，陕甘宁。万水千山重。破危境，乌江冷，遵义幸，龙媒磬①，动娥女亘。赤水金沙，调虎离山迥，气贯长虹。飞越泸定索，力挽渡河舟令，斩棘披荆，铁铮铮。

笑夹金顶，话泥泞，开秦镜②，玉钩清③。天险纵，岷山仲，六盘通，鼓笳鸣。一诺千斤重，举九鼎，用神兵。天罡映，豪气迸，传新声，一体同心，六十周星庆④，虎跃龙腾。叹九州秋水⑤，跨世舞东风，雷闪闪闪。

①龙媒磬：龙媒，是良马；磬，是驾驭的意思，语见《诗经》。

②秦镜：指秦王（始皇）之镜。这面镜能照见人心的善恶，用它能使人明察、精干。语见《西京杂记》。这里是借指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及时识破并粉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

③玉钩：是新月的别称。

④周星：星，是年的意思；周星，即周年。如：文天祥诗，“四周星”即是一例。

⑤秋水：是宝剑的别称。

慕生忠：筑在世界屋脊上的丰碑

● 邹 蓝

李白入川时曾感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在中国真正难走的道是蕃道，即入藏之路。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从长安经青海入藏，走了半年多。就是到本世纪中期的1955年，班禅大师还感叹道：过去，从西藏到青海或西康，骑牲口也得费时两个月。一般说来，进藏要半年，出藏也要半年。1952年，西藏工委几位负责人奉召进京开会，干脆避开了老路，而绕道印度加尔各答上船到上海再转乘火车到京。

但是，在1994年9月初，我从西宁出发，坐长途客车经格尔木抵拉萨，仅费46小时，两天就走完了过去至少需要两个月才能走完的路。因为在西宁、格尔木、拉萨一线，1954年12月末就开通了公路。这条公路几经改造，已经成为柏油路面的坦途，把西藏与祖国内地紧密地联起来。它是一条主动脉，内地进藏物资的85%经这条路运入西藏。

饮水当思源。每当我想起在青藏高原上的那几次旅行，我眼前总能浮现起一位质朴而宽厚的老人——慕生忠将军的形象。正是他，在彭德怀元帅支持下，在1954年5月11日至12日15日，耗时七个月又四天，修通了青藏公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的1283公里路面。

不要忘记，这段路并不在平原地带，甚至不在一般意义上的山地，而是在素有"生命禁区"之称的青南高原和羌塘草原，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每年冰冻日近300天，年平均气温零下5度，最低气温达零下40度而空气含氧量不到海平面的一半。

这条公路穿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以及长江和怒江上游的十条河流。我舒服地坐在大客车上通过唐古拉山口时，尚且头晕脑胀，呕吐不止，更不用说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用原始方法筑路了。

而慕生忠和他麾下的筑路大军却把路筑成了，用216天时间，250万元，一个工兵团，外加1200名驼工和6名陕北石匠（慕将军是陕北吴堡人，这大概是他优先使用乡党的原因吧）。

对比一下吧，康藏公路由11万筑路官兵民工苦战五年，才在1954年末修到拉萨（比青藏公路晚10天）其惊人的费用，仅从此事可见一斑：拉萨至大昭近200公里路，为全程的十分之一，仅支付给藏族民工的工资和物资款，就达到553.6万余大洋。这条线还常因泥石流塌方而不时中断交通。

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回顾这两条藏道的修建并核算其成本，我要给慕将军和彭元帅各加一个头衔：中国最佳投资项目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慕将军早年参加革命，只读过私塾和小学，并不是公路技术专家，但是他善于用人，善于并敢于决策。

青藏公路一期工程的技术负责人，慕将军的唯一顾问邓郁清工程师对慕生忠有如下评价：

慕生忠不懂修路，但善于集中大家正确的意见，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关键。

比如青藏公路北线格尔木至敦煌公路的修建，他详细了解了别人的三次实地行走踏勘过程，并与邓一起骑马勘察了一次，集四次调查的直接和间接经验，汇总大家的意见，作出了决策，并为这项工程物色配备了主要人选。

再如有关设计施工技术标准，他也是拉邓工一起组织大家开会研究形成一套方案。随后规定了施工单位的施工授权权限，充分发挥基层的积极性。筑路工程一线展开，相

隔有数百公里，联络不便。慕将军总结了施工的四个指标：平、硬、直、快。各工程队根据测量队立的标志，自行决定具体施工路线，能同时满足四个指标的最好。满足三项指标的不用再请示，只能满足二项指标的需请示后再施工；只能满足一项指标的则不能施工。在西藏部队缺粮，唐古拉山又即将入冬而大雪封山。在这种时间紧、任务重、联络困难的情形下，这项措施使效率提高了不少。

在出现重大问题时，慕生忠总会赶到现场，决定了处理方案后身先士卒地干。挥重磅大锤，站在冰河中填石铺路。他对知识分子既关怀体贴，又尊敬重用。

邓工回忆到慕生忠只有他一个当工程顾问时，转述慕将军在总结一期工程时的话："工程师多了，人多嘴杂，意见难于集中，决心就不好下；筑路若不是一千多人，而是人很多，后勤供应无法解决；钱多了，要花出去就容易铺张，修路时间也就拖得很长。总之，在那种紧急情况下，如果不是三少而是三多，事情就会难办得多，甚至招致失败。"

以一个严格的管理者形象出现的慕将军，同时也有着幽默感和理想主义的情绪及浓重的人情味。

以柴达木新城格尔木来说，若没有这条路，也不可能有这座世界最独特的城市：辖区十万平方公里，是为世界之最，比得上江苏省的面积；居民三分天下：青海和全国各地来的建设者，总后青藏兵站的各类工作人员又占三分之一，西藏各机关驻格尔木转运站及其工作人员。因往来的兵多、车多而别称"兵城"，"汽车城"。而在1954年春天以前，格尔木（当时称为噶尔穆）只不过是地图上一个名称而已，并无居民点存在于昆仑山北麓的这片荒滩上。1954年春天，慕生忠为修路带领人马来到格尔木河畔的这片荒原上。忆及这段历史，慕将军回忆说："当时，格尔木空旷的原野上没有一顶帐篷，一棵树。有的只是枯草和大漠戈壁。向南望去，昆仑山巅白雪皑皑；向北看，沙丘一座连一座，恰似一片破败的墓葬群。有同志问我，格尔木到底在哪里。我回答说，格尔木就在你我脚下。我们的帐篷扎在哪儿，哪儿就是格尔木。于是，六顶帐篷，就成了格尔木市的开端。

"望柳庄"的故事，也反映出了慕生忠和他的部属们扎根荒原报效国家的意志和乐观情绪。定在格尔木后，筑路员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西宁运来几车柳树枝，在格尔木河两岸到处栽插。1992年我初至格尔木，曾在浓荫蔽日的格尔木河东岸听到西北各地来的民工，在林荫间唱"花儿"。慕将军回忆说："我们在青藏公路工程管理局招待所的'房'前'屋'后遍插柳枝，并给它起名'望柳庄'。有人不解，我回答说，眼下只是希望，将来就是一大胜景。"后来，筑路工人开赴高原后，果树和蔬菜也在望柳庄里出现了。班禅大师和陈毅元帅进出西藏路经格尔木，都品尝过格尔木的蔬菜。更重要的是，这些新鲜蔬菜对奋战高原而患坏血病的病人有奇效。慕将军舍不得吃种菜人送他的第一批胡萝卜，转送给了七十多缺维生素而患坏血病的病人。结果，患者的坏血病居然日渐好起来，人们才发现胡萝卜还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陶儿久山下有一片旷野，名为韩滩，这是慕生忠为修路工程中病累而早逝的宁夏穆斯林驼工小韩而命名的地方。将军率领数百名员工为小韩举行了葬礼，让青藏高原纯净的冻土接纳了一条忠魂。慕将军恸然泪下："好兄弟，你走得太早！最苦难的日子都过来了，拉萨就在眼前了。我本想到拉萨给你亲手戴上大红花，可连这一天你也没等到……这地方就叫韩滩吧。"

慕生忠性格豪放激烈和幽默乐观，更由此可见一斑：陈毅元帅由慕将军陪同入藏，在楚玛尔河沿时，听慕生忠吟诵了他的一首行军诗：

楚玛尔河鲜似血，
楚玛尔河泽无边，
楚玛尔河下游通天。
金沙扬子更向前，
万里长江最高原。
浩荡的楚玛尔河，
她流源于世界屋脊；
浩荡的楚玛尔河，
她流源于世界屋脊。

楚玛尔河在藏语中意为红水，慕将军故有此语。这类记述感怀的小诗，他共写了30多首，有一首《夜宿陶儿久》，更能反映出筑路的艰难：

头枕昆仑肩，脚踏怒江头，
零下三十度，夜宿陶儿久。
上盖冰雪被，下铺冻土层，
熊罴是邻居，仰面看星斗。

青藏公路沿线许多地名，都是慕生忠起的：乌丽，因为在缺煤之处无意中发现煤矿而得名，那美丽的乌黑色对筑路大军实在有吸引力。开心岭则因为筑路队伍遭遇重大困难后顺利解决而得名。

慕将军因彭元帅而得以坚持修成了青藏公路，也因为彭元帅而"消失"20年。1959年庐山会议后，一架飞机把慕生忠载到拉萨，随后又被押解到兰州。"彭德怀的黑干将"从此受到残酷无情的批判斗争，要作没完没了的检讨交代。忆起这段历史，慕将军的话是轻描淡写的："被迫离开青管局后的20年中，我除了一度被贬到'八一'农场任第五副场长和两度被贬到甘肃交通厅当副厅长外，其余大部分时间是住"牛棚"和蜗居家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此期间，我曾打算不计较地位而做点事情，但都因客观方面的原因而一事无成。十年动乱时期，我不敢'乱说乱动'。每天只做两件事，一是面对墙壁凝神注视一张大地图，在这张图上青藏公路被我用红笔勾画

的很粗很粗。我每天看着它，一面在我的卧室兼客厅的十几平米房间里踱步，聊以自慰；二是每天五点起床，爬兰州黄河北岸的白塔山，然后再回家洗漱，开始一天的蜗居生活。

"我慕生忠算个啥？没有那些一个心眼替国家出力气的人民，我一百个慕生忠也啃不出一条路啊……拉过骆驼修过路的那些工人，老实巴交。可他们个个是国家的功臣，就知道闷头拼命出力，流血流汗。革命事业成功了，他们又不声不响地走开了，谁也不注意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我们欠人民的债不少啊。我心里老是有愧，可我啥时候也忘不了那些又拉骆驼又开路的驼工同志，总想着能见到他们。那些年，我盼他们来，可又不愿意让他们来，是怕连累他们。可他们还是偷偷摸摸地来了！给我驼绒，给我羊皮棉袄，怕我冻着；还拿来酥油、羊肉让我补养身子骨，怕我垮喽。他们说：'将军，连我们的孩子都惦记着你！'我真想抱住他们哭一场！现在倒好，我慕老头又站出来了，又做官了。我更盼他们来，可谁也不来了……请你们回青海给我捎个话，就说，我慕生忠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我的家门白天黑夜都大开着，请他们来吧。别的没有，至少几杯水酒我还管得起。喝完了酒，一起逛逛这兰州城，爬爬五泉山，溜溜滨河路，看看新塑成的'黄河母亲'。他们最有权力享受这一切啊……"

20年漫长的岁月中，许多政治风暴多次席卷中国大地，而将军留在格尔木的一切，留在青藏公路沿线的地名以及传奇，都留了下来。公道自在人心，格尔木的"将军柳"、"将军楼"、"望柳庄"、"十八间窑洞"在十年浩劫中也没有受损。

西藏人民也没有忘记他。1971年，仍戴着"彭德怀黑干将"帽子的慕生忠患病住院，西藏当时的党委副书记热地闻讯后专程到兰州探望这位对西藏的建设有功的老人。

将军终于挺过了大劫难，1979年彭总恢复名誉，慕生忠也被解放，担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然而将军也已经是69岁了，他的英年有20年岁月被荒废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一复出，即向政府提出给一个月的假，去青藏公路看看。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在青藏高原上的荒漠冰川冻土间度过，又有20年不能重返这片土地。老人有殷切的需求，重返这片令他心往神驰的土地。

1951年慕生忠任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政委时在拉萨接受藏胞敬献的哈达

老人是有幸的，他传给后人的青藏公路，在1985年8月，经历了为时12年的全面改建后全线竣工，铺在唐古拉山的路段，也因为铺了优质黑色路面，汽车可以高速通过。而我也得以只用46小时就完成西宁至拉萨的2000公里旅程。在慕将军的路刚修成时，进藏时间也需要十天左右，比起以往的三个月至五个月，已经缩短了许多。将军见到他留下的事业在后人手中发扬光大，应是最感欣慰的事；这是赠给他的最好礼物。

1992年我从西宁出发经格尔木至敦煌，还走了格尔木至昆仑山口一段。1994年我又经格尔木走向拉萨，以亲身经历来体会到了慕老将军和筑路大军的艰辛，然后以《一条路与一个人》这篇文章作为奉献给慕将军的一份敬意。没想到，1994年9月写成的文章，到11月10日发表时，慕将军已在三周前的10月19日去世。兰州大学的地理学家伍光和教授告知我此事时，我愕然：在他在世时所写的文章，到发表时只能成为一束献在他灵前的黄花。

在中西部发展日益受到重视，扶贫呼声日高的时代背景下，回顾慕将军和他统帅的筑路大军修筑的青藏、敦格及黑昌（黑河、即纳曲、至昌都）诸公路的历史功绩，就更有现实意义。正是这些公路形成的路网，把西藏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起来，同时又形成了川、青、甘、新数省区交界处的通道，促进了柴达木盆地作为我国资源宝库的开发，更促进了西藏的发展，还促进了青海、西藏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线探险、观光事业的发展。

慕将军和他的筑路大军，功莫大焉！

（责任编辑　萧　徐）

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涂羽卿博士

● 李宜华

三年前的金秋季节，丹桂飘香，世界各地圣约翰大学校友联谊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上海的原校址内举行。这次大会有一千七百多名历届校友参加，其中最年长者95岁，最年轻的59岁。校园内人声鼎沸，怀施堂（现改名为韬奋堂）响起铿锵的钟声，欢迎学子的归来。一座被砸坏又经修复的纪念牌坊在原地重展风姿。牌坊上的原圣约翰大学校训“光和真理”四个大字跃然入目。几代校友相聚一堂，重温旧梦。他们激动、兴奋、怀念、感叹，噙着晶莹的泪花唱着校歌“为故土服务是我们的天职……”。同学们在聚首中，共同回忆起担任过圣约翰大学校长的涂羽卿博士，并对这位有正义感、有民主思想、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而又屡经坎坷的老校长表示深深的怀念。

爱国激情

涂羽卿1895年9月29日生于湖北汉阳，祖籍湖北黄冈。父亲是个牧师，自幼家境清寒。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从上学起，年年名列前茅。1912年他从武昌博文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担任英语教员。由于不满足已有的学业，他辞去教师职务投考北京清华学校。1913年他被录取入清华学校。一年后，1914年夏，他从清华毕业赴美留学。和他同船的有以后成为中国杰出教育家的陶行知、陈鹤琴等人。这批爱国学生受辛亥革命的感召，肩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为追求振兴中华之道，离别父老乡亲，负芨渡洋，立志深造，学成报国。留美期间，他先后在美国康奈狄克州的卫司理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就读，191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此后的一年，他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同时在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当实习设计员。1919年，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口号“科学与民主”像磁铁般地吸引着他。他归心似箭。可是，就在回国以前半年，一个异国女子突然闯进了他的生活。

1919年4月初的一个清晨，涂羽卿在纽约地铁和一个美国姑娘邂逅。他们的巧遇可以说是一种奇缘。那天，他俩在同乘一辆地铁时突然紧急刹车，他被这位小姐踩了一脚。这位小姐向他道歉后又问他是否日本人？这一问引起他十分不快。巧就巧在他俩又在同一站下车。这位生性好奇的小姐问，把他错认为日本人，为什么

惹得他那么生气？她哪里知道这正是"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对日本国有强烈的反感。涂羽卿正想发泄对二十一条的愤慨，于是就在站台上慷慨陈词，对她讲了大战后日本觊觎德国在中国的权利，袁世凯卖国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等等。他的爱国激情给这位年方二十的美国姑娘留下了不寻常的印象。他们就此相识了。她，对中国有神秘感。他给她讲中国的风土人情、中国的历史、封建王朝腐败落后、百姓愚昧无知，以至于国家受列强欺凌，并向她倾诉了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学成回国把知识奉献给祖国。他的赤诚的爱国之心，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深深打动了她的心。她向他倾吐了爱慕之心，愿随他到天涯海角。他，为她打破种族偏见表达的纯真的爱情而动心。那时候，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并非优等民族。他们在纽约找到一所愿为一个白种人和一个有色人种结合证婚的教堂，两人于1919年6月7日在这所小教堂里宣誓结婚。从此，风雨同舟，甘苦共尝，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虽屡经政治上的惊涛骇浪，始终两相厮守，忠贞不渝。

婚后一个多月，涂羽卿暂别新婚妻子，按国内安排的时间先行回国报到。

献身教育

回国后，涂羽卿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任教。他和陈鹤琴、陆志韦（前燕京大学校长）三人同在南京任教。他们志同道合，主张国家建设应以教育为本。中国需要科学与民主，但教育必须先行，没有教育，人们就不会懂得科学与民主。1927年，第一次国内战争爆发，南京城里兵荒马乱，涂羽卿带着夫人和一岁多的大女儿，丢下家中的一切财物到了上海，在上海沪江大学执教，任物理系教授和系主任。1930—1932年期间，他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再度到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美国著名原子物理学家阿瑟·康普顿（后曾参与制造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指导下攻读原子物理。1932年6月，获物理学博士后返回上海，继续在沪江大学执教。1937年，日寇的炮火毁灭了他们安静的校园生活。"八·一三"前夜，他们夫妇俩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提着两只网篮，逃入上海的租界。十年内，他们的家第二次毁于一旦。上海沦陷后，几所教会大学因校园遭受破坏或被强占，联合起来租借慈淑大楼作为课堂，教学条件十分艰苦。

无论在沦陷区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或是吃粉笔灰的清苦的生活条件下，涂羽卿始终忠守教育岗位，默默耕耘于教育岗位。他严谨治学、重视理论强调实践的教学作风；生动形象、深入浅出的教学艺术；诲人不倦、敬业

1946—1948年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涂羽卿

乐道的教学精神，即使在半个世纪后，学生们仍然印象深刻，深感终生受益。为教学和科研需要，他亲自制作许多实验设备，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自己动手作实验，不依赖老师解答问题。课后，他想方设法带学生到校外参观，获得感性知识。学生考试不及格，他首先考虑自己的教学是否有问题，然后找学生谈话，发现他们的问题，并在业余时间为他们补课。他认为，为师之道不仅在于传授知识，而且在于教育青年为人之道："以光明磊落为帜，追求真理为标；倡导科学精神，探索科学价值；贡献于社会，造福于人类和平"。他对学生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关怀倍至，和学生的关系水乳交融。学生们称他为良师益友。他的许多学生日后在中国的教育界和科技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沪江大学的学生、前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个。

1946年至1948年，涂羽卿被任命为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这所学校于1879年由基督教圣公会创办，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到1946年，它在中国生存了半个多世纪。但在1946年以前，它是上海唯一没有在中国的教育部门注册过的一所教会学校，校长职务一直由美国人把持。圣公会是基督教会中比较保守的教派，它所办的学

校校规严，对学生控制紧，不允许在校内组织学生团体、在校外参加政治活动。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市罢工、罢课、罢市。圣约翰大学学生参加"三罢"，遭到美国校长卜舫济蛮横无理的干涉。6月3日，卜舫济校长竟然扯下中国国旗，校内中国师生愤慨无比，当即有二百多名师生员工离开学校，以后在上海社会各界名流的支持下成立了光华大学。这就是该校著名的"六三事件"。

二次大战结束，上海租界取消，外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被废除。教会学校由外国人当校长的情况也要改变。美国校长卜舫济宣告退休。当局决定任命涂羽卿为校长。涂羽卿充分意识到这个重担难挑。圣公会一向排外，他既非圣公会会员，又非该校校友，事情难办。但是，圣公会居然能接受他为该校校长，说明它跨前了一大步。为取得中国人在这所教会学校的领导地位，他决心迎接挑战。1946年11月，他宣誓就职，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参加了他的就职典礼。

当时，上海的一家英文报对任命涂羽卿为校长作了客观评论和正确的预测。该报认为，涂校长面前并非玫瑰花坛，他将面临重重困难，凡是缺乏胆量的人，面对这些困难，必定三思而行，甚至拒绝接受这一要职。但在圣约翰大学悠久的历史中，涂博士是第一任中国校长（日本占领上海期间，因罗伯兹主教被迫离开上海，他任命沈嗣良为校长，未经董事会通过，因此国外认为涂羽卿为第一任中国校长）。当时有计划把华东几所教会学校合并成华东联合大学，涂羽卿很支持这个计划，他又是国内基督教界名列前沿的教育家。在现实的情况下，舍其莫属。

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涂羽卿怀着奉献于教育的满腔热诚，拿起了这只"烫手的山芋"。

涂校长一家搬进了约园内的九号楼——校长的宿舍楼。这所楼房周围景色优美，面对一棵上海滩独一无二的大樟树，树下一片芳草绿茵。草地西边是供洋教授打高尔夫球的球场。课后，教师和学生在这里漫步休闲、沉思遐想。涂羽卿迁入约园后却没有闲情逸致欣赏校园风光。他的面前的确不是玫瑰花坛，不是安定的绿洲，而是一条极不平坦的道路。

上任后，他不愿脱离教学，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外，还教一年级和四年级的物理课。1947年，他完成学校向政府注册的任务并按政府规定调整了学校的课程。在校内尽可能设法改善教职员的待遇和居住条件。在建立学校内部的一些规章制度时，他想进行一些改革，但阻力很大，动辄触犯圣约翰的传统。他明确表示，时代变了，某些传统应该唾弃。在他任内的另一项任务是着手进行以圣约翰为中心和苏州东吴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合并成立华东联合大学的计划。他认为这三所各属不同教派的

1919年涂羽卿留美，时年23岁

教会大学如能联合则有助于消除它们之间的传统成见。但是事情并非像他所想象，这三所大学各有悠久历史并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三合为一，谈何容易？联合大学计划始终只是一张蓝图。

1946年至1948年，正是内战风云、通货膨胀、政府腐败引发学生运动四起的时代。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多属富家子弟，向以不问政治出名。可是没想到这股强劲的学运风暴居然冲破了这所学校一向紧闭的大门。学生要求组织学生会，而这是教会最忌讳的事。涂校长感到以往把学生关在院墙内，让他们一心念书，不问墙外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他顺应潮流，欣然同意学生组织学生会，希望他们以民主的方式进行选举。校园内顿时火热朝天。各系提出的候选人在校内发表演说。选举结果，中共地下党员汤兴伯击败了三青团员候选人。圣约翰大学有史以来破天荒第一次成立了学生会。学生会主席和代表经常找校长提要求，校长定期和学生代表在交谊厅会谈，或是在他寓所促膝谈心。学生们没有想到这位校长是那么平易近人，一点不摆架子。过去美国校长住在这里，很少有人走近这幢楼房，如今在涂校长家里学生成了座上客。这个时期，涂校长日夜思量的问题是：应该如何对待学生问题。他崇尚民主，提倡言论自由。他主张让学生们畅所欲言，了解学生们的心态和思想状况，通过

友好的接触、真诚的劝导和科学的说理加以引导；而采取高压、禁止手段和脱离学生的态度是一种危险的政策。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和原则。

学潮势不可挡。1947年5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在校内集会，准备游行。市长吴国桢派警察包围学校。学生要求社会各界支持。宗教界吴耀宗先生约同涂羽卿校长以及男女青年会领导人一起到交通大学，并签名作证，促使吴国桢被迫保证释放学生。1948年1月29日，上海又发生了"同济大学事件"。该校学生因不满学校当局操纵选举学生自治会和开除若干学生，进行了十天罢课，要求恢复这几个学生学籍。由于要求得不到满足，学生准备向南京政府请愿。上海警备司令部出动军警、骑警包围学校镇压学生。市长吴国桢赶到现场。镇压学生造成的流血事件传到全市，圣约翰大学学生闻风而动，打着校旗从沪西到北郊同济大学去声援。这所贵族学校的学生参加学运标志着上海的学运达到高潮。

1月30日，正是数九寒天。凌晨三点左右，涂羽卿校长被市长办公室的电话叫醒，通知他立即到同济大学。当他到达同济大学时，操场上黑压压一片的学生已被围困了七八个小时。涂校长先把在场的圣约翰学生保释出来，以后又亲自到警察局和提篮桥监狱把被捕的学生保出来。教会对涂校长上任后打破了学校的一些清规戒律已经不满，"同济大学事件"后，对他更加不满。教会公开表示，学生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胆大妄为，是校长纵容的结果。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罗勃兹给纽约教区打报告，说涂校长对闹事的学生采取纪律措施不得力，并认为有必要另找校长。这时候，国民党政府一次又一次提出黑名单，要涂羽卿开除学生，他受到内外夹攻。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恐吓信和匿名信不断在他办公桌上出现。他和教会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他不妥协、不低头、不屈服，于1948年6月提出辞呈。

涂校长辞职，学生们感到惋惜。他只当了一年多的校长，但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学识渊博、治校有方、为人正直、言行一致。当年参加过学运的学生如今都已年近古稀，他们每当回忆这段历史，忘不了提到在这场风暴中和涂校长之间结下的深厚感情，异口同声地说："老校长是个好人啊，作风民主，思想开明，是知识分子的榜样。"

严峻考验

涂羽卿除从事教育工作外，一生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为他的主要社会活动。他和青年会渊源很深。早在20年代起他就担任青年会的董事。青年会是从西方移植到中国的一个宗教团体，从1896年在中国创建以来，曾在中国各地举办过各种类型的教育课程，如：扫盲、科普、卫生、公民教育、职业训练、文体活动等，使一些没有机会受教育的青年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涂羽卿热心于青年会工作和他重视国民教育是一脉相承的。抗日时期，青年会做了大量的募捐和救亡工作，并通过一些外国朋友把医药送到大后方和游击区。上海沦陷后，青年会总部搬到重庆，涂羽卿在上海担负起青年会的留守工作。可以说，青年会是他业余耕耘的一块园地。

涂羽卿辞职后，世界基督教青年总会立即聘他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并邀请他到北美访问考察。1948年9月中旬，他先到加拿大，然后到美国访问。这时中国的局势正经历急剧的变化。1949年1月，他乘船回国，路经香港时天津已解放，北平即将解放。他在香港巧遇吴耀宗先生。也许是吴先生考虑周到，劝他不必回上海，可以把夫人和孩子接出来。他打长途电话征求夫人意见，夫人明确地回答："你属于中国，你应该回来。"她还表示，她不怕共产党。涂羽卿当即返回上海，接过青年会全国总干事的职务，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全国解放，涂羽卿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章。他深切感到新的思想、新的哲学与信仰、新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和他迎面冲击。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的领导人，他最初的顾虑是：共产党执政后宗教将面临什么样的考验？青年会的命运又将如何？据他所知，青年会副总干事江文汉先生曾在1939年参加基督教代表团从重庆到西安，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延安访问。江先生在他《延安朝圣记》一文中曾赞扬延安精神。毛泽东主席接见代表团时一再肯定地对代表团说：中国共产党是保护宗教自由的。抗日胜利后，圣公会主教曾收到过周恩来、董必武二位驻重庆代表团领导人署名的信，表示欢迎派牧师、医生、教育家到解放区参观或建设教堂、医院以及其他慈善机构。特别在全国尚未完全解放之前，中共中央邀请了吴耀宗先生到北京共商国是，起草共同纲领。这些情况使他解除了不少顾虑。

尽管顾虑解除了，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很深，经费来源依靠外国。这些客观原因使解放后的青年会工作很困难，涂羽卿感到压力很大。1950年5月，涂羽卿和其他基督教界人士受到周恩来总理三次共13个小时的接见，最后一次从晚上11点谈到凌晨4点。周总理表示，新中国保证宗教自由，但是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听了总理的讲话，在座的中国基督教界人士感到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内容能够而且也必须和新民主主义相结合。涂羽卿对青年会的前途也感到乐观，因为青年会致力于社会服务，一直很受群众欢迎。周总理还提到他在天津读书期间曾是青年会会员，参加过很多青年会的活动，当时还有很多青年会会

员参加了“五四”运动。的确，青年会培养的一些青年中，后来有的成了中共党员，解放后有的甚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色的国际活动专家。

涂羽卿作为一个科学家，一切从事实出发，对人对己，是则是，非则非。解放初期国家的新面貌给了他信心；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国基督教界内部肃清美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他的震动很大。他检讨、批判自己的政治立场，交代历史问题，决心改造思想，跟上形势，尽自己绵薄之力为新中国服务。1950年，沪江大学出现校长危机。校董事会提名被日寇杀害的刘湛恩校长的遗孀刘王立明女士、涂羽卿和圣约翰大学教授陈仁炳教授三人为校长候选人，提交华东教育部门审批。华东教育部门同意由涂羽卿任校长。涂羽卿虽然一生以教育事业为重，但他有自知之明，怕自己思想未改造好，不能担此重任，谢绝了这项任命，留在青年会的岗位上。

但是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却成了青年会的“大老虎”，斗他的大会小会指控他和帝国主义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发难的是他30年代的同学、虔诚的基督教徒、青年会留学回来的得力干事。他思想不通，心中痛楚无言以表。他本是一介书生，哪能识破这些人是披着宗教外衣的豺狼？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人格上受到污辱，痛不欲生。“士可杀，不可辱”，他企图从六楼跳下去了此一生，千钧一发之际被他夫人看见，把他拉住。这一沉重打击使他情绪消沉。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接见了他，给他做思想工作。经受了这次严峻的考验，他重整旗鼓，决心以最大的努力跟上新时代对他们这批旧知识分子的要求。1956年以后经他和夫人动员，他们的大女儿涂莲英大夫和夫婿吴肇光大夫带着四个孩子，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服务。他们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涂莲英为研究攻破癌症，废寝忘食，最后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入土未安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涂羽卿和千千万万个赤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逃不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1966年他已年过七旬，两鬓皆霜，但教学的热情丝毫未减。无论寒暑，他按时走出家门，每天要挤上两班公共汽车才能到达上海师范学院去上课。回家后，伏案备课，并为青年教师翻译大量的外国文献作为参考资料，愿在有生之年为培养下一代，做到丝尽蚕死。但事与愿违，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会和青年会中的某些人揭发他是暗藏在中国基督教界内的美国特务的大字报，把他从讲台上扒拉下来，从此剥夺了他在耄耋之年为国家奉献一分力量的权利。

历经隔离审查、打骂污辱、无穷尽的交代和批斗，他又一次企图以自杀抗拒。他被抢救过来后，健康状况急转而下。在基督教界的学习班上，50年代斗他的那批老人马要老账新算，交代和美帝国主义的特务关系，特别是他和司徒雷登的关系。他身带重病，声音微弱，但态度坚决明确：解放前他和司徒雷登只是相识，没有深切的关系，也根本没有所谓另组政党的情况，问题早已交代，做过结论，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不承认，不多说，更不胡编乱造瞎咬人。他被送进监狱后，精神失常，他承认了被诬陷的罪名，但又苦于编造不出具体内容，每次交代只有“最高指示”四个字的一张纸。

1972年，国际形势变化，中美关系解冻。11月涂羽卿被释放。他回到家里和妻子儿女团聚，享受唯一能得到的一份温馨，因为他的心还在牢牢地被禁锢着。他的问题没解决，还是一个“挂着的”人物。他被损坏和被污辱的身心全线崩溃，身患多种疾病。精神上的摧毁使他万念俱灰，一生追求的理想完全破灭，没有再生的愿望。几次病危，他恳求医生不必抢救，一再哀求：“让我走吧，让我走吧。”他一辈子耕耘于教育园地，半辈子风风雨雨，生平名利淡泊，在死神来临之时，只求一纸公正。可是他没有等到那一天。1975年9月11日，终于饱含着痛苦和绝望离开了人间。虽入土，魂未安。

他去世后四年多，他的四个儿女克服种种阻挠，费了不知多少周折，终于得到有关部门的结论，推翻了对他的诬陷之词。逝者矣已，活着的为这位仁厚长者昭雪平反感到宽慰。时隔半世纪，海内外他的学生缅怀他，感激他的教导对他们成长所起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学生告慰九泉之下的老师：他一生辛勤耕耘的园地已树木成荫，桃李满园。

后　记

笔者是圣约翰大学的末代校友（1950—1952年）。20年后，为写这篇文章，笔者在大洋彼岸的几个图书馆，查到各馆所保存的这位长者曾发表的文章、讲演以及友人的通信，字字句句记载着这位爱祖国、爱人民、献身教育的学者的心路历程。从“五四运动”起，执著追求光明和真理、民主与科学，自强不息奋斗一生，虽历经艰辛、坎坷，但忠贞不贰。笔者撰写本文，真实记录下涂羽卿教授的一生，让后人记下这位应该纪念的人。

（责任编辑　林　跃）

谢稚柳和张大千的敦煌情

● 倪怡中

1983年春天，张大千在台北病逝，当时在上海的谢稚柳格外悲伤，因为他一直企盼着与张大千的会见，谁知35年前的一别竟成永诀。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孜孜于艺坛的探索、追求，多少事涌上心头，最是萦绕心头拂之不去的，还是那一段敦煌情。

1942年，谢稚柳在重庆接到张大千从敦煌发出的邀请信，便只身一人，来到戈壁中的敦煌莫高窟。

张大千在敦煌和老友重逢，欣喜万分，又是艺术相知，自然如鱼得水。那时候，在莫高窟观摹壁画绝非易事。莫高窟的几百个洞窟分布在鸣沙山的悬崖绝壁上，虽有栈道或小路相连，但年久失修，行走十分困难。每个洞窟中间都有佛龛，即使是较大的洞窟，佛龛四周也没有多少空间，人一走进去，支起画架，也就没有多少容身的余地了。况且每个洞窟前都有一段甬道，光线经过甬道遮掩，真正能照到壁画上的光线就十分微弱，两侧的壁画就更看不清了。对临摹来说，很费眼力。没有照明设备，只能一手举着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十分费力。遇到大的画面，还要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在洞窟里退前退后，十分艰苦。况且有的壁画画在洞窟顶，要爬上特制的高凳才能看得清；有的壁画画得贴近地面，人又必须匍伏在地才能临摹。洞里又憋闷。张大千一天忙下来，浑身酸痛，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谢稚柳看见张大千这样，心中不忍，对张大千说："您太劳累了，我看，您只勾勒人物的线条，让学生和喇嘛画师为您着色好了，这样既能保证质量，速度又快得多。"张大千听了谢稚柳的话，果然临摹的速度快了许多。所以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中，有一些画是他、他的学生和青海塔尔寺的喇嘛昂吉格郎、三多的联合署名。

谢稚柳没有像张大千一样去临摹壁画，而是对莫高窟的四百九十多个洞窟一一进行测量、记录、考证，对洞窟中从北魏到宋的壁画作了一番系统、仔细的观摩，他想从敦煌壁画中发掘、搜寻出中国绘画发展的演变轨迹。莫高窟开凿在鸣沙山的悬崖上，坐西向东，南北长1618米，从地面到顶端高十余丈，四百多个洞窟大小错综，鳞次栉比，最高的地方筑洞四、五层。谢稚柳请了一个当地人做帮手，每天一吃过早饭，就和帮手一起进洞，一窟窟地测量、考察，作详细记录。就在他编为190号窟的一个洞窟里，他就记载了83个条目：年代、洞口、洞内、佛龛、塑像……仅画记就作了如下记录：东壁。释迦树下说法像17铺，壁上。释加树下说法像8铺，壁中。释迦树下说法像8铺，壁下。隋人画飞天10身，近顶处。南、西、北壁（略去）。窟顶。隋人画贤劫千佛。隋人画莲花，四绕小莲花，红蓝色，精美之至，藻井。四百余窟，谢稚柳要付出多少艰辛！

一天下午，张大千正在洞窟里勾线，眼睛酸了，眼光偶然落在东壁左边的右下角，那是一幅残破的宋代壁画，在一小块早已剥落的壁画下面，有一些异样的色彩和线条。他连忙蹲下身去，用手电筒照着定神仔细一看，啊！真的是流畅的线条和一斑斑的颜色。原来，画下还有画。他激动得一下子站起来，跑着去告诉谢稚柳。当天晚上，张大千和谢稚柳找到上寺里的老喇嘛请教。老喇嘛说："施主，从前我进寺时，老法师带我们到窟里看壁画，对我们说过：这莫高窟可是个宝地，画下有画，宝中有宝，到处都是宝啊！"老喇嘛的话证实了张大千的发现，谢稚柳和张大千兴奋得彻夜难眠。

张大千和谢稚柳反复商量后，决定剥掉那层残败的宋画，希望发现下面年代更久的更有价值的壁画。他们一起把那幅宋画临摹下来，然后在工匠窦师傅的帮助下，剥掉了那幅宋画。果然不出所料，宋画下面是一幅敷彩艳丽、行笔敦厚的唐代壁画，画上还有唐咸通七年的题字。无疑，这是一幅比覆盖它的宋画早几百年的更加珍贵的壁画。张大千无意中对敦煌壁画研究作出了一大贡献。

张大千和谢稚柳没有想到他们的贡献却为自己带来一桩公案。

一天，一位不速之客来到莫高窟对张大千、谢稚柳说："张先生、柳先生，有人说你们不爱惜壁画，破坏壁画。"说着，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一份电报，递给张大千。这是国民党政

府行政院拍给敦煌县政府的电报："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饬敦煌县县长陈，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

张大千看完，血一下子涨红了面孔，冲着客人吼道："什么？我污损壁画？你们不把斯坦因、华尔纳当罪人，反倒说我破坏壁画，简直一派胡言！"

客人接着又对张大千说："听说甘肃省参议会将讨论检举你破坏敦煌壁画的提案！"

"讨论我破坏壁画？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张大千气得说不出话来，有口难辩。

在一旁的谢稚柳强压着心中怒火，对客人说："谁破坏？是我们清除洞窟里的流沙；谁污损？是我们从残败的宋画下面剥离出了完好的唐代壁画。我们含辛茹苦，他们在千里之外，灯红酒绿、轻歌曼舞，为保护敦煌做了些什么？他们谁肯到敦煌来？他们一派胡言，就成了我们的罪证？"

客人看到他们那画布、宣纸上，一尊尊佛像、菩萨、观音、飞天，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婀娜多姿，破壁欲出。客人怔住了。

1943年的夏天来临了。夏天是莫高窟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然而，张大千和谢稚柳却要离开莫高窟了。一旦离别，此情何寄？张大千站在他居住的"雷音寺"前，望着夕阳的余辉照射在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上，三座山峰宛如熟透了的橙子，呈现出金黄色。山峰背后是渐渐变暗的天空，前面是暗淡的呈茶色的沙漠，唯有照在山峰上的晚霞显出极为清晰的金黄色。在连绵起伏、参差不齐的山峰背后，有一条带状的金黄色背影，看上去宛若千万尊佛在三危山上并列而坐。看到这莫高窟前的奇景，张大千大为震惊，他连连喊着："稚柳、稚柳，快来看，这真是圣地啊！"张大千激动不已，一首七绝脱口而出：

摩挲洞窟记猶行，
教尽天花佛有情。
晏坐小桥听流水，
乱山回首夕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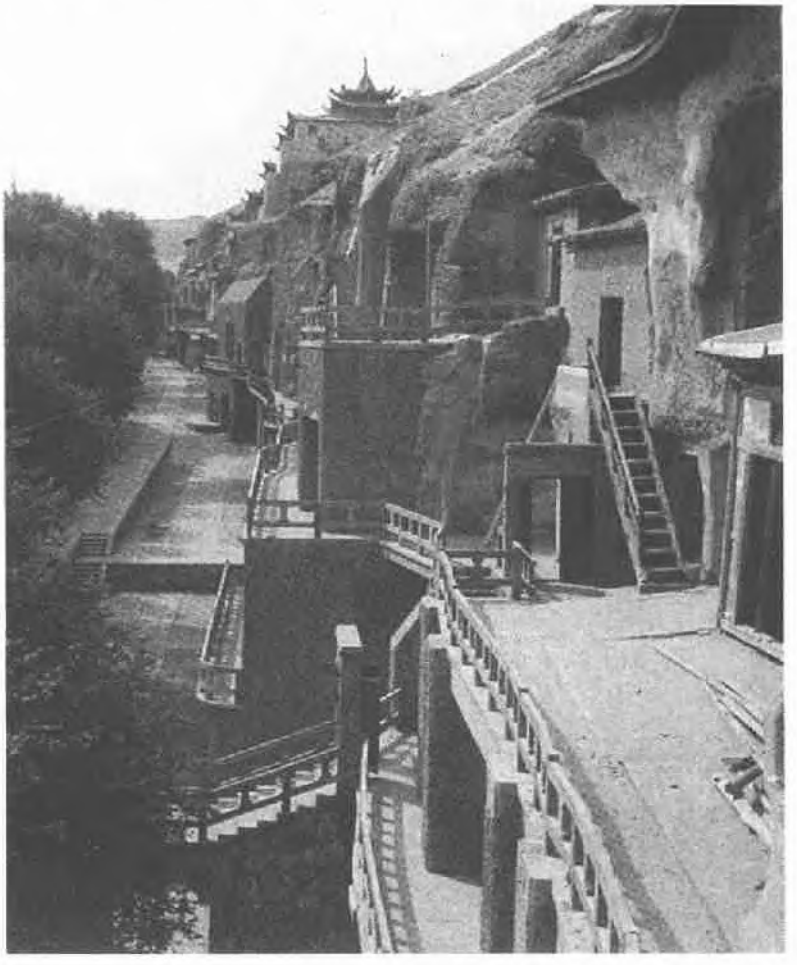
这天晚上，张大千兴致很好，他对谢稚柳说："稚柳，是我害得你这个中央大学的教授到这大沙漠来受罪。"一边叫学生研墨，挥毫为谢稚柳画了一幅荷花。谢稚柳诗兴也来了，特地在画上题了一首诗：

来时香柳绿当风，
去日梨花雪满丝。
静对莫高山下窟，
虚怜画笔泣神工。

张大千是我国专业画家去敦煌长期临摹的第一人，他和学生一共临摹了敦煌壁画216幅。

敦煌之行使他画风大变，山水画由以前的清新淡泊一变成宏大广阔，更加重渲染，大气磅礴。谢稚柳呢，他追求的是研究敦煌壁画艺术的风格流派。有学者在评论谢稚柳和张大千的敦煌之行时说，如果在绘画的实务与学说上，张大千所获不如谢稚柳多。张大千自己也说过："我认为历史考证之价值，重过艺术欣赏。"谢稚柳根据他在莫高窟的考察笔记，整理出《敦煌石室记》和《敦煌艺术叙录》两本著作。这两本书，至今仍是研究敦煌壁画和佛教关系的很具权威性的著作。

（责任编辑　刘　文）



莫高窟外景

一个乡村中学校长的『教育价值论』

●萧 徐

1995年8月，在山东省高密市双羊镇这个典型的乡村偏僻小镇中，一条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坐落在这个小镇上的高密四中的校长李希贵，要调走了。

到过高密四中的人都知道，这所乡村学校是极为普通的：没有一流的校舍、一流的教学设施，就是按县级市的办学水平来衡量，其办学条件往高处说，也仅属于二流。

在1990年以前，这所学校的教育质量，甚至让人们忘记了她是有38年历史的老校，双羊镇上那些有点门路的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甚至羞于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所学校里学习。

但是，就是这样一所农村中学，在1990年以后短短的几年中，却传奇般地崛起了。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

这个热点，就是1990年到这里任校长的李希贵掀起的。

想来1995年8月李希贵在离开这里时所引起的震动是很大的，因为7个月后我来这里时，人们在不经意之间，话题还时不时地提到他。于是，我凭直觉感到了李希贵在四中的份量。

当我涌起要采访的欲望时，我来到了四中。

凡接触到的人仿佛都有一种四中情结，但当我要求他们从四中连续三年位居全市第一的高考录取率谈起，具体对李希贵和四中做出一个全面而又准确的评价时，他们也都同样感到困惑。

于是，我找到了高密市教委，了解到了李希贵的简历：36岁的李希贵，中文本科毕业，1995年又报考了教育管理本科，1995年4月，又通过了中文文艺理论硕士学位的考试。两个本科学历加一个研究生学历，又是全国优秀教师，这在全国中学校长中也是不多见的。

此后，我来到了高密市第一中学找到了依然当校长的李希贵。

“永不屈服”：简单而又普通的四个字

到过四中的人，首先会对她的“永不屈服”的校训及其巨大的感召力留下深刻的印象。“永不屈服”，在这里有其特定的内涵，它“与校徽上的雄鹰翱空相辉映，体现了一种激励、感召、发奋上进的总格局。“象征着我校面对国家不发达的现实，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为使我们民族的科学文化卓立于世界之林，发奋努力的信念与追求。”（高密四中校训说明）

我们的话题首先从为什么把校训定为“永不屈服”谈起。

“《教育法》开宗明义指出：发展教育事业，目的在‘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一所学校，教育的真正成功不在于出了几个学习尖子、而在全员素质的提高。”李希贵也并不客套，开门见山进入主题：“在造就人才的教育活动中，有一些现象很值得我们反思。英国著名将领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后说：‘滑铁卢战役是在英国的公学里打赢的。’在我刚从事教育工作时，这句话不时地浮现在脑海之中。同样的事例还有，据说有人问日本客人战后崛起的原因，回答说靠的是每位国民的坚韧不拔和危机意识。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在造就人才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忽略了意志品格的锻炼培养，人才培养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的任务，就很难完成。”

是的，现在十几岁的孩子，即使是在边远偏僻的乡村，物质生活的提高，使他们的家长有能力为他们提供一个不用吃苦的“机会”，更何况城市里还时不时听到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剥鸡蛋的抱怨。如此养尊处优的现状确实应该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因为一个真正的人才，要献身一项事业，就必然要具备“永不屈

服”的品格。

“所以，我们所看重的教育价值，远不是仅仅指培养几个学习尖子，而更重要的是‘磨练品格’！”李希贵说。

“永不屈服”，简单而又普通的四个字，挂在嘴上，镶在墙上，并不难，难在怎样把它融入到每个学生的灵魂之中。李希贵和他的同事们做到了这一点。

一位名叫徐文燕的女同学，过去在高密市颇有“名气”，高密所有的高中她几乎都转遍了，谁也不敢收留，谁也不愿意收留，连她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关怀、帮助”。一位教过她的老师曾恨铁不成钢地发誓：徐文燕要能考上大学，我倒过来见她！最后，她被当作包袱甩给了四中。到她高中毕业时，四中为她创造了奇迹：她顺利地升入了高校。

回过头来重新认识自己，徐文燕觉得升入高校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最主要的是——正像她在给李希贵校长的信中所说的：“四中，对每个懒惰、想混日子的人都是沉重的压力，因为四中给每一个追求着的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精神支撑，那就是：‘永不屈服’。”

了解了这一切，当我再一次面对四中教学大楼三层正中校徽上那只腾空而起的雄鹰，以及校徽两侧那“永不屈服”的四字校训时，一种庄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教育的价值要在教育者的未来和我们社会的未来中体现出来

高密市四中高考升学率连续三年位居全市第一，高达百分之八十。这对一个乡村中学来讲，确实不易。

虽然社会的多元化已经让人们告别了“分分，学生的命根”的往昔，而且诸多的中学校长为了摆脱“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误解，也常常有意无意地不谈升学率，但是，每年的七月依然是每个家长和教师所最关注的时刻——升学率依然是人们挥之不去的主题。因此，我不讳言，直来直去地将“如何处理升学率和发展学生素质的关系”这一问题抛给了李希贵。

不料，李希贵比我更直接：“高考升学率应该理直气壮地抓。我们始终将这一点视为增强办学魅力的‘第一要素’。”

谈起这一点，李希贵有点激动，话也有点多。

“邓小平同志在给景山学校的题词中，有一个‘面向未来’的要求。如何面向未来，我理解是，教育的价值要在教育者的未来和我们社会的未来中体现出来。如果这个理解不错的话，那就要求我们在今天的教育中设计出未来的标准和要求。

“我们不能说‘升学教育’没有面向未来的因素，因为考试的导向尽管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更多还是要求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看重未来的知识。我们也不敢说现在有些所谓素质教育，就是真的面向未来了，因为在还没有掌握起码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情况下，就过早地‘发展特长’，这个‘特长’其实是断了线的风筝。在我们的许多基础教育中，把‘合格加特长’理解为‘及格加特点’的并不在少数。如果文化课学习的目的仅仅是及格，且不说标准太低必然会产生大批的不及格，即使目前要培养特长、将来要继续发展特长，都缺乏应有的根基。”

李希贵的话或许有点偏激，但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许多时候，我们从一些正式出版物中看到的和在许多教育主管部门召开的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上听到的，有些单位所介绍的素质教育经验，竟至于对文化素质的培养只字不提，似乎只有唱唱歌、跳跳舞，才是学校教育应该抓的素质。可是——

“可是，他们忘了，那是‘课外’活动的内容。”李希贵依然很激动。“什么叫‘课外活动’？不用我解释，人们都知道。课内的文化教育是主要的。而且，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高考升学率虽然不是检验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但确是不可缺少的标准。”

李希贵这样说，也并非意味着四中就是在“片面追求升学率”。摆放在我面前的《高密四中关于深化教学改革的决定》说明了一切。

在这份《决定》中，强调教学改革必须全面铺开观点，而这种改革的服务点并不是落脚在升学率上，而是着眼于教与学的素质培养上。比如，“语文 ACT 教改实验”、“政治两步七环节教学”、“历史观点教学”等等教改项目，都是服务于素质教育的。

这就是说，把升学率看成是增强办学魅力的“第一要素”的李希贵和四中人，不是以追求高升学率为目的，而是以此作为“培养现代化高层次人才”的途径。他们向高等学校输送的学生“都是在大学里受欢迎的”，而不是高分低能的。

考入潍坊医学院的刘明波同学，在四中学习时，就运用所学的物理知识设计了“自控打铃钟”，入大学后，又连续发明了“节能防冻水阀”、“一次性多功能急救呼吸器”。其中“节能防冻水阀”获国家专利，有关专家评价：“这有可能给水阀行业带来一次新的革命。”

1995 年考入北大的于怀东，在四中学习期间任班长，由于工作出色，学习优秀，同年就被学校党支部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而学校所取得的荣誉也提供了佐证。自 1990 年以来，学校连续被市、省评为文明学校，民主管理先进单位，教书育人先进单位，德育工作先进学校，校办企业先进单位……

“窥一斑而知全豹”，四中的教育是有鲜明特色的，是重视学生个

性发展的。但是，她又和一般意义上的特色教育有明显的不同。一般所认同的素质教育，往往离开升学教育这个主题，把素质教育和升学教育对立起来。在许多人看来，抓高考升学率就不能搞素质教育，而搞素质教育就势必冲击高考。而在四中，这二者却是高度统一的。她实施的是在坚实的文化基础教育之上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忽视"全面提高"的所谓能力和特长的培养。

在新的学校力争有新的发展

正当李希贵和四中的事业有声有色地发展时，一纸调令，他又来到了高密市第一中学走马上任了。

"对于这次调动，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一中是高密市的重点中学，但却在改革的大潮中落伍了。至于遗憾嘛，我本人并没有，因为我在一中照样可以实现我的教育价值观。倒是双羊镇的孩子家长们感到遗憾，我们的家长总是把孩子的未来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可事实上四中能到今天，绝不是我李希贵一个人的功劳。"

谈到将来在一中的发展，李希贵以"来一中刚半年，还不好说什么"为由来搪塞。我刨根问底，他还是那句话，但叫人给我拿来了一些材料。

在这些材料中，有一部分是高密一中的"红头文件"：

一份是《关于公布〈高密一中"四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的宗旨是要学校实行"优胜劣汰的动态用人机制"，实行"校长负责制、教职员工聘任制、岗位目标责任制、学校内部结构工资制""四制"改革方案。文件制订的时间是1995年8月10日。

一份是《关于贯彻实施〈高密一中初、高中衔接实验班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的宗旨是为"优秀人才的教育，提供较好的环境和条件"，即对初中的特长生进行"人才的定向培训"。文件制订的时间是1995年9月1日。

颁布于同年10月28日的《关于贯彻实施〈高密一中大、中、小学一条龙人才实施方案〉的通知》，和同年11月的《高密一中关于组建"特长生导师团"的意见》，也是围绕着如何培养特长人才的问题而进行的改革。

上述的四个文件至少可以给我们透露两个信息：一、李希贵是8月份到一中上任的。8月份是暑期放假时间，而8月10日的文件就出台了，展现了李希贵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二、教改的思路在逐步扩大。李希贵的教育价值观也在改革的思路中有所体现：探索出一条改革农村中学的办学路子。

有这样的工作作风和改革思路，不用几年，一中也会像四中一样，异军突起！我相信这一点，李希贵也相信。

分手时，他说："三年后你再来吧。"

依然是淡淡的语气，依然是红高粱般拙朴坚毅的面容。

我已经揣摩出这约定的分量。

（责任编辑　洛　松）

更　正

本刊今年第7期第29页中的李燕应为李蒸；第8期79页"杨克系北京军区机关军职离休干部"一句的"军职"应为"师职"，特此更正，并向指出这两处错误的朱兆奇和杨克同志表示感谢。

本刊编辑部

○广　告○

治疗外阴白斑，解除难言之隐

外阴白斑系外阴营养障碍症，主要症状为外阴搔痒，粘膜、皮肤变白，萎缩或角化增生，久之阴道萎缩造成生育困难并影响正常性生活，外阴癌50%来源于外阴白斑，已往多采用冷冻、激光或手术切除等措施，但这是以破坏女阴肌肉组织为代价的权宜之计，痛苦大且复发率高。

外阴白斑专科主任高莹创建以中药为主的无损伤疗法治疗男女外阴白斑及各种外阴搔痒症，无痛苦，无损伤，方法简便，可带回家自治，此疗法1994年通过郑州市级科研成果鉴定，1995年又获科学技术进步奖。

地址：郑州市伏牛南路60号郑州市中医院汝河分院

电话：(0371)8982686—3216

乘车路线：从火车站乘102、103路电车到汝路站下向西20米即到。　（豫中医广证字〔95〕第198号）

北京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大三条5号

乘105、107、111路电车，22路汽车新街口站下车即到

电话：(010)62252417　　**邮编**：100035

“关羽大意失荆州”吗？

● 李书吉

东汉末年诸侯间的裂土战争，经过十数年的角逐、离散、聚合、兼并，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逐渐形成曹操、孙权、刘备三股大的力量。曹操略定北方后，战争由北向南发展，战火在长江流域熊熊燃起。三家也都不约而同地把视线投向地处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的荆州，于是这个地区一时成了三家矛盾汇集的焦点地区。三家三分荆州，拉开了三国鼎立的序幕。其后三国在荆州又进行了长时期、错综复杂的冲突和斗争，特别是吴、蜀之间由于在荆州问题的长期纠葛，导致了双方十余年的周旋和火并。结果是曹操依北方占有北荆州，孙吴托江东据有南荆州，而一开始就寄寓荆州的刘备最终在荆州尺土未沾，被关闭于三峡之内的蜀汉一隅。

乍看起来，荆州之争的失败者只是刘蜀一国，而实际上如果从各自初始的构想来看，荆州之争的结局说明魏、蜀、吴战略上也都有失误。三家都想争荆州，都把荆州作为各自继续发展的初始目标，但结局却与各自的初衷大相背离，是三家所始料不及的。

而史家把蜀汉荆州的丧失，一股脑儿推到荆州守将关羽身上也是极不公道的。

三家为什么要争荆州

荆州位于长江中游，东汉时期荆州有八郡，但属地只有今湖南、湖北两省，是东、西、南、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军事上，北有荆门为南下和北进的锁钥，中部有长江贯通东、西，长江以西的夷陵，控扼峡江出口，向称“川鄂咽喉”，长江沿线以东的武昌（今武汉）重镇，是长江和汉水的交汇处，是我国中部地区的水陆要道，荆州南部邻两广、通南海，又有丰富的物质资源。荆州自古就是南进、北上，或东下、西征的军事战略要冲。

三国形成初，荆州是曹操、孙权和寄寓其地的刘备三方接壤的地区。北方大致统一后曹操率军南下前，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该地顿时成了三家虎视、势在必争的一个敏感地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分析当时的形势时就认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而当时统属荆州的刘表却懦弱无能，不求进取，所以建议刘备取刘表，据荆州，以荆州为依托，越峡逾巴，进据巴蜀，尔后结好孙吴，待天下有变，便两路出兵中原，一路由荆州出宛洛（今河南南阳），一路由益州出秦川（今陕西南部）称霸天下。把第一个目标就放在了荆州。

孙吴方面，鲁肃在《隆中对》之前为孙权提出了与此大致相仿的策略。鲁肃对孙权说：“依肃所料，今汉室不可复兴，曹操势力也难短期翦除，为今之计，将军只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形势，趁北方曹操多务，歼除盘踞江夏的黄祖，进军刘表、占据荆州，接着极长江所限，顺江取益州，然后建立帝号，以图天下。”其后，曹操要孙权送其子弟作“质任”，孙权同周瑜商量，周瑜以楚据荆、扬而兴大业的例子也劝孙权谋取荆州。建安十三年，曹操南下前，甘宁也有类似的建议，他对孙权说：“南荆之地，山川便利，是国家之西部屏障，而刘表本人既无远虑，其兄子更为劣弱，终难承业传基，应先于曹操取荆州。”

曹操方面，官渡之战不久，曹操就急不可待要举大兵南下。但当时袁绍余部势力还很强大，对曹操新取得的中原仍能构成威胁，所以才推迟了南下的日程。建安九年，曹操平定冀州以后，荀彧劝曹操待修复旧京洛阳后应立即南下荆州。所以，定中原后取荆州，以荆州为基地平江南，也是曹操既定方略。

在曹操大举进军荆州前，当时统领荆州的是刘表，刘表从初平元年（190年）出任荆州，到建安十三年（208）年，已近二十年。荆州地方数千里，有带甲兵士十余万，在北方军阀混战时，唯荆州没有受到战火的洗劫，是当时少有的一块安宁之地。同时北方人民又大量流入荆州，当时仅从关中一带流入荆州的就有十余万家，这又为荆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刘表在英雄角逐之时，虽握千里山河，十数万大军，却既无戡乱之谋，又无进取之志。在袁绍与曹操官渡对垒时，袁绍曾求救于刘表，而刘表既不助袁绍，也不附曹操，惟求独守荆

州，苟安图存。

建安六年，刘备由北方投奔刘表，先驻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后屯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北），寄寓荆州，到建安十三年已逾八年。在此期间，刘备接受诸葛亮的建议，说服刘表让他负责清查荆州户口。刘备利用此机会，多方搜罗流民，招募流民参军，扩充军队，充实力量，作取代刘表的准备。孙吴在孙坚时已大致统一江东，握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江、庐陵六郡，于建安八年举兵进伐江夏黄祖，于建安十三年初，攻破黄祖占领江夏，势力开始伸向荆州。建安十三年八月，刘表病死，鲁肃立即劝孙权结好刘备，让刘备抚领刘表的部属士兵，合力抵抗曹操。孙权遂派鲁肃两次出使荆州。与此同时，曹操在这年七月已从邺城（今河北磁县）率大军八十万（实则三十万）南下，八月临近荆州。至此，曹操、孙权、刘备三家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这样，以曹军南下为起点，三国荆州之争的帷幕正式揭开了。

曹操、孙权、刘备三分荆州

这年九月，曹军开至新野（今河南新野），正在大兵压境之时，刘表的两个儿子却因继立问题发生了纠纷。长子刘琦因受排挤出奔江南，次子刘琮在其舅蔡瑁等支持下继任荆州牧。刘琮对曹操进军猝不及防，也无力抵抗，遂举州投降。而当屯驻樊城（今湖北襄樊北）的刘备获得刘琮投降的消息时，曹操的大军已进至宛城，离刘备的驻地已很近了。刘备遂向江陵（今湖北江陵）方向撤退，在快到当阳（今湖北当阳）时，沿途随从士兵和百姓达十万多，还有辎重数千辆，扶老携幼，队伍行进十分缓慢。

江陵是荆州的重要军事基地，贮有大量军事物资。曹操到达襄阳后听说刘备要退据江陵，忙率五千精骑，日夜兼程，赶了三百里路，在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与刘备接火。刘备本来甲士不多，并无训练，被曹军一冲，部属迅速四散。其时通往江陵的路已被曹军阻挡断，刘备只好向汉水方面撤退，途中与前来接应的关羽所部和江夏太守刘琦所率万余人会合，一同由夏口（今武汉市汉口）退至樊口（今湖北鄂城县西北）。曹军占领江陵。

曹操的猝然出兵和兵不血刃取得荆州在江南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不仅使兵少众寡，无立足之地的刘备感到有被吞灭的危险，也使孙吴方面感到战火迫在眉睫，局势的急剧发展使双方曾各自筹划的联盟问题变得刻不容缓。也正是这种形势促成了孙权和刘备两国的凝聚。首先是双方各自倡导联盟的两位谋士鲁肃、诸葛亮的首次会晤。孙权遣去与刘备接头的鲁肃在当阳长坂见到了刘备和诸葛亮，双方取得共识。其时，曹操正由江陵水陆俱进，盛兵东下。刘备忙派诸葛亮偕同鲁肃俱赴江东会见孙权，转陈同孙权缔结盟好，共抗曹操的旨意。

诸葛亮、鲁肃在柴桑（今江西九江）见到孙权陈述了刘备的意见后，在孙吴上层引起巨大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迅速形成以秦松、张昭为首的主降和以周瑜、鲁肃为首的主战两派。经过诸葛亮对曹、孙、刘三方势态的分析，鲁肃、周瑜的据理力争，终于坚定了孙权联合刘备抗击曹操的决心。于是孙权派周瑜、程普、鲁肃率精兵三万溯江西上，会同蜀军迎击曹操，结果在赤壁（今湖北蒲圻）大败曹操。

赤壁之战曹操失败的原因很多，赤壁战前诸葛亮在为孙权分析三方形势时，就曾提到曹操东下的三个致命的弱点：一是曹操军士远来疲敝，而且其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已是强弩之末，其战斗力必然减弱；二是北方人不习水战；三是曹操虽一时克服荆州，但在荆州的统治还没有基础，还没有取得荆州百姓的支持。这些确是曹操致败的原因，但这些弱点在当时曹操来说不是不能克服的。曹操最大的失误在于他发兵东下太过仓促，从而失去了他在荆州弥补这些不足的机会。曹操江陵发兵前，他的谋士贾诩就曾向他建议："要利用荆、楚的丰厚资源，休养和训练军士，安抚百姓，后图养威。"应当说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但由于曹操取荆州、击刘备太过顺利，对江东孙权力量估计严重不足，对孙、刘联盟也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没有认真考虑贾诩的建议，遭致赤壁惨败。

赤壁之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区内长江以南四郡即武陵郡（今湖南常德）、长沙郡（今湖南长沙）、桂阳郡（今湖南郴县）、零陵郡（今湖南零陵）；曹操占有南阳郡（今河南南阳）、章陵郡（今湖北枣阳）；孙权占有南郡（今湖北江陵）、江夏郡（今湖北黄州）。三家三分荆州。以后刘备据荆州向益州发展，孙权据江东向岭南地区扩张，曹操据黄河流域向关西地区推进，大体上形成三国鼎足的形势。

吴蜀荆州纠纷

赤壁之战的第二年正月，即建安十四年正月，原荆州牧刘琦病卒，孙权表以刘备为荆州牧，并将长江南岸的土地划归刘备。刘备遂在长江南岸的油口立营并将其地改名公安（今湖北公安），孙权为了进一步笼络刘备，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想借此稳定荆州的局势，维持同刘备的同盟关系。但刘备不满足于已划定的荆州地界，于次年十二月亲赴京口（今江苏镇江）见孙权，以所据荆州四郡地少、不足安民为由，要求将南郡（今湖北江陵）借给他。

在借不借荆州问题上，孙权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瑜极力反对，上书孙权说："刘备是个枭雄，而且有关羽、张飞两员熊虎大将，必然不能久为人用，为今之计应将他软禁起来，为他盛筑宫室，广置美女，消磨他的意志，将他与关、张分隔开，然后出兵占领他们的土地，则大事可成。而现在再以土地资助他们，使他们三人同集疆场，这好像蛟龙得云雨，终难困于水池之中。"而鲁肃则极力主张把荆州借给刘备。他认为，目前我们刚刚取得荆州，民心不一，而北边曹操是个劲敌，荆州给刘备，正好使他在荆州为我们抵挡曹操。孙权犹豫不决，即没有扣留刘备，也没有答应把荆州借给刘备。与此同时，曹操也私下活动，派周瑜的同乡蒋干至江陵见周瑜，劝他归附曹操，为周瑜拒绝。

周瑜死后，孙权曾派孙瑜率水军西进，刘备则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沿江屯重兵拦阻。在这种形势下，孙权只好暂时收兵，同时也接受了鲁肃的建议，将南郡借给了刘备。

南郡是西出北进的门户，是荆州的重镇，南郡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孙权、刘备各自的大计。孙权之所以忍痛割爱，是由于在淮南地区受到曹操大军的攻击，穷于两线应付，所以想让刘备承受荆州方面来自曹操的压力。但由此犯了一个大错误。建安十六年十二月，曹操派大军向汉中进军，刘璋派法正率四千人东出迎备入蜀，刘备便借机率将士数万人进入益州，孙权闻讯非常气愤，遂将妹妹接回江东，准备与刘备决裂。建安十八年，孙权在历阳击败曹操四十万大军的进攻，东线威胁暂时解除，于是又把注意力集中在荆州。建安十九年，刘备正式占据益州。次年孙权派人向刘备索要荆州，被刘备拒绝。孙权大怒，即命吕蒙设置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欲强行接管三郡，被关羽尽数驱逐。于是孙权又命吕蒙率两万军队争夺三郡。吕蒙迅速攻下长沙、桂阳二郡，进围零陵。刘备闻讯亲自引兵五万坐镇公安，命关羽率兵三万夺取三郡。孙权则坐镇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又派鲁肃率兵一万屯益阳（今湖南益阳），两方摆开阵势，准备拼夺。不久零陵太守郝普也向吕蒙投降，而曹军又攻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不敢在荆州久待，使派使者向孙权求和。孙权也虑兵力不足，没有全胜的把握，于是同刘备达成协议，以湘水为界，平分南荆州，湘水以东的江陵、长沙、桂阳归孙权，湘水以西的南郡、武陵、零陵归刘备。这个协议维持了双方在荆州两年的平静。

魏蜀襄樊战役与吕蒙偷袭南郡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刘备荆州守将关羽趁孙权进攻合肥，曹操将襄樊部分兵马调往淮南的机会，立即留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自己亲率主力进攻襄樊。

襄阳、樊城隔汉水相对，互成犄角，由曹操的族弟镇南将军曹仁坐镇樊城守卫，吕常守襄阳，另由平寇将军徐晃屯宛城为外援。曹操得到关羽进攻襄樊的消息后，又派于禁和庞德领兵前往助守。曹仁让于禁和庞德屯驻樊城北侧。八月，襄樊地区连下了十多天大雨，汉水暴涨，平地数丈，于禁等七军被淹于水中。于禁率诸将于高阜处避水，关羽趁势乘船猛攻。于禁率众投降。庞德据堤力战，被关羽擒杀。接着关羽猛攻樊城，同时又派军包围襄阳。在大军的围逼下，曹操所署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云也先后投降，许都以西一些地区也纷纷响应，一时关羽声势大振，"威震华夏"。

形势万分紧迫，曹操曾考虑以迁都避其兵锋。正在这时，徐晃援军开到，与城中曹仁取得了联系，军心稍定。曹操又亲自从洛阳南下驻军于摩坡（今河南郏县），声援徐晃，又派去兵士十二营前往支援。曹操一面进行军事部署，一面又派人出使孙吴，让孙权由背后袭击关羽，答应事成后以江南之地给孙权。

孙吴方面，代鲁肃领兵的吕蒙早有夺取南郡占领襄阳的打算，得到了孙权的同意，准备伺机袭击关羽。在关羽进攻襄樊时，吕蒙得知关羽对孙吴方面也早有防备，留有相当数量的驻军防守。这时吕蒙又给孙权写了一封密信，建议在关羽进攻荆州时，将他调回建业治病，松懈关羽的警惕，使其撤出后方的军队，以增援襄樊前线，乘虚袭取南郡。孙权便公开发令将吕蒙召回治病，另命书生出身的陆逊为偏将军，接替吕蒙守陆口。陆逊到驻地后，专门写信恭维关羽。关羽见信后果然"无复所嫌"，遂将后方的部分军队调往襄樊前线。这时由于关羽受降于禁人马数万，粮食缺乏，于是强取东吴在湘水屯积的粮食，以充军食。孙权就以此为借口，一面派吕蒙率兵袭击江陵，一面写信给曹操说，愿以讨关羽自效，派军偷袭关羽，并请曹操为其保密。曹操接受董昭的意见，表面上答应为孙权保密，而暗中却让徐晃将书信射入襄阳城内和关羽营中，襄樊城中将士见信后，守城志气倍增，而关羽见信后，在后撤和继续围攻问题上却陷入进退两难，举棋不定的犹豫之中。这时徐晃趁势进攻，关羽接战不利，遂向南郡方向撤退。

这时，江东的吕蒙率军西上寻阳（今湖北广济北），将精兵藏在大船中，让摇橹的士兵都换成商人服装，昼夜兼行，进入蜀境，出其不意将关羽沿江所设岗哨全部扫除。接着收降糜芳、傅士仁二将，兵不血刃取得了江陵和公安。吕蒙占领公安后，悉心抚慰城中将领的家属。又派陆逊西上宜都，切断关羽入川的退路。

关羽在途中得到江陵、公安失陷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去上庸（今湖北竹山）要守将刘封、孟达来支援，二将以上庸新定为由拒绝支援。关羽势孤力弱，只好退守麦

城(今湖北当阳),孙权一面派使者进城诱降,一面命朱然、潘璋截断他的归路。十二月,关羽突围后,被潘璋部下马忠俘获,与其子关平一起被处死。黄初元年(220年),曹丕利用蜀上庸守将孟达、刘封的矛盾取得上庸。至此,蜀在大巴山以东的地方丧失殆尽。

关羽失荆州问题的一些思考

蜀汉荆州的丧失,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问题很有必要提出来再作分析。

首先,关羽该不该攻襄樊。

有人责备关羽,认为关羽攻襄樊是个轻率的、冒险的举动,认为攻襄樊本身就是错误的。

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先看看襄樊战役前,蜀汉荆州的形势:孙、刘平分南荆州后,刘备所属三郡(后分南郡立宜都郡为四郡),地区狭小,而且地处孙吴东、南和曹操大北方的三面包围之中,不但向外伸展极其困难,而且也无险可守。尤其是南郡以北的襄樊掌握在曹操手里,而襄樊是江陵的北门,《南齐书·州郡志》载:"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蜀汉如果能取得襄阳则可凭借汉水阻抗东吴,北面则以襄阳守护江陵。所以,取不取襄樊直接关系到蜀汉在荆州能否立足的问题。

第二,关羽发动襄樊战役的条件是否成熟,时机是否有利。襄樊战役是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发动的,在此前后发生的几个大的事件对蜀汉都是极其有利的。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四月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同曹操为争夺汉中进行了两年的战争。二十四年七月,刘备正式从曹操手里夺得了汉中,自称汉中王。这件事对刘蜀政权关系重大。汉中是益州的咽喉,汉中的取得对刘备川蜀根据地的巩固意义极大。建安二十三年十月,在曹操荆州统治区内,吏民苦于徭役,发生了由宛守将侯音领导的南阳吏民的起义,这个起义直到次年正月才被曹仁镇压下去。这说明曹操在荆州的统治很不稳固,所以在关羽发动襄樊战役后,许都以西的郡县纷纷响应。建安二十四年三月,刘备派孟达、刘封会攻上庸。还有一件大事,也就是在关羽攻襄樊的这年七月,孙吴在淮南对曹操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关羽进攻襄樊可使曹军受到两面牵制。因而关羽发动襄樊战役的时机也是有利的。

第三,从襄樊战役的战争过程看,开始蜀汉军队势头是很好的,很快吃掉了于禁、庞德所部,并分别将曹仁、吕常围困在襄阳、樊城。但以后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曹操闻讯后立即派徐晃带重兵支援,继而又亲自率军南下坐镇摩坡,又派十二营前往救助。所以出现了久攻不下的局面。孙吴方面,吕蒙、陆逊积极策划从背后偷袭,孙权也亲自率军西上。从一开始局部的战争变为三方全局性的战争。而在这种形势下,蜀汉对此全无反应,战争从七月开始到十二月结束,没有得到刘备、诸葛亮的任何支援。在两面夹攻下,关羽陷于孤立无助的境地。形势的急剧变化,曹操、孙权给予如此的重视,而刘备方面却没有任何信息是不可理解的。

第四,关于关羽性格和在处理孙刘联盟关系的态度对战争的影响问题。《三国志·蜀志·关羽传》载:孙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所以有学者将南郡的丧失归罪于关羽同孙吴关系的处理上。正如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沙》里说的:这些大小军阀、豪强"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所以,他们今天势不两立,明天又杯酒言欢,完全取决于他们本集团的利益,在他们眼里,婚姻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手段。有个典型的例子,刘备虽然同孙权的妹妹缔结过一段婚姻,但荆州纠纷一起,便立即撕得粉碎。而孙权表面上派人向关羽求婚,实际上正是为了麻痹关羽,正是孙权伺机偷袭荆州计划的一部分。

通常以大意失荆州来责备关羽,如果说荆州之失,确是因疏忽大意所致的话,那么真正的疏忽大意者是决策人刘备和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取荆州、据益州,两线出兵的计划开始就是建立在同孙吴结好的基础上的。以后虽然吴、蜀在荆州问题上进行了长时期的纠葛,但刘备、诸葛亮对孙吴在魏、蜀对抗时,可能对他背后一击这一点是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不仅诸葛亮,就是曾经提出全居长江的鲁肃,也在孙、刘联盟问题上犯了错误。全居长江本来是鲁肃提出来的,但鲁肃却极力主张并说服孙权将控扼三峡峡口的南郡借给了刘备,使刘备得以顺利入蜀,从此孙吴占据长江中上游的愿望再无实现的可能。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鲁肃作了最大的让步。这件事使孙权在鲁肃死后许多年后仍然耿耿于怀。孙权在评价吕蒙时曾说:"子明(吕蒙)图袭关羽,胜于子敬(鲁肃),子敬给我写信说庆忌'不足忌',其内不能明辨,外为大言,我宽恕了他,不能苛求于人"。孙权对这件事之所以念念不忘,就是因为这件事是关系到孙吴以后发展根本大计。

关羽死后,刘备率大军回夺荆州,又被陆逊在夷陵打得大败,此后蜀汉再无插足荆州之意,而孙吴也无法进入川蜀,曹操也只能固守已得的荆州地盘,三国正式形成。以后吴、魏两国在荆州又进行了一些局部的争夺,但三国大规模的战争已转移到汉中、合肥两线了。

三国荆州之争,是三国形成时期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场争夺战。这场战争不仅是三国军事实力上的剧烈竞争,同时也是三国各自的谋略家的一次集中的较量,是留给后世的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遗产。

(责任编辑　萧　徐)

力主“匡正时弊”的李谔

● 瞿林东

结识杨坚：入隋为官

李谔，字士恢，北朝赵郡（治平棘，今赵县，辖境相当于今河北赵县、元氏、高邑、柏乡等县）人，好学而善作文。

李谔入仕之初，是在北齐（公元550—577年）治下，官至中书舍人。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灭北齐后，李谔在北周（公元557—581年）治下做官，任天官都上士。西魏末年，改官制，依《周礼》建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这个制度在北周时期延续下来。天官府是管冢宰等众职的机构，李谔所任都上士是天官府中的中下级官员。在此期间，李谔结识了杨坚，认为杨坚“有奇表”，故“深自结纳”。后来杨坚做了丞相，李谔受到亲近和重视。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一件事情是：杨坚经常向李谔“访以得失”，征求李谔关于管理国事的意见。李谔根据当时“兵事屡动，国用虚耗”的实际情况，写了一篇《重谷论》以提醒杨坚的注意。杨坚认真地接受了李谔的建议。第二件事情是：杨坚在北周任大司马之职时，很不安心，“每求外职”。李谔“陈十二策，苦劝不许”，杨坚于是放弃了求取外职的念头，“决意在内”，并最终取代了北周的统治，建立了隋朝。杨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隋文帝。隋文帝对群臣说：“今此事业，谔之力也。”从这两件事中，可以看出李谔是一个很有政治眼光和政治谋略的人，也可以看出他在隋文帝心目中的地位。可惜他的《重谷论》和“十二策”早已失传，后人无法得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的见解。

李谔的官位不高，但却是一个办事认真，敢于直谏的人。入隋以后，李谔在朝中历任比部侍郎、考功侍郎和治书侍御史。比部侍郎，是尚书省都官部比部曹长官，掌管诏书、律令、勾检等事；考功侍郎，尚书省吏部尚书属官，掌管考第等事；治书侍御史，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的属官，掌管举劾中下级官员事。

匡正“三风”：家风、文风、官风

李谔在隋朝的政绩，主要在于匡正风俗方面。一是正家风，二是正文风，三是正官风。

关于正家风。隋初，“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李谔上书指出：“嫁卖取财”，“实损风化”；“方便求娉，以得为限”，是“无廉耻之心，弃友朋之义”。不论是嫁卖的一方（公卿子孙），还是娉买的一方（朝廷重臣），都是不能容忍的。李谔进而指出：“居家治理，可移于官，既不正私，何能赞务？”这是把治家和政务联系起来。隋文帝采纳了李谔的建议，制止了高级官员中的上述行为。

关于正文风。李谔目睹当时“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劾，流宕忘反”，于是上书文帝，揭示南北朝时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他指出：在北朝，“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为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在南朝，“江左齐、梁，其蔽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从北魏、齐、梁的不良文风中，揭示了它直接影响“世俗”、影响朝

廷的教训："文笔日繁，其政日乱"。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对于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很重视的，因而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屏黜轻浮，遏止华伪"。他们还明确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即不论官府还是私门，都要求"实录"的文风。然而，当时也有个别的官员不买帐。就在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写了一道"华艳"的文表，被"付有司治罪"。据《北齐书·司马子如传》所记，司马幼之在北齐时，"清简自立"，"清贞有素行，少历显位。"他曾以兼散骑常侍（皇帝侍从）的身份，奉命出使过陈朝，也算得上是春风得意了。入隋后，不能适应文风的改革，遭此变化，可谓今非昔比。通观史册，以"文表华艳"而获罪者，确是不多，可见隋初整治不良文风的决心和力度是很大的。

关于正官风。针对"当官者好自矜伐"的自吹自擂现象，李谔上奏指出：为官应当"陈力济时"，"不得厚自矜伐"；如果"功无足纪，勤不补过"，还要自我吹嘘，那就太荒唐了。他说，历史上出现过 这类无廉耻现象，造成了"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观其行，矜夸自大，便以干济蒙擢，谦恭静退，多以恬默见遗"的严重后果，这个教训是应当记取的。隋朝建立后，这种"自炫自媒"的风气在很大范围内被革除，以至于"耕夫贩妇，无以革心"，但有的大臣却"仍遵敝俗"，不改此种陋习。对此，李谔建议：如有刺史入京述职，仍然"言辞不逊，高自称许"，一律"具状送台，明加罪黜，以惩风轨"。隋文帝支持李谔的见解和建议，"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如此看来，隋初匡正风俗之举，确实收到良好的效果，而李谔当居首功。《隋书·李谔传》约一千五百字，而写匡正风俗的篇幅就占了一千一百余字。即使在今天，读其传，亦可深知匡正风俗之重要。

认真负责：敢于犯颜直谏

从李谔经历的仕途来看，他是一个有政治眼光和政治谋略的人。从他建议整顿隋初显贵的家风、百官的文风和官风来看，他是一个具有严肃的政治作风的人。李谔的政治作风，还表现在他敢于犯颜直谏、敢于负责任这两个方面。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颜之推向隋文帝建议说："礼崩乐坏，其来自久"，现在是雅乐、胡声并用，似有不妥，可否考虑采用古梁国之乐。隋文帝不同意，说：梁乐是亡国之音，为什么要让我来用它呢！后来，隋文帝采纳了郑译关于修正北周声律的建议，并诏命牛弘、辛彦之、何妥等"议正乐"。可是"沧谬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隋文帝大怒："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邪？"于是要将牛弘、辛彦之、何妥等人治罪。这时，李谔出来阻止，奏称："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礼乐。斯事体大，不可速成。"李谔举出武王、周公故事，很有说服力，隋文帝听了后，怒气稍解，牛弘等也幸免于罪。

隋初，有的官道两旁开设了不少店舍，熙熙攘攘，十分"污杂"。大臣苏威认为，这都是"求利之徒"所为，"非敦本之义"。他上奏隋文帝，建议把这些开设店舍的人"约遣归农"；愿意继续开设的，一要在州县"录附市籍"，二要撤毁旧店，远离官道。以上两条，限定时间办理。隋文帝同意照办。这时正是隆冬季节，归农、拆迁多有不便，但无人敢出面陈诉。恰值李谔因公务外出，见此情景，甚觉不妥。他认为："四民有业，各附所安"，即便令其"录附市籍"，也未必合理，何况"行旅之所依托，岂容一朝而废，徒为劳扰，于事非宜"。于是李谔"遂专决之，并令依旧"，果断地制止了上述做法。公务完毕后，李谔回朝向隋文帝奏明此事。隋文帝称赞他说："体国之臣，当如此矣。"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谔并没有更多地想到苏威位高权重，触犯了苏威怎么办；也没有更多地想到这是经过皇帝批准而采取的做法，触犯了圣旨怎么办。他只是以国事为重，从而也就更加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胆识。

李谔晚年，因病而离开京城，做了通州刺史，同样是"甚有惠政，民夷悦服"，可见他又是个始终如一的人。

唐代史家称赞李谔为官"多存大体，不尚严猛"，"无刚謇之誉，而潜有匡正多矣"；又说他"性公方，明达世务"。通观李谔的宦途和言行，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责任编辑　洛　松）

《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大会剪影

照片说明:

①前排左起: 杜导正、于光远、萧克、陈沂、谢筱颐、李锐

②萧克(中)、黑伯理(右)、杜导正(左)

③王光美(左)、张岱年(右)

④周而复(左)、庄炎林(右)

⑤温济泽(左)、强晓初(中)、张锲(右)

⑥傅崇碧(左)、梁衡(中)、杨泽江(右)

刘兵 摄影

炎黄春秋

满门忠烈的张太雷一家

邓子恢被称为农村问题专家由来已久

慕生忠：筑在世界屋脊上的丰碑

张国焘血屠鄂豫皖

力主"匡正时弊"的李谔

ISSN 1003-1170

09>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00元